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二
秋季号
复九十一期

91

91

清华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二〇二二
秋季号

清华校友总会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ISSN 1006-7663



9 771006 766221

刊址 清华大学新林院7号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气候变化协同”全球行动启动仪式之清华会场



▲清华药学院丁胜团队在全能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



▲清华男篮女篮获得第24届CUBA全国总冠军，首次包揽CUBA男女篮双冠



▲清华MCCAIF龙舟队勇夺蒙特利尔龙舟赛1000米亚军



▲西雅图清华校友欢聚一堂迎中秋



▲马来西亚校友中秋国庆双庆聚会



▲清华校友参加瑞士中国高校校友会联盟组织的徒步联谊活动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2022年会员大会成功召开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二
秋季号
复九十一期

Qinghua
Xiaoyou
Tongxun



- ◆ 清华大学五位新领导就任
- ◆ 赵元任：好玩儿的大师（陈来）
- ◆ 吴北生：英雄无言 岁月有声
- ◆ 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张彭春在清华学校（1923—1926）（金富军）
- ◆ 从《清华周刊》发现中国（胡一峰）
- ◆ 清华教我挑重担（杨定英）
- ◆ 行走“一带一路”（马麟）

清华校友总会 2022年10月

清华校友通讯
91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复秋二
九〇
十季二
一期号二



刊 址 清华大学新林院7号
邮 编 100084
电 话 010-62792246
投稿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国内刊号 CN 10-1674/G4
国际刊号 ISSN 1006-7663
发 行 清华校友总会
印 刷 北京精彩世纪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定 价 20 元

1934 年创刊 1980 年复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编辑单位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 华建敏 贾春旺 李 蒙 方惠坚 贺美英
柳斌杰 王凤生 胡显章 叶宏开 庄丽君
万俊人 白永毅 钱锡康 徐心坦 田 芊
周家惠 孙 哲

编辑委员会 史宗恺 向波涛 唐 杰 宗俊峰 覃 川
周明胜 范宝龙 胡 钰 杨士强 李 军
郭 谦

刊名题字 刘 达
名誉主编 贺美英
主 编 史宗恺
常务副主编 袁浩歌
执行主编 关 悦
副 主 编 杨 帆 黄文辉 解红岩
编 辑 田 阳 任风远 钱飒飒

订阅金额 中国内地 80 元 / 年、200 元 / 3 年，港澳台 160 港币 / 年，
国外 40 美元 / 年

线上订阅 “清华人” 小程序认证校友可通过【校友服务一期刊订阅】
在线订阅



邮局汇款 收款人 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现场订阅 清华大学东南门外紫清大厦 6 层
发行电话 010-62782238

目录

Contents

今日清华

- 7 清华大学五位新领导就任
- 8 3700 余名本科新生、9000 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 宗 和
- 9 清华大学成立为先书院 / 书院管理中心
- 9 “2022 和合文明论坛”在清华举办 / 郭 玲
- 10 清华大学主办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 / 李 含
- 10 清华男篮女篮获得第 24 届 CUBA 全国总冠军
首次实现包揽 CUBA 男女篮双冠 / 团 委 体育部

值年园地

- 11 难忘清华园 / 王锦燧（1962 届机械）
- 13 四十年交往话变迁 / 多文礼（1977 级化工）
- 16 毕业四十年 再聚波士顿 / 庞 静（1977 级工物）
- 20 清华，是一种信仰 / 吴剑平（1987 级水利）
- 25 七律·忆清华 / 包 伟（1987 级电机）
- 26 清华给我前行的力量 / 汪国庆（1987 级材料）
- 29 行走在“一带一路” / 马 麟（1998 级水利）
- 31 分别后的这十年 / 刘静琨（2008 级电机）

我与清华

- 33 清华情缘 / 曾昭堃（1960 届土木）
- 38 学生、挚友邓澍宏 / 卫景彬（1970 届力学）
- 41 清华教我挑重担 / 杨定英（1968 届汽车）
- 44 记我的班集体——水资 5 / 武晓峰（1985 级水利）

清芬挺秀

榜上有名

- 48 聂海胜校友荣获“八一勋章” / 田 阳
- 48 三位清华人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 田 阳
- 49 吴北生：英雄无言 岁月有声 / 吴新姿
- 53 西域边城的科研探路人
——访 1998 级水利系校友孙福宝 / 任风远

- 58 厉侃：科研报国，矢志初心 / 祝传海
- 62 李浩然：多面中国的观察者 / 法学院分会
- 64 姚东：为了这口“气”，他一头扎进故乡 15 年 / 桃林
- 66 李寅飞：没有浪费所学，想成为相声名家 / 梅建明
- 68 厚植爱国情怀 坚守为民初心
——在 2022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夏帕克提·吾守尔（2002 级精仪）

校友联络

- 70 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王希勤当选清华校友总会会长 / 钱箐旒
- 70 邱勇、王光谦赴青海看望慰问校友并参加座谈 / 青海校友会
- 71 王希勤率队赴贵州考察并看望校友 / 国内合作办公室
- 71 校友总会 2022 年第一次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举行 / 校友总会联络部
- 72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艺术研究与实践学习班”开班仪式举行 / 校友总会
- 72 2022 “昆山杯”清华校友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 / 宗和

各地校友会简讯

- 73 湖南省清华大学校友会正式成立 / 湖南校友会
- 73 北美校友会联合会会员大会召开 / 北美校友会联合会
- 73 2022 年甘肃校友会年会召开 / 甘肃校友会
- 73 “河南校友会校友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 河南校友会
- 73 2022 级天津新生座谈会举行 / 天津校友会
- 74 纽约校友会举办 2022 线上迎新会 / 张文心
- 74 韩国校友会举办清华论坛 / 韩国校友会
- 74 青岛校友会举行 2022 级新生座谈会 / 王玉海
- 74 南京校友会举办 2022 级新生欢送座谈会 / 南京校友会
- 75 沈阳校友会召开庆祝母校建校 111 周年大会 / 沈阳校友会
- 75 西雅图校友欢聚一堂共迎中秋 / 原博
- 75 南安徽省校友会举行夏日野餐会 / 南安徽省校友会
- 75 2022 波士顿校友会迎新活动举办 / 颜昊

校友消息

- 76 物 602 班不简单，全体同学“八零后” / 宗和

人物剪影

77 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张彭春在清华学校（1923—1926）/金富军（1994级物理）

84 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 / 袁帆（1975级建工）

92 姜书阁：宦海沉浮不改书生意气，柳暗花明续写传奇人生 / 郑文会（1959届土木）

回忆录

96 我的清华六年 / 吴宗济（1934届中文）口述

103 我的清华情结 / 卢谦（1950届土木）口述

史料一页

109 从《清华周刊》发现中国 / 胡一峰（2002级硕，人文）

114 杏坛传奇——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 / 黄加佳

怀念师友

121 赵元任：好玩儿的大师 / 陈来（教）

124 许孔时——为“软件”起名字的人 / 胡珉琦

128 思念父亲张澜庆 / 张延宝

132 不朽的张兴华 / 鲁一夫

135 缅怀西南联大杰出校友胡邦定先生 / 西南联大博物馆

136 装甲兵工程学院原院长黄庆华学长逝世

137 深切缅怀建筑史学家孙大章先生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137 七律·怀念敬爱的范钦珊老师 / 王社民（1977级力学）

138 邹光华学长逝世

139 送别丁文魁学长 / 天津校友会

140 徐叙瑢院士逝世 享年 100 岁

140 於崇文院士逝世 享年 98 岁

141 建筑学院郭德菴教授逝世 享年 92 岁 / 建筑学院

141 悼念简讯

荷花池

142 重读关广志先生——《灿然天地》读后 / 马国馨（1965届建筑）

146 拙笔铭记历史 告慰清华英灵 / 田芊（1970届精仪）

152 新清华的一代人 / 侯宇燕

154 成为未来的思想者和创造者 / 殷雅俊 (1980 级水利)

诗词书画选登

156 清华师生缘 天涯共明月 / 孙远慧 (1977 级力学)

158 贺香港回归廿五年 / 吴硕贤 (1970 届建筑)

158 毕业三十年有记 / 汪长安 (1987 级材料)

158 七绝·题密云水库写生 / 蔡建中 (1974 级工物)

158 密云水库写生 / 文雅麒 (1974 级水利)

158 书法 葛庭燧院士的理想 / 张 飙

回馈母校

159 九坤捐赠扬善举 兴学育人铭惠泽 / 基金会

160 小米捐赠冠名教授, 助力大学延揽英才 / 基金会

32 读者·编者

封 面 近春园秋色 绘画 吴冠英 设计 王 鹏

封 二 清华要闻

封 三 海角天涯

插 页 今日清华

202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

2022年研究生毕业典礼

校友联络

第七届三创大赛各赛道决赛陆续展开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摄 影 石加东 李 派 解红岩等

插页设计、电子排版 吴振鹏

清华大学五位新领导就任

日前，上级决定，赵罡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家监委驻清华大学监察专员；许庆红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培学、王宏伟、李路明同志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新任校领导简介：



赵罡，男，汉族，1972年1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2019年3月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2022年8月起任清华大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22年9月起任国家监委驻清华大学监察专员。

姜培学，男，汉族，1964年9月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11月任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主任，2020年12

月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2022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许庆红，男，汉族，1970年10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研究员。2015年11月任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2017年7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2019年3月兼任清华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2022年8月起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王宏伟，男，满族，1974年1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2021年10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2022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李路明，男，汉族，1968年2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2018年6月任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2022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3700余名本科新生、9000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2022年8月17日，3700余名清华大学2022级本科新生走进清华园，开启一段崭新的追梦之旅。

在2022级本科新生中，内地学生3400余人，来自全国31个省份1000多所中学；港澳台学生80余人；国际学生约200人，来自全球约33个国家和地区。新生男女比例略超2:1；少数民族占比约17%，包括满族、蒙古族、土家族、仡佬族等26个少数民族。

今年是强基计划实施第三年，吸引了16000余人报名。经过基础能力测试、综合素质考核及身体素质测试后，最终共有922人被录取至致理、日新、未央、探微、行健五个强基计划书院。学校继续为来自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自强学子创造求学机会，录取国家专项计划及自强计划学生共440人，超额42%完成招生计划。

今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正式启动本科招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在提前批次招生，共招收22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今年6月新成立的“为先书院”也首次招收本科生，秉承为国家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使命，其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突出的人才培养特色，最终录取122名“敢为人先”的学子。

今年还扩大临床医学类的招生规模，在总结原有医学实验班教学、育人方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全新升级后的临床医学八年制“卓越医师—科学家”项目。最终共招收67名成绩优异、以成为“具有高度人文情怀的顶尖医师—科学家”为目标的优秀学生。

8月18日上午，清华大学2022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线下设置了24个会场，并通过雨课堂平台同步双语直播。近500名新生代表在综合体育馆主会场参加典礼，3000余名新生在分会场观看现场直播。典礼上，校长王希勤发表了题为《慎独不孤 众行能远》的讲话。

8月23日，清华大学敞开怀抱迎来9000余名2022级研究生新同学，他们将与此座百年学府共同成长，展开人生的崭新画卷。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也迎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8月31日上午，2022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线下设置了34个会场，并通过雨课堂平台同步双语直播。近500名新生代表在综合体育馆主会场参加典礼，5000余名新生在分会场观看现场直播。典礼上，校长王希勤发表了题为《惟真惟善 易知易从》的讲话，鼓励大家“做学生，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做学问，惟真惟善、易知易从”，希望同学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养成从实践中找问题的好习惯，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受疫情影响或由于其他原因没能来到会场的新生，通过网络直播参加了开学典礼。学校还特别邀请了研究生新生亲友、广大师生和校友，以及关心与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朋友“云端”相聚，共同见证2022级研究生新生人生的重要时刻。

(宗和)

清华大学成立为先书院

6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为先书院成立仪式暨书院院长聘任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校长王希勤，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副校长彭刚等出席仪式。仪式由彭刚主持。

王希勤首先对为先书院的成立和欧阳证就任院长表示祝贺。他强调，成立为先书院是学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强化本科教育和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切实举措，也是学校推进院系治理体系改革和工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成果。杨斌宣读了为先书院成立的决定。为先书院按照学校实体机构运行，聘请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精密仪器系教授欧阳证担任首任院长。校领导王希勤、杨斌、过勇、彭刚，为先书院院长欧阳证、

副院长王秀梅共同为书院揭牌。随后，王希勤为欧阳证颁发书院院长聘书。

欧阳证在发言中表示，为先书院的培养目标是定义未来的科技领导者，要以培养工程科学国际顶尖的学术、产业、管理人才为先，以发展中国科技创新的核心关键技术为先，以探索清华新时期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先。书院将以科技前沿方向为主导，不局限于现有专业和行业，更加注重基础与通识，精心设计通识课组、科学基础、工程基础、专业课组和创新实践课程体系，融入全球领导力、创意设计等课程，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着力培养学生坚实的理工基础、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卓越的领导力。同时鼓励学生在本科阶段根据个人志趣，拓展到若干重要工程领域方向去深造发展。（书院管理中心）

“2022 和合文明论坛”在清华举办

9月9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儒联）、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2022和合文明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德国、英国、印度、斯洛文尼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参会嘉宾围绕“和合共生·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主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联会长刘延东线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国际儒联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线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邱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由彭刚副校长主持。

刘延东表示，本届论坛以“和合共生·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为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她提出四点希望：秉持以人为本，让数字文明惠及众生；提倡兼容并包，让数字文明“各美其美”；推动交流互鉴，让数字文明“美美与共”；促进开放合作，共塑数字文明新秩序。邱勇希望论坛的召开以及交流的成果能够有助于推动数字化发展，有助于为建设数字文明、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启示。多位与会嘉宾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发表主旨演讲。国际儒联副理

事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主持了主旨论坛，并代表论坛主办方作闭幕总结。本届论坛还设立了“数字时代的文字、文献与文明”“数字时代的文明交流

互鉴”“数字时代的国际儒学研究”三个主题论坛。作为国际儒联的重要国际品牌论坛，和合文明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

(郭玲)

清华大学主办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

7月3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共同、综合、合作”。在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多国前政要、驻华使节、智库负责人重点讨论了如何推动当下被中断的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前外交部长哈拉齐等出席论坛。来自海内外的三百余位驻华外交使节、智库学者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参与讨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清华大学校长、世界和平论坛主席王希勤，世

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等出席论坛。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主持开幕式。

本届论坛设4场大会、16场小组讨论。大会讨论的主题有重塑世界和平、欧洲安全秩序、联合国与国际秩序、区域组织与地区秩序等；融合小组讨论的主题有阿富汗人道主义挑战与国际协同应对、乌克兰危机与欧洲安全、在动荡世界中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印太”战略与地区安全等；其他小组讨论主题有“逆全球化”走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联合国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等。

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论坛宗旨是促进国际安全对话，增进彼此了解互信，推动思想观念创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李含)

清华男篮女篮获得第24届CUBA全国总冠军 首次实现包揽CUBA男女篮双冠

第24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男篮一级联赛·全国总决赛7月31日在重庆落幕，清华大学队以89:86的成绩击败对手广东工业大学队，实现清华男篮历史上首个三连冠。此前，在7月21日举行的第24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女篮总决赛上，清华大学女篮以64:59的成绩战胜北京师范大学女篮，以七战全胜的战绩荣获

CUBA全国总冠军。至此，本届CUBA比赛期间，清华女篮、男篮双线夺冠，实现了清华大学历史上首次包揽CUBA男女篮双冠的传奇。此外，清华男篮还曾包揽2016年第18届、2020年第22届、2021年第23届CUBA全国总冠军，清华女篮曾包揽2017年第19届、2018年第20届CUBA全国总冠军。

(团委 体育部)

难忘清华园

○王锦燧（1962届机械）



2011年4月，王锦燧学长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

时光飞逝，从1957年我步入清华园的那天起，至今已整整65年了。当年我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如今已成为耄耋老人。岁月的流逝带走许多往事，但我对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还是历历在目，母校当年的容貌，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依然印在我的脑海中。

1957年夏天，我结束了在福州市福建师大附中高中阶段的学习。当时，正值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在全国参加高考的25.2万考生中，只招收了10.6万名学生，我能被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录取，真的是非常幸运。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心中充满喜悦并奔走相告，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

那年9月1日，我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我养我的父母，在仓前山龙潭角船轮码头乘船离开家乡福州。沿途在江西鹰潭火车站转乘学生专列，经过十天十夜的行程

才到达首都北京。记得9月10日早晨，当到达前门火车站时，清华大学的校车和志愿者已在车站迎接我们。我们满怀兴奋之情到清华报到，住进了新建的东区学生宿舍8号楼。从此，我的五年半大学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开学第一天，在清华大礼堂，学校为新入学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时任校长蒋南翔热情讲话，他希望我们在大学学习生活中，要培养自己勤于思考的能力，将来自立于社会；他号召大家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体育界老前辈马约翰教授发言，他满怀激情地鼓励大家要注意锻炼身体，做一个健康活泼的青年。老师们的这些教导在我们一生中铭记于心。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期间，我们紧跟国家政治生活步伐，参加了国庆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游行，参加了整风反右的学习，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还融入到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我们还经历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满怀信心，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学校十分重视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业和专业基础课的训练。入学期间虽然有各种活动，但我们都认真对待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授课学习，重视机械制图学等基本训练。各门课程的授课地点多在固定的第一教室楼、第二教室楼及阶梯教室进行，各门基础课程的实验多在科学馆、化学馆和

□ 值年园地

金相实验室完成。为了能准时到达指定的教室，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奔走于学校东西区之间。每门课程结束后进行的严格考试或考查，都促使我们认真学习、刻苦钻研。

作为机械系的学生，我们还必须参加金工车间的实习劳动，并到工厂进行专业课程实习。结合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的学习，进行了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的课程设计，并进行了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削刀具、金属切削机床的专业课程设计。在毕业设计阶段，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进行毕业设计项目实习和调研。最后在学校完成了毕业设计的全过程，通过了毕业设计课程的答辩。

除了学习，我们也有多姿多彩的课余生活。除了晚上自觉到教室进行晚自习外，学校图书馆是我们必去的最好的自习场所，尤其是到了星期天，我们都在图书馆里度过。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到大操场参加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已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培养毅力，我和同学们还经常从学校西门长跑到颐和园门口。



1982年校庆，王锦燧学长（前右2）与同学们返校，庆祝毕业20周年

此外，我们还在体育馆学习游泳，冬季在学校滑冰场练习滑冰。特别是后来修建了露天的西湖游泳池后，每到暑假我们都会去那里游泳。周末，学校的各个食堂都会组织周末舞会，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也陪伴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完成学业。

1962年12月，当五年半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在西大饭厅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宴会和舞会。当我拿到毕业证书时，心中充满无限感慨，美好难忘的大学生活这么快就将结束了。站在二校门前合影留念时，十秒钟的毕业照，却融汇了我们五年半学习生活点点滴滴的收获，那种心情如今仍铭记于心。感谢祖国、人民和学校对我的培养，学校良好的人文环境给予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感谢学校各位老师的精心教导，是他们严谨的教书育人给了我最好的教诲，指引我们立身做人，勉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成就事业，追求卓越。

好儿女志在四方，我们全班同学都服从组织分配，高唱《毕业歌》离别母校。

此后，我们在祖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奋发上进，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有幸到北京市人事局报到，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制造系任教，开始了我的大学教学工作。在我的工作生涯中，从事过23年高等教育工作，经历了5年驻外教育外事工作，在原国家轻工业部、中国轻工总会从事了10年的行政管理工 作，又在国家科技社团组织工作了12年。我实现了清华母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与

此同时，我也深深为各位大学同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这些年来，我也偶尔返回母校，怀着对清华园的眷恋，每次都力图寻找大学时代生活的足迹。母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字厅后面“水木清华”牌匾依然悬挂，美丽的二校门后的草坪两侧清华学堂、科学馆和草坪前方的大礼堂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扩建后的图书馆更加壮观，古老的西区体育馆更显勃勃生机。学校东区变化最

大，陪同我们度过五年半生活的东区8号学生宿舍楼已不复存在，学校主楼两旁建筑林立。随着学校的发展，新兴学科和学院不断建立。我由衷地为母校的发展感到高兴，母校已经向着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步行。

在毕业6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母校焕发青春的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022年4月于北京

四十年交往话变迁

○多文礼（1977级化工）



多文礼
学长

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有北京同学跟我慨叹人生跨越大，意指我从遥远落后的小乡村，到了大都市见世面。还说有可能出国，会更开眼界。那时谈人生，开玩笑。如今，身在加拿大，感慨我们这代人，目睹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在校期间说得最多的是又红又专，还有强调体育锻炼，“健康工作50年”，其涵义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意思相近。

2012年为纪念毕业30周年出版的《延

伸的墨迹》，内有我一短文，以坐火车的经历，感受中国的巨变。我今年毕业40周年，继续延伸，回忆一些琐事，从多个视角感叹时代变迁。

1980年的获奖小说《陈奂生上城》，反映了那时的城乡差别。1978年3月入大学后，我也上城了——京城。初次去书店看到那么多图书，眼花缭乱，竟然有专为高考准备的整套数理化复习资料，感觉不久前，我多么想要它！于是为正在上中学的弟弟买了一摞。或许因老家天晴日晒，风沙大，年轻妇女常年都戴口罩，围头巾，当时青睐一种鲜绿色的方形头巾，却难以买到。可我发现北京商店里有的是，就给我三姐买了一块。还见到老长辈们说过的最有名的大前门香烟，便给我哥买了一条。

没想到，靛绿头巾的出现，在方圆邻里引起关注，好多人，几次找我们家，寄钱让我帮助购买。就这样，我成为驻京

□ 值年园地

“使节”，买过各种样式的衣物，甚至猴皮筋儿。我多次收到汇款单，频繁逛商店，去校内邮局寄包裹。邮包送达有快有慢，但从未丢过。当然，最好还是赶上放假时我亲自背过去，甘做快递小哥。

我不仅把“洋”玩意儿引入家乡，也会携“土”特产回京。1979年初寒假返校时带来最好的年食，有雪白的馒头，金黄的油馍、馓子等，让同学们尝尝。别的同学也从外地带来食物，我都觉得好吃。但好几位北京同学说我带来的没什么味道，不甜不咸。头一次听说要往面里添盐加糖，大概这就是生活的地域差别。暑假后带来的西北特产，倒是很受欢迎。“吃瓜”是当下网络热词，但我打小就看重，从几千里外背来几十斤，有蜜瓜、西瓜、白兰瓜。因为家乡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白兰瓜尤其香甜。那时北京没有这个，算填补空白。见同学们喜欢，受到鼓舞，后来一次比一次带得多。都说礼轻情意重，那我礼“重”呢？情谊更重吧！从大学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再到中科院化冶所，我一直坚持背瓜入京。后来，也让老丈人家尝到了这白兰瓜的“甜头”。1981年夏那次，因正道铁轨被雨水冲垮，借道北上回京的70次列车人满为患，车门根本打不开。在武威站送行的朋友，将我和行李从车窗塞了进去。所带的瓜袋太重，推进车里砸着人了，差点惹麻烦。1983年夏，带两袋瓜回京，北京站下车后转乘仅有的1号线地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在玉泉路站下车后分两次把瓜袋搬上去，可能旁边人以为我是在地铁里摆地摊。后来，又将部分瓜转运到清华南边的化冶所。过了几天，我邀请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多位同班同学，搞了个毕业一年后再相聚

的瓜宴，同学们兴高采烈，畅谈毕业后的经历感想，让我觉得千里运瓜虽遭难堪，但非常值得。

再说就要涉及科技了。有老乡朋友想要一架120双镜头照相机，托我在首都买。这型号，如今属古董，当初乃新式武器。几个月里，我带着现金和工业券去了无数趟王府井、东风市场、前门大栅栏，可是都没货。后来是刘莹同学询问她身处广州的弟弟帮我完成任务。还有1982年夏，我大姐带小孩从内蒙古、弟弟从西安来北京一起游玩。藉同学帮助，安排他们都免费住在清华宿舍楼里长达两三周。徐静远同学把相机借给我，并教会我操弄，从而为我家人在北京聚会旅游留下美好的珍贵记忆。

现今的年轻人，看电视少了，玩手机多。参照时髦的元宇宙概念，当年的电视便是元世界。80年代中，大姐问北京卖不卖彩色电视机？我了解到，当时的彩电要进口，基本来自日本，得凭票买。感谢岳母帮我找到一票，买了一台夏普18吋，彼时算作大型彩电。那种阴极射线管（CRT）电视，厚度超屏幕尺寸。暑假坐火车先托运至银川，然后转乘长途公交车去内蒙古阿拉善。跟到银川接我的姐夫一起，在渺无人烟的黄土沟中途下车，我俩轮换背扛着大方盒电视和我的行李包，在戈壁滩上步行十几里才到家。年轻一代能想象这样的负重前行吗？

后来留学，将城乡交流演变为中外交际，包括货币兑换、礼品互赠、语言翻译等。我第一次出国，丹麦导师为我预买了德国汉莎航空的机票。去代办处确认时，柜台问我，愿不愿意改乘中国民航？我很吃惊：为什么？她说国家缺外汇，如我肯

改，就等于为中国挣到一笔外汇。要知道国家当时的外汇储备仅二十几亿美元。其实，这是我初次坐飞机，哪个都一样，何乐而不为？又有谁敢想，30年后的中国，已变成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万多亿美元，涨了一千多倍。如今想来，我那次改乘国航飞机，相当于为中国外汇储备的第一桶金，多添了珍贵一粒。

到丹麦下飞机后，被导师接到哥本哈根一旅馆。当天导师夫妇请我吃晚饭，他们非常友好，喜欢中国文化，还点了茅台酒。中外交流这般有意思，那可是我头一次品尝这牌儿国内产的玉液神酒。几个月后我女儿在北京出生，“师母”得知后，特别订制了一把银勺子，上面还雕刻有女儿的名字，送她做出生礼物，令我十分感动。

2011年4月，我参加了化工系1977级有一百多同学回校的盛大聚会，庆祝清华100周年诞辰。那次十分幸运，抽签决定我受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由中国最高领导层出席的官方校庆活动，现场聆听国家主席、清华学长胡锦涛讲话。一位此前



2011年4月，为庆祝清华100周年诞辰，一百多名清华化工系1977级同学返校欢聚。同班同学在当年宿舍5号楼和12号楼大门口留影

不认识的年轻人，现任清华校友总会联络部部长田星燕，安排指引我去大会堂，关键时帮我解决了遇到的麻烦，才按时到达会场。对田星燕校友及清华校友总会感激有加。2018年4月，我又返校参加了清华1977级入校40周年庆典。校庆活动之一是号召级友们写文章，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后头一次的高考经历。我的文章《民勤县第一个清华大学生》，刊登在北美清华校友联合会的网站（NAFTHAA），有超2万的阅读量。希望继续与母校和同学们保持紧密的联系。

科研工作更需交流。出国后得知，在绿色环保领域，欧洲一直领先。当年的中国，尚未重视此事。随着不断发展，后来居上，如今中国的排污标准比加拿大严格多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产量名列前茅，甚至世界第一。几年前由两位清华校友发起，成立了中国-加拿大生物质能源中心，组织与帮助双方合作交流。作为成员之一，我曾到国内多家大学、研究院的生物质转化设施以及纸浆厂参观访问，报告交流。亲身感触到中国碳减排领域的实质进步，亲眼看见多处大面积的风力发电厂及光伏发电厂，倍感欣慰。

离开母校40年了，自慰此生，在全球目标一致的绿色环保、碳减排和二恶英（有毒物）控制领域略有贡献，多次获奖，包括加拿大制浆造纸工业协会的和加拿大化学工程学会的奖项。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逐步崛起，也为城乡及国际交流提供了无限机会。真心希望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持互通，合作共赢。平凡的自己，只能写点这样的散杂文字，与同学、朋友做些交流。

2022年3月8日于加拿大温哥华

毕业四十年 再聚波士顿

○ 庞 静（1977级工物）

一年一度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是4月18日举行的。参加完比赛身心俱疲的我，本想到家之后为自己煮一碗热汤面，冲个澡就躺到自己的床上，把这些天亏的觉全补回来，然后整理照片，满足各地来参赛同学们的期待。可是不小心看了微信群，任以实（1977级物理）的这段话：“作为孤苦伶仃的一位（物师7班），我终于感到清华1977级同学间的亲密感情，见识到各位大神的能力，特别是女神们的能力、能量和朝气。”莫名其妙地令我心中那些感觉都要马上顺笔流出，不然其他的事情是做不下去了。

我们这一届与其他各届最不一样的就是同学们的年龄差距特别大。入学时，有的同学已经拖家带口，过了而立之年；有的同学还是懵懂叛逆的少年郎。今年我

们毕业40年，虽然很多同学退休了，但是还有很多同学在工作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班的张家驹还没有退休。聚会前的一个星期他才决定从纽约过来。如果他不来，我也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物71班）。而正是因为张家驹来了，我们系成了这次波士顿聚会出席人数最多的冠军。

任以实赞了女神们，我不仅同感，而且还要记录实据。

跑马女神张全（1977级工物）刚陪完女儿度假下了游轮，直接飞到波士顿参加聚会。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却在跑马中与男生们比肩，最后完胜。这是张全第一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2018年丈夫彭小航（1977级工物）送给她的圣诞礼物是给她报了芝加哥马拉松比赛，抽签也抽中了，从此她开始跑马。张全第二次

跑马是参加了去年十月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马拉松BQ（波士顿马拉松资格赛）。张全在这次比赛中超她年龄组BQ时间20分钟，是几个年龄组的第一。张全过去在学校没有参加过运动队。与小航牵手之



2022年4月16日，清华大学1977级北美部分同学于美国波士顿纪念毕业40周年。后排左起：和志刚、彭小航、段士良、甘琦、杨涛、毕道深、韦大同、程民宪、林晴、牛志强、李芄、牟文殊、蒋和明、唐荣、王永智、张家驹、任以实、唐森、吴潮光、安宏、傅钢、刘艺平，前排左起：施志敏、司纛、刘惠敏、李圻、张丽萍、金建秋、叶玲（1978级）、宋晓晖、许平、张全、庞静、于卓琳、史燕豫（1978级工物）、张艳（唐森夫人）、熊小娟（王永智夫人）

后,耳濡目染的熏陶之下,科学训练,持之以恒,现在她每个星期的跑量是45英里。毕业40年之后,见到自己的室友、同学还这么英姿飒爽,我们的自豪感也跟着爆棚。

波士顿马拉松使我们这些从校园分别40年后的东南西北的同学们聚到了一起。这样的聚会一定开心快乐。晚会的主持人叶玲(1978级化学)不仅在台上光芒四射,还设计了有趣的配对活动。她事先收集了与会的老同学们幼时的照片。聚会中,把大家分成几组,把这些婴幼儿的照片放到大屏幕上,让大家猜是谁,猜错减分,猜对得分。哪一组得分最多哪一组胜出。她事先声明胜出的组会得到意外惊喜。我们组胜出之后,全组上台站成一排,然后叶玲让输的那组也上台,站在我们前面。正当我们洋洋得意之时,叶玲发出指令,后排人为前排人揉肩捶背。哇!早知如此……

与人相识很有学问。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自我介绍:你是谁?从哪里来?与人不同之处是什么?宋晓晖(1977级计算机)自我介绍之后,对参加聚会的所有人讲了结论:在清华时你们这里没有谁的Computer比我的大,因为她的计算机就是学校的计算中心。讲这话时,真是底气十足。在学校时,我们年级的男生宋晓晖(1977级化工)尽人皆知,相比之下女生宋晓晖默默无闻。这几天相聚,男生们说在波士顿终于见到了正牌的宋晓晖。

在学校时我并不认识李圻(1977级自动化),她称自己是这次聚会活动的二传手。她当年在学校排球队是二传,现在继续担当二传角色。近几年,她一直接待来波士顿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老同学们。这

次聚会正是因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而起。四位同级校友牟文殊(1977级自动化)、彭小航、张全、韦大同(1977级电机)和一位同级校友张丽萍(1977级化工)的儿子力昂,都要到波士顿来参加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工物系的和志刚提出,今年恰好是我们毕业40周年,应该借此机会大家聚一下,同时还可以为参加马拉松的级友们加油助威。聚会之前的一个月,李圻就开始和当地老同学们商量聚会活动,制订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她亲自安排马拉松运动员们的食宿和每天活动,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令人折服。

我们预定住房Airbnb1的召集人刘惠敏(1977级工物)不仅事先联系预定了房子,还主动担当了女主人的角色。她天天为大家张罗早餐,安排车接车送的进进出出。因为有她,我们房子里的气氛非常温馨。

聚会之后,大家称波士顿的施志敏(1977级自动化)是模范义工,一个成功团队必不可少的队员。因为特殊原因,她不能和大家聚在一起,可她一直是这次聚会服务和后勤的主力。Airbnb2没有完备的厨房条件,她每天早晨给住在那里的四位同学送丰盛的早餐。聚会之前她说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住在Airbnb1的同学们就开始流口水。为了满足大家,她又为我们准备了家制的香蕉面包、芒果酱和酸奶,买了著名的道口烧鸡,还亲自送到我们的住处。施志敏和甘琦(1977级自动化)到机场接许平(1977级工物)和段士良(1977级自动化),在机场内转着圈儿找人。因为飞机到达时间是晚上9点多,施志敏专门为他们两人准备了面包和韭菜盒子。

当地的老同学李晓黎(1977级计算机)无法参加聚会。周日早晨,她精心为

□ 值年园地

大家准备了英文诗讲座。她请大家坐在后院里，她用网络视频会议zoom meeting教大家怎样欣赏英文诗。本来还计划带领大家一起打太极拳，但是大家凑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时间太紧，只能做罢。

高手在民间。张丽萍来参加聚会，也陪儿子参加跑马，一举两得。来之前，她为这次聚会特制了月饼，而且独立包装，带到会场，送给每一位老同学。从里到外的精致，真切地体现了她的心意。她送我的是一件小竹屉的包装，很别致，着实引起了同伴们的嫉妒。

周日下午天气突变，风夹杂着小冰粒，气温骤降，我们决定回到房子里闲聊。就税务的话题，于卓琳（1977级计算机）侃侃而谈，轻松为老同学们避税的问题答疑解惑。成为这些同学们中的一员，我情不自禁地自豪快乐。

值得记录的故事并不仅仅限于女同学之间，这次聚会男同学的故事也很多。三位跑马大神，小航是我们系的，早就认识；另外两位牟文殊和韦大同，这次我才把名字跟他们的脸对上号。当我把镜头对准跑道上的他们时，我的感觉非常简单，就是“真棒”。但是这么简单的感觉却令我心动，想落泪。现在还没有时间想为什么，以后慢慢琢磨。

世界上有很多马拉松比赛，可能只有波士顿马拉松需要取得参赛资格。张丽萍的儿子年轻，他那个年龄组需要破3小时才能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要知道突破3小时是非常难的。小航已经参加过12次跑马了，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波马。这次比赛他创造了3小时26分钟的自己的最好成绩。我特别相信运动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科

学和坚韧是训练中必不可少的。小航每个星期的跑量都是70~80英里。这次聚会，我刚刚认识牟文殊和韦大同，对他们了解有限，但我觉得他们能参加波马，一定非常了不起。“能上清华就是聪明人”大概是社会共识，其实坚韧是清华学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跑神们在跑道上跑，和志刚在看栏外面跑，而且是跟着跑神一起跑。他要为我们的每一位跑神加油。可惜我们看见小航的时候太晚了，和志刚跑得不够快，没追上。赛事刚开始的时候，刘艺平往伤心坡赶，但由于对当地路线不熟悉，走错了。等他到伤心坡跟我们会合时，他已经连跑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差不多耗掉了半马的体力。这次的体验，加上跟杨涛（1977级计算机）走得近，闹不好他很快也能成为跑马的一员。

我计划利用这次机会向吴潮光（1977级工物）了解一些旧事。可是老朋友们很久没见面了，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尤其像老吴知名度这么高，大家都要跟他聊一会儿。他的时间变得特别宝贵。但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他牺牲了自己听诗歌欣赏



四位跑马健将合影，左起：牟文殊、张全、彭小航、韦大同

的时间，还抓紧坐车的时间给我讲旧事。

安宏（1977级化工）是这次聚会活动的执行总裁，聚会之前他亲自去我们聚会的会所和吃饭的餐厅踩点。同学们从外地过来，他和当地同学们一起接机送机，非常周到。周日的午餐是在一家四川餐厅，这家餐厅是他创建的，经营比较成功之后，他转手卖给了现在的老板。一边吃饭，一边听他讲开餐厅的故事。按他讲的，如果能够经营餐厅，那几乎什么都行了。聚会之前，大家曾经讨论要为这次聚会做一个纪念品。安宏设计，得到了筹备组支持。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人收到了一个2×3英寸大小的纪念牌，一面是40th Reunion 1982—2022的标志；另一面记录了上学时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25元人民币，一顿饭花7分钱人民币，豪华享受是电视和冰箱，几乎每个学生都有的东西是书包、自行车和收音机，那个年代的明星是侯宝林、李谷一、袁伟民……我认真收藏了这个纪念牌。

我特别感激甘琦，他主动请缨接送外地同学。严格说，他并不住在波士顿本地，开车回家也有一段距离。但是聚会之后，别管多晚，他都毫无怨言地先把我们送回住处。接我们之前，他都详细问我们的计划和要去的地点，然后自己查好路程的时间留出余量，非常给力。他放弃自己观摩赛事，保证接送我们不误事儿。庆功宴之后已经很晚了，他送我去酒店，还帮我把行李拖进去才走，非常周到。这次聚会，我近距离地体会了这些老同学的智慧、幽默、风度和见识，确实比我认识的大多数男生更绅士。

这次聚会会有很多对神仙眷侣，每一对都令我羡慕。我特别想在这里记下两对

夫妻。金建秋（1977级自动化）和李芄（1977级自动化）专为我背来三角架，建秋不紧不慢，李芄谦谦君子，两人特别和谐。唐森（1977级化工）夫妇，两人都是专业级的声乐家，他们在晚会中引吭高歌，安宏从家里搬来了专业级的音响设备，我在现场的感觉一点不亚于坐在歌剧院里的享受。

由于近水楼台和近朱者赤，波士顿的几位级友们不仅热心接待来参加赛事的级友们，而且他们也开始参与体验马拉松运动。杨涛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参加了60多次跑马，但现在还不够格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其实，让大家乐的事情不仅仅是上面的这些，还有很多糗事也是让人笑得肚子疼。每当合影的时候，本来挺正常的一个人，只要一对着镜头，马上变成了又僵又傻的少年郎。平时想变得年轻却不能如愿，现在一个大镜头就能把青涩的表情唤出来，真不错。

彭小航、牟文殊、韦大同、李圻、安宏、杨涛都是2019年获得波士顿200英里超级路跑接力赛男女混合队亚军的主力成员，当地的老同学们是当年赛事的主要后援队。他们集聚团体之力，挑战个人极限，做成了个人力不可及之事，而且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运动员集体成绩辉煌，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后援队，他们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如果没有当地同学们的精心筹划和任劳任怨的付出，我们的这次聚会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以后各地同学组织聚会恐怕很难与他们PK。

好了，我想记录的大部分都在这里了。下面开始整理照片了。

2022年4月20日

清华，是一种信仰

○吴剑平（1987级水利）

水木清华，大地清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清华。

我们7字班具有特殊的时代印记，入学于198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10个年头，毕业于1992年，正值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之时。在那个改革开放、激情澎湃的年代，同学们告别城市、乡村、矿区、草原，怀着青春梦想来到首都，如涓涓细流汇入清华。

水利水电工程系当时每个年级有4个班，我们水工71有30名同学。毕业30年来，同学们有聚有散，联系有多有少，但我们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清华人，并以不同方式维护着清华的声誉，守护着我们的班集体。这种超越时空的凝聚力，源于母校给予我们的感情的力量、实干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

一、感情的力量

人是感情的动物。清华是一所讲感情、有温度的学校。

在水利系，老师们对学生关爱有加。时任系主任董曾南和前后三任系党委书记虞石民、刘檀仁、李树勤，副书记胡和平、张国新，学生组长李志民、方兴、梁海波，班主任蔡明、聂孟喜、张丙印，副班主任王虹，辅导员马振宗、李卫、杨世平，低年级党支部书记、8字班辅导员倪广恒等，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我们。

清华最大的优势在于名师云集、群贤毕至。施嘉炷、张任、黄文熙、张光斗先生，以及我们入校前一年辞世的钱宁先生，都是水利系的骄傲。给我们讲授“水力学”的是冬俊瑞教授，课讲得好自不必说，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每次上课都西装革履，以表示对学生们的尊重。“水工建筑物”是我们专业的看家课程，两个学期，由王綦正教授主讲。王老师教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简洁明了，听他的课如沐春风。张超老师是我们大四暑假到辽宁观音阁水库工地实习的带队教师，也是我的毕设导师，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周维垣、刘光廷、谷兆祺、张楚汉、雷志栋、陈长植、王光纶、吴之明、才君眉、李仲奎、强茂山等诸师，有的虽未给我们上过课，但总听其他同学谈起。

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师，就是张光



大一时，同学们游香山合影。左起：彭卫军、吴剑平、陈宏能、赵全胜、杨宏昆

斗先生。我们入学时，张先生已不给本科生授课，甚感遗憾。记得大四第二学期，我们来到五教，准备听王綦正老师的课。当时三峡工程正在论证审批阶段，是全国人民更是水利系师生关注的大事。因此，王老师利用这节课专门请张光斗先生来给我们讲讲三峡工程，着实令大家喜出望外。在热烈的掌声中，年近八旬的张先生身着整洁的中山装，精神矍铄地走上讲台。张先生没有带讲义，先在黑板上画了两条曲线，表示长江，接着分析了三峡大坝不同选址方案的利弊。如此深奥、复杂、重大的技术问题，张先生讲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我们听得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大师就是大师！我留校工作后，有幸多次接触张先生，很多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正是诸位大师、名师、良师，潜移默化传递着清华精神，教我们为学、为事、为人，构成学子们共同的清华记忆。来自贵州的田涛同学经多年打拼，创业成功，一直希望回馈母校。2006年初，校友总会启动“清华校友励学金”项目，田涛获悉后，马上捐出20万元人民币，并连捐9年，资助学生240人次。这是当时校友励学金最大一笔个人捐赠，在校友中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

清华人普遍很“真”，真实、真诚、认真、较真，甚至天真、率真。这个特点在水工71同学身上得到生动体现。陈宏能来自四川普格县，讲起家乡的火把节、坨坨肉总是眉飞色舞，令人垂涎三尺。宏能自称酒量不行，但从不怕酒。大一的国庆节，多数同学外出，他和彭卫军约我小聚。老彭来自新疆，酒量极好，一瓶二锅头，三人几乎均分。酒喝完，老彭意犹未尽，我是头晕目眩，而宏能则不停地高谈

阔论，不时吼两嗓子。班里一聚会，宏能便拉着大家用“川普”划拳。寒暑假，我和宏能多次一起乘火车，30多小时硬座，我们二人搭档一路打“拖拉机”，竟未遇对手。本科毕业，宏能保留读研资格，在系里做了两年辅导员。念完硕士，他去了一家中字头单位。30多岁正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宏能出人意料辞职创办了金准咨询公司。率真的性格，实沉的干劲，他慢条斯理、有条有理地打理业务，公司已为上千个项目提供咨询。作为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宏能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顶尖高手。

童平森是湖南邵阳人，很有数学天赋，如不是高考中暑，导致数学大失水准，必然读了数学系。入学后，他想通过念双学位“曲线救国”，便自修数学系课程，岂料念了一年多，学校取消了数学双学位。老童感叹，真是没有学数学的命，只好修读计算机双学位。对于高数、普物和近10门各种力学，大家都学得七荤八素，遇到难题往往先问老童，他总是知无不言。老童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保送读研，工作后加盟了碧桂园，技术上绝对是把好手。

团结是清华人的基因。水利系同学格外团结，因为再小的水利工程，凭一己之力都无法完成，必须团队合作。尽管同学们性格、习惯等不同，但团结向上始终是水工71的主旋律。我们班唯一的留学生是马达加斯加的胡森，母语是法语，上课不大能听懂。于是大家轮流辅导他学习，加上老师们关照，胡森得以顺利毕业。清华有很好的体育传统，我们班大一就在系运会上勇夺团体亚军，仅稍逊于如日中天的水工51。其中，班长曾卫轻松摘得男子跳高桂冠，潇洒的背越式赢得一众女生青睐

□ 值年园地

的目光。机智灵活的贵州帅哥廖宇冬，高大健壮的湖南小伙王军，都是班级乃至系里篮球、足球、田径等各项运动的主力。我们的团支部工作也很突出，大二获评为全校首批“甲级团支部”。

学生时期的友情，并不随日久而淡忘。在水电系统或相关领域工作的同学，事业上自是相互支持。我们班在北京、广州相对人多，北京同学一般借外地和国外同学回来的时机聚会，广州同学则是有朋远来要聚、谁有喜事要聚、多日不见也聚。毕业20年返校大聚后，外地同学便争相做东，在每年校庆前后或约定时间邀全班同学欢聚。尽管子女都陆续长大成人，但同学们相逢仍是少年，吆五喝六，嬉笑怒骂，一如当年。

二、实干的力量

水利师生是名副其实的实干派。水利系功课多、压力大，水工专业不但要学土木系结构专业的大部分课程，还要学一堆与水相关的课程，不努力不行。更重要的是，水利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即使有半点马虎，哪怕小数点后第二位算错了，后果都不堪设想。认识实习，老师带我们去看过一个水坝。坝修得很好，可一点水都没有拦住，全从透水层流走了。这个失败的教训，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也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水利工作者的巨大责任。丝毫不严不实，结果可能就不是“水利”，而是“水害”了。

实干的前提是深入实际。那时，水工专业每年暑假都有实习，既增长本领，又磨练意志。生产实习，我和另几位同学被分到木工班。观音阁水库是碾压混凝土坝，为浇筑混凝土要用木头搭架子、装挡

板，形成模子。工人师傅先让我们扛木头方子，从坝基送到30多米高的大坝施工面。木头方子每根约10米长，15厘米见方，由于泡在泥水里，又脏又重。师傅独自扛一根走在前面，同学们两人扛一根还很费劲。更大的考验，是用大钉子把木板固定在木头方子上。“钉钉子”谁不会，但我们习惯于从上往下钉，而木头方子竖着，要从侧面钉，尤其贴着坝面钉难度更大。我试了几下都不成。师傅便做示范，同样的斧头和钉子，“当当当”三四下就好了。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干的背后，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在新水、旧水、泥沙馆都做过实验，很多同学的毕设课题也来自实际工程。“真刀真枪”，理论联系实际，是水利系人才培养的一个鲜明特色。

严谨务实的作风，给水工71同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来自内蒙古的刘志刚，无论上课做笔记，还是下课做作业，都一丝不苟，被全班一致尊称为“博士”。薛慧涛从山西运城考来，在我们107宿舍排老二，为人做事都很实在。每个寒暑假，他都“整麻袋”地带来家乡的柿饼，并乐呵呵地看着大伙儿将其一扫而光。北京同学AA制交纳的活动经费，这么多年都由老薛掌管，从未出过差错。毕业后，志刚供职于华北电力设计院，老薛在国家电网公司的二级企业，都是管理和业务骨干。李海洋，辽宁北票人，本科毕业保留学籍到鞍山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17年任省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现任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奉献了青春和汗水。

杨宏昆是云南昆明人，保留读研资格到原电力部成都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参加由世界银行贷款按FIDIC管理的二滩水电站坝工设计，也因欣赏成都的美景、美食、美女而扎根四川。后加入东方电气集团，参与巴基斯坦塔贝拉水电站工程的现场合同和施工管理。再后受聘为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采购专家，参与交通、能源、环境、农业等50多个领域、近百亿美元贷款项目的技术评估和实施监督。目前，宏昆在成都继续从事水利水电项目管理和勘察设计工作，同时兼任AFD、ADB、NDB、AIIB等多边银行高级咨询顾问。

罗晓东来自湖北知识分子家庭，严谨细致，斯斯文文，同梅贻琦校长颇有些形似和神似，毕业后赴美留学并定居。河南才子程卫东，思维敏捷，风趣幽默，学习生活非常自律，后赴美留学，现任Fluor公司技术总监，是管道工程和流量保证领域的Fluor Fellow，以及ASME VVUQ 60能源系统分委员会主席。山东汉子史永胜，满腹经纶，见解独到，多年在广东水利厅下属的研究单位工作。甘肃兄弟刘广平，能文能武，精明能干。

班里“唯二”的女生，更是撑起了半边天。胡群英来自江苏，是典型的好学生，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苏州某单位工作，三十年如一日。李燕涛是清华子弟，说话轻声细语，积极参与班级活动、推动集体建设，毕业后出国发展，回国探亲时都会和同学们小聚叙旧。

张汉宏，我们宿舍老六，来自广东曲江，课余经常插着耳机听随身听。他身体敏捷，柔韧性好，是校体操队的骨干队员，多次参加各种比赛，摘金夺银，奖牌无数，屡屡为校争光。可他却十分低调，

从不炫耀。毕业后，汉宏就在珠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发挥着重要的骨干作用。

马俊也是湖北人，笔记和作业工工整整，“工程制图”作业尤其漂亮，线条画得无可挑剔，仿宋字写得犹如印刷体。他性格沉稳、思虑周详，被同学们称为“老马”。老马和我是桥牌搭档，他善于记牌、精于计算，打到最后还能准确说出对方手里剩梅花3还是梅花4。我们一起拿过系里的双人赛冠军，并同六字班一对搭档组队代表水利系参加全校桥牌团体赛，因为有一轮失分太多，结果只得了第七名。本科毕业后，没有了默契的搭档，我基本上再没有打过桥牌。老马研究生毕业加盟中国交通集团，前些年进入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任战略发展总监。由于一直在京工作，加上热心细心，老马多年担任班级召集人。无论北京同学聚会，还是接待外地同学，差不多都是他在张罗。

仲霄来自大上海，见多识广，多才多艺，英语分级考试直接考到三级。军训结束不久，他就进入了学生文艺社团军乐队，担任大号手。在他的建议下，我大二参加合唱队，由此接触到大量优秀的外系同学，还有幸做过艺术团辅导员。如果不是仲霄当时的热心鼓励，可能我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仲霄毕业进入宝洁，之后自己做投资。近年，他参加了清华学生艺术团的校友合唱团，不时在班群里晒一晒演出的剧照或视频。假如当年功课少点，仲霄一定可以同时成为军乐队和合唱队的主力队员。

清华人干一行、爱一行、成一行。来自湖南株洲的胡冉，是班级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和年级第一任团总支书记，品学兼优，极其聪明，被戏称为“老狐狸”。他

□ 值年园地

保留学籍两年到经管学院读研，和我再次同班。胡冉曾任南航集团财务公司总经理、碧桂园副总裁，现任奥园集团副总裁、奥园美谷总裁，矢志打造“医美生态集成商”。来自河北唐山的汪俊宏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金融硕士学位后在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先后任办公室、国际业务部、零售业务部负责人；后赴美攻读MBA，回国后发起引进CFP认证体系，现于香港任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总裁助理、执委会委员。来自吉林的夏可夫，多年来立足深圳创业发展，是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高管，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无论深耕水利能源行业，还是从事其他行业，水工71同学都以实干和专业而各有所成。

三、信仰的力量

清华是一所有理想的学校。我多次听母校领导这样讲，也多次听校外人员如此评价清华。水利系系歌《水利建设者之歌》唱到：“改造自然，造福人类，永远是我们远大的理想。”我们班同学这样唱，也这样做。来自青海西宁的赵全胜是我们宿舍老大，历任水利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水工部副处长、副主任、副总工程师，现任院总工程师。老赵主持或参与了三峡工程竣工安全鉴定、金沙江上游水电梯级风险评估以及深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

四川大渡河沙湾水电站枢纽工程等一大批项目的验收、审查、咨询。他经常奔波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工程现场，系歌中“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就是真实写照。

彭卫军毕业后毅然回到新疆，在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从普通技术人员做到副总工程师，获得水利部和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特殊贡献专家等许多荣誉。他曾任十多个区内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主管总工，负责工程勘察设计；主持和参与了北疆供水、乌鲁瓦提等60多项自治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现场踏勘、方案论证或评审审核，为疆内外水利水电开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宿舍老四何宁，江西高安人，是跟女生一说话就脸红的帅小伙，大学五年长高了六七厘米。他在荷兰UNESCO-IHE获硕士学位，长期任职于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现任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是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



2017年5月，入学30周年摄于大礼堂前，前排左起：马俊、夏可夫、田涛、廖宇冬、岑建军、何宁，后排左起：薛慧涛、陈宏能、张汉宏、杨宏昆、刘志刚、徐仰汇、唐文哲、吴剑平

技领军人才，负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30余项，主持完成重大、重点工程的科研咨询和服务项目数十项。我们相信，这些数字一定会与日俱增。

岑建军，家乡浙江余姚，宿舍老五，和我是上下铺。入学时，我们乘同一辆校车从北京火车站到清华园。大学毕业后，建军做过外贸，1996年接触到聚酰亚胺材料，经过几年调研论证，2002年创办宁波今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今山”即由“岑”字拆分而来。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智能手机必不可少的PI薄膜。当时，只有杜邦等个别企业能生产。公司起步并不顺，第一年没能做出PI产品，第二年又赶上“非典”和大停电，后来还遭遇过台风，真是一波三折。由于实行差异化战略，坚持技术创新，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挺了过来。2010年以来，今山电子的PI薄膜陆续用于苹果、三星、华为等各大品牌的终端产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高端制造业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在建军白手起家的创业路上，我们有过多次交流，能感受到他身上清华人特有的家国情怀。此外，在我们毕业20周年时，建军自掏腰包代表全班给系里捐了一笔奖助学金，而那时他的公司才刚有起色。

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被誉为汽车界的“玄学”大咖。他在东京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日本尼桑公司研发中心供职，参与过多款车型的振动噪声性能（NVH）开发，积累了丰富经验。NVH是汽车内在品质最综合的表现，也是最难开发的性能之一，因此被称为汽车“玄学”。他回国后，2012年加入广汽研究

院，全面负责传祺车型的NVH开发，实现了NVH技术积累“从0到1”的突破，一跃达国内领先水平。他，就是来自陕西的徐仰汇，现任广汽研究院首席技术总监，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有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仿佛唱的就是唐文哲。文哲是广西桂林人，曾任团支部书记，交谊舞跳得好，围棋也下得好。2005年在墨尔本大学拿到工程管理博士学位，随即回清华做博士后，然后讲师、副教授、博导，2018年荣升教研系列长聘教授，现任建设管理系副主任。老唐是一名好老师，曾获校级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教学成果一等奖、精品课、先进工作者以及“中国项目管理发展二十年杰出教育贡献奖”等荣誉。清华关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荣誉，他几乎都囊括了。

在111年的清华校史上，我们水工71只是众多班级中的沧海一粟。讲这些故事是希望从一个点上折射出7字班同学的共同经历和精神风貌，反映一个时期母校教育栽培的成果于万一。尽管同学们所走的路不尽相同，但是每个人都有心中的诗和远方，不断努力做更好的自己。

七律·忆清华

○包伟（1987级电机）

卅载清华如梦中，青衣驾鹤欲追风。
新斋门口树犹绿，荒岛池边荷已空。
学业职场疑自误，生涯国运幸相同。
迩来剩有鬓霜染，且看儿曹再论功。

清华给我前行的力量

○汪国庆（1987级材料）



汪国庆校友

我出生在江西省彭泽县一个很小的乡村，虽然天生特别爱读书，被人称为“书呆子”，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小时候读的书很少。1982年，已上完初二未滿12岁的我，因母亲生病和年纪太小（年龄太小考上了中专但不能上），在家休学做农活。这一年看到弟弟和邻居家孩子上学，我很是伤心难过。我以前听说的最高等的教育就是中专和大专，对大学完全不了解。1983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在户外纳凉，听大人们在谈论彭泽县上市岭中学有个叫陈劲松的男生考上了清华大学，听他们那种羡慕的口气，我觉得清华这个学校好像很厉害，就这样，我在黑暗中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上清华。

因此，休学一年后再上初三的时候，我的目标就从考上一个中专变成了考上九江一中，我知道只有考上好高中才有可能上清华。中考报志愿前后，家长和当初中老师的亲戚们都劝我考中专，转户口早赚钱多好啊，上了高中又不一定考得上大

学，二姑父的弟弟6次高考也没有考上。我和他们哭闹了两个月，最后还是在乡村中学的何声恩校长帮助下把志愿改成九江一中。就这样我带着去清华的梦想去了九江市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那年，九江一中只从我们彭泽县招了8名学生。

从1983年的那个夏天算起，4年后的9月，我如愿到了清华大学；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36个小时，我是和高中同班同学王琦（水利系）一起到的清华，到了宿舍铺好上铺睡下，觉得床铺仍在摇晃，感觉火车还在开。还记得班主任王英老师来问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地对王老师：“能让我先睡一会再说吗？火车还在开呢！”

清华的学习生活有很多的乐趣，也因为到了清华认识了那个当年在家乡鼎鼎大名的陈劲松学长。他是水利系的，因为这些年彭泽县也没有人再考上清华，劲松兄后来还在清华读研究生，所以和他的交集很多，基本上回家和回校的路上都是受他照顾，一路听他讲三峡相关的研究。日子过得太快，劲松兄后来去了美国留学，联系就很少了，再联系上时，他已经是美国大学的教授。

到了清华，进了自己填的第一专业，心里还是很满足的。虽然我已经在高中跨越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差异，但是在见识和读书上与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还是差异很大，所以我尽量把时间放在学习上。特别是英语的差距尤其大，听不懂，感觉很尴尬，这一点直到多年以后我到美国做访问

学者才彻底调整过来。大学初期，高中好友也都到中国几大都市读书，同学之间的信件是少不了的，每次寄信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和100084的邮编让我很是自豪。

到了北京不习惯的事情真的很多，北京的冷和干燥是我没有体会过的，特别是冬天那种枯黄的感觉；吃的方面很是不习惯，食堂里的馒头吃两个都吃不饱。一个冬天过去，就发现自己的头发由乌黑变成了黄毛，人也长胖了，估计是没有控制好饮食。我们女生聚餐的机会不多，但是有一次印象深刻，我和老郎（同班程如烟同学）去五道口买羊肉，准备晚上几个女生去精仪系老韩（光7韩艳梅）男朋友（是清华老师）宿舍聚餐。火锅的炉子是一个小电炉，火力不够，大家为是不是要盖上盖子煮和煮多久才能打开吃争论不休。我这个从5岁开始有做饭经验的人对这个也没有概念，大家吵吵闹闹，很是好玩。我还能记得那天的刀切羊肉是免费来的。在五道口街上买羊肉时，小贩把切片羊肉交给我们，正付款时突然小贩拼命拉着小摊跑了，我和老郎都被吓傻了，才发现是城管来了。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小贩再来，我们就回了学校，就这样吃了一顿霸王餐。

在清华时还有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五年级时女生宿舍从5号楼换到7号楼，住在一层，偶尔发现窗户是可以拆下的，估计是前房东师姐的杰作，因为谈恋爱或做实验晚归可以进来。我们几个人很高兴能够这样。我们宿舍4个人，分别是材科7的金磊和贺立，材7班的林欣和我，我们经常爬窗归来，一直平安无事。直到毕业前有一天晚上，半夜我听到对面的贺立大喊一声：“有人！”我们惊醒后打开

蚊帐一看，一个黑影拉开门往外跑，我们也追出去，结果那人还是从一个破了玻璃的门框中跑掉了。回到宿舍，大家惊魂不定，分析研究是谁做这样的事情？不敢相信校园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早上起来，也不敢和楼管说，第二天我到五道口商场买上长长的大钉子把窗户钉牢，我们爬窗归来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在清华学习的过程中，让我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差距，听专业老师们谈陶瓷上的成就，长安街上的高压钠灯关键材料是清华课题组研究出的；我也喜欢上了实验室里面单调的重复工作，还能经常熬通宵或者早早去把实验室的炉子烧上。实验室里面的设备高大上，记得系主任黄勇教授对我说，你做这台热压炉烧实验的时候，就是一张张10元人民币往里不停地烧，让我对实验更生无尽的崇拜和献身科学研究的念头。但是真到北京陶瓷厂和景德镇的陶瓷世界实习之后，感到科学研究和工业化的差距好大。看到实际工业中泥巴水乱流，工厂里到处脏脏的，就是个小作坊的感觉。再读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我的内心便种下一颗小种子，以后要做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



2021年9月，1987级五位校友聚会合影。
左起：成方泳（光7）、莫志国（无7）、彭红澜（无72）、汪国庆（材7）、周海（计7）

□ 值年园地

的事情。这个决心影响了我后面的所有决策。我在中科院硕士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应用型研究所上班，然后在稍有一点经济基础的时候，用上海卖房所得48万加上存款2万开始创办上海暄洋公司，做钢铁防腐涂料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为很多大型工程项目包括跨海大桥提供防腐保护，在科技转化生产力的路上艰难前行。我们研究了一些具有特殊的高性能的绿色环保涂料，如“水性无机硅酸锌车间底漆”，将钢板预处理车间的VOC排放降低到只有原来的1.3%；桥梁专用水性抗滑移涂料也是非常独特的产品，用在非常多的大型桥梁的关键连接面保护上，改变了原有的不环保的措施。

在清华学习时，“牲口”如云，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做到及时调整心态健康生活也不是一件易事。比如，刚到清华的时候，英语和高等数学对我是很大的挑战，让我心生后悔，怀疑来错了地方。在三教晚自习时，偶然在走廊中看到报刊亭里有学长写的随笔之类，有一句“清华一条虫，外面一条龙”，让我心生希望，想着怎么着也得坚持下去，从这儿出去之后没准能有容易一点的事情做。更重要的影响，来自每天下午广播中“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豪言融入到了自己的血液中。2019年企业的工厂被江苏泰州市政府动迁，从此可以不用操心金钱，完全可以“躺平”过余生，大家都劝我不要再坚持做实业了。但是想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和在清华种下的“要做把科技变为生产力的事”的种子，觉得选择“躺平”简直就没有活过。因此我又花费很大心思在四川省广安市找到一个化工园区，继续自己的化工新材料实业，虽然现在政策和市

场上的风险很大，但我总是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希望能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

我是那种没有任何特长的群众，平时很羡慕学校运动队的同学，一直不明白有的同学（同班的黄永清，后来成了我的先生）是运动队跨栏运动员，为什么要放弃？化工系体育能力很强，运动会的时候像我这种很渣的水平不敢报名；终于1988年材料系成立，刚成立的材料系水准一般，所以我斗胆报名参加了系里运动会的1500米长跑，结果让我跑了个女子第一名，要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的运动会。真到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在操场边整队的时候，我好希望自己突然腿断了就好，实在没有勇气去继续校运会的比赛。就在这样内心的挣扎下还是坚持走到跑道，跑完1500米。虽然我的成绩是第9名（清华只表彰前8名），但是那一天，我心情非常愉悦，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明白，坚持是战胜自己的法宝，自己在个人毅力上得到升华。不会唱歌的我一路上是哼着小曲回到教室上课的。

在清华培养出来对科研的热爱，一直影响着我，所以在多年创业之后，我选择回到校园做一位大学老师，继续对科研的热爱。我现为海南大学材料学院的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防腐防污涂层材料、微纳结构及FRP复合材料等。多年来，我获得过一些小成绩，曾获上海市徐汇区拔尖人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先进工作者、上海徐汇区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腐蚀学会40年突出贡献奖等。

做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实业，虽然很累但我一直在坚持，希望有所创造。清华一直给我努力前行的力量，清华人之间的互助、信任，鼓舞着我一步步努力向前。

行走在“一带一路”

○马麟（1998级水利）

2002年仲夏从水利系本科毕业后，我前往祖国西南，到原国家电力公司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现中国电建昆明院）参加工作，从此投身到新世纪初热火朝天的“西电东送”骨干水电站的建设中。随着工作经历的不断丰富和能力的提升，近十余年来我开始逐渐走上公司的中层经营管理岗位，带着中国水电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走出国门，长期扎根“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各国，负责电力、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开发和建设工作，为沿线国家送去光明、带来繁荣。

还记得2001年的暑期，我们水利系8字班全体同学在三峡工地生产实习时的接触，世纪工程——三峡水利枢纽正值建设高峰期，热火朝天的巨型电站工地上深深地埋下了我对水电行业的情结。2002年本科毕业之际，正值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电东送”工程的启动实施，在当时毕设导师刘光廷教授的推荐下，我参与到了21世纪初的水电“大国重器”、当时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拱坝——云南澜沧江小湾水电站的设计工作中。

在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正是小湾电站从开工建设直到投产发电的十年，是水电工程师锻炼和成长的难得十年，应该说是清华教育真正让我“学以致用”“欣逢盛世、报国有门”的十年。从最基础的钢筋图、计算书做起，从助理工程师开始，我先后担任了小湾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和泄洪专业主设人。在陪伴着世界

第一高拱坝从零开始到“高峡出平湖”的过程中，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全面锤炼和提升；同时，清华四年对我们为人、做事方面严谨、求实的作风培养，也让我在大型工程的建设实践中受益匪浅，更得到了同事、同行的认可、赞赏和更多期许。十余年的小湾工程设计工作中，自己的每一分进步都与同事、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我还有幸得到了水电行业内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们的指导和关心，尤其是那些参与过小湾电站技术攻关和把关的清华前辈学长们：张光斗、马洪琪、陈祖煜、张超然、金峰，等等。站在前辈和学长们的肩膀上，个人的部分技术成果先后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次，集团和公司内科技进步奖、优秀奖多次，个人先后获得集团公司和昆明院的“青年岗位能手”“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004年7月，三位1998级水利系同学在建设中的云南小湾水电站相聚，左起：马麟、侯鹏、李富根



二〇一八年二月，马麟（前）
带队在缅甸踏勘考察水电项目

在小湾电站多年建设过程中，尤为欣喜和温馨的回忆是在工地现场工作期间，迎来了好几批水利系的老师、同学和学弟学妹们，他们到我工作的地方来实习或社会实践。带着亲爱的校友们参观和分享自己每年奋战300多天的伟大工程的点点滴滴时，我的心中始终洋溢着激动和自豪。

从2009年小湾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之后，我开始接触和从事国际工程业务，并于2012年调入院国际合作部，逐步走上了国际工程经营管理岗位，先后任项目副设总、业务主管、市场部主任、海外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工作方式和地域发生了很大转变。

随着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号角吹响，最近十年我的工作足迹行遍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十余个国家，先后负责组织开发了缅甸、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喀麦隆、尼日利亚、马其顿等国大量水电、新能源电站项目，参与了有关国际工程作业文件编制，签订了一系列大中型水电、新能源电站等基础设施项目合同，有

力地支撑了昆明院国际业务的发展，积极推动了我 国水电和新能源技术、装备、人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已经建成的多座水电站和太阳能电站，为当地民众送去了光明和生机，也在世界各地结识了很多伙伴和朋友。

十余年来“行走”在海外“一带一路”各地，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尊严与地位与自身的综合实力息息相关，也感受到在我们国家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冲突的时候，我们在科技、知识、人才、创新方面的巨大差距和不足。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不利因素，我所在的电力行业也未能幸免，各项工作异常艰难。即便如此，在“新冠疫情”全球持续爆发、蔓延，各国之间壁垒高筑的2020—2021年，我仍两次带领团队“逆行”，前往境外长期工作。因为我深信：海外业务是大型企业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实力发展和对外合作交流的内生需求。

国际事业既是星辰大海，也充满惊涛骇浪和云谲波诡，我辈清华学子自入校门便深受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教诲和鞭策，更应以国家民族复兴为己任，在各自所处的行业里和岗位上励精图治、孜孜以求，作出一番自己的贡献，把个人的价值与团队、单位、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和发展。

值此母校111周年校庆前夕，1998级同学毕业20周年之际，感念当年园子里的悠悠岁月、点点滴滴，深深祝愿母校水清木华、桃李天下！

分别后的这十年

○刘静琨（2008级电机）



刘静琨，2008级电机系校友，2017年博士毕业后选调至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工作，现任香河县安头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回想本科毕业后的这十年，我自己的经历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五年继续在电机系读博士，是向着“为往圣继绝学”的目标而努力；后五年主要投身于基层公共治理工作，是朝着“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而奋进。十年间，既能在国际会议上与业界顶级学者谈笑风生，也能在农村走家串户跟老百姓唠唠家长里短。这十年看似反差强烈，但实际上却是无比精彩的。回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体会可以总结。

首先是从学术训练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读博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训练，训练合格之后的博士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专注和钻研带来的乐趣，也能够体验到创造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质变，进而能够在博士论文成果被国家推广时收获一种强烈的价值感。然而，在背后更为关键的是在心理方面对于自我的不断突破。

焦虑、抑郁、恐慌是必须经历的，在各种事情上持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自我否定之后信心会被击碎。最终探索出自身能力的边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练就抗压能力，重塑信心，实现“凤凰涅槃”。以前跟室友聊为什么要读博，他说读博就像是在玩游戏的初期打一件“好装备”。虽然观点简单直白，但实践下来也确实是这个道理，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位本身，更多的是背后的成长。

第二是遵从从内心深处的想法。清华的文化中从来不乏理想主义的基因，历届校友中都有一部分人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投身正确、艰难而又伟大的事业。我们在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应当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不为外界普遍的评价标准而左右，从而在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幸运的是，我们在清华所受到的教育恰好支持和鼓励我们这样去选择。没去电网公司而选择从政，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服务社会更加直接；没回老家而选择到临省，是因为我认为“直辖市”是少数，“省”是大多数；没去省市直机关而选择到乡镇，是因为我想要更好地理解基层，认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的本质。事实也证明我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贴近群众的道路，虽然经常披星戴月栉风沐雨，但内心却始终充盈。

第三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理论联系实际。课题组的老师以前常教导我们说：“学历不代表能力，文凭不代表水平。”



刘静琨校友（右）在基层调研

要想真的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就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我喜欢尝试把工程方法和数学手段应用于基层治理工作中，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抽象出科学问题，并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求解。比如近期我们封城做全员

核酸检测期间，要进行社会面管控防止老百姓上街随意走动，从而使我的全镇域作为一个系统保持静止、稳定的状态。怎样才能很好地实现呢？用控制论中的负反馈理论，对不符合防疫要求的村民进行批评教育，并在工作范围内通报提醒，形成警示。通过这样的闭环反馈使得工作压力得以有效传导，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我想理论不是高高在上的，接地气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焕发理论的生命力。

十年前，我们唱着《启程》毕业；十年过去了，依旧“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那么未来十年的期许是什么？不求一帆风顺，但求遇事初心不改，勇气不减。我相信下一个十年依然是精彩的十年。

读者·编者

近日，《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收到了郑文会学长和孙昆夏女士的来信，信中感谢编辑部副主编黄文辉和解红岩为《校友通讯》复90期上刊登的孙女士所撰《几份老资料唤起的回忆——怀念父亲孙永明》一文付出的努力。孙永明是西南联大1944届电机系毕业生，响应学校号召赴印缅战场参军抗日，解放后在沈阳电力系统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全家遭受牵连。1978年，也就是在孙学长去世三年后，才为其平反昭雪。由于孙学长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家人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孙女士在母亲百岁寿诞后，通过郑学长找到解老师帮助了解其父在学校学习和参军的情况。解老师很快从学校档案馆获得

了孙学长两张学籍卡和解放前补办毕业证的相关资料，并将复印件快递给孙女士，还鼓励她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这些资料给了孙女士和年迈的母亲以极大的精神慰藉。文章写好后，经黄老师修改，最终刊发。为此，孙女士在感谢信中写道：“请接受我和弟妹们诚挚、衷心的感谢。是你们循循善诱，引导我一步步写出深情缅怀父亲的文章。感恩清华，在抗战的烽火中培育了父亲；几十年后，又以博大的胸怀教育着我们。原来，对清华是仰视；如今，清华人的家国情怀、诚挚热心，使我消去重重顾虑，敞开心扉。也许，这就是清华文化的魅力！”郑学长也在信中对两位副主编及编辑部全体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华情缘

○曾昭堃（1960届土木）

现在，我虽然已年逾八旬，但是在清华度过的六年学习生活仍然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那是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

我进入清华是很偶然的。我所就读的是广西容县中学，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学校获得两名留学苏联保送生指标，我是保送生对象之一。进行政审和体检后，完成了上报程序。但毕业前夕又通知我照常参加全国统考和填报志愿。班主任要求高材生要到最优秀的大学去，让我把自己随意填写的学校改成了清华大学。就这样，我成了容县有史以来第一个上清华的大学生。

难忘的校园生活

接到清华大学土建类的录取通知书，我这个19岁、从未到过大城市的热血青

年，怀揣着几十元路费离开了亲人和故乡。在北上的列车上，我结识了广西玉林高中考入清华的蒋友培同学。到北京的旅途要三天多，我第二天就病倒了，发高烧。车到武汉，过了轮渡，不得不下车休息治疗。多亏蒋友培同学陪伴照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我们第五天才到达北京。坐清华的接待车到了学校，如同到了家一样，感到无比温暖。

入校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分专业。我也像很多同学一样报了建筑专业，去参加了素描考试。考场设在第二教室，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在讲台的桌子上铺了白布，上面放置一个杯子，让大家画素描。我觉得太简单了，完成得很快，是第一个交试卷的。但是我却落选了。在张榜公布的专业分配名单里，我被分到了给排水专业。

宿舍安排在三号楼的四层，给01班和

我们给02班紧挨着。我被分配在最大的402房，住八个人：宋秦年、卞全、封国楷、曹昌初、褚元魁、吴铸钦、曾昭堃和房0班的张光宇。住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变动过，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亲密无间。

开学不久的一



2010年4月25日，1960届给0班毕业50周年返校与老师合影。第一排左起：曾昭堃、徐本源、张汉昇、钱易、李国鼎、陈志义、余刚、丁宏达、井文涌、宋秦年

□ 我与清华

个周末，给9班和给0班在三院教室开了一个迎新联欢会，没有节目单，几乎都是互动性的即兴表演。给9班的女同学起哄叫刘鸿亮老师唱《拉兹之歌》，他的演唱声情并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5年的“十一”国庆节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庆祝活动。凌晨四点多钟起床，领了干粮就去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西直门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东单指定的位置，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打着横幅校旗，挥舞着小旗子，喊着“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天安门，看见城楼上的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大家都很激动，喉咙都喊哑了。我们还参加了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我们到广场时迟了一步，人实在太多，各单位已按规划范围用人墙围了圆圈。最后我们找到了清华的地盘，回归了队伍。当晚的活动内容是看焰火、文艺表演、跳集体舞，最后是跳谊舞，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返校。

给02班团支部是宋秦年任支部书记，团组织生活搞得丰富多彩，我们先后去了颐和园、八达岭长城。那时的八达岭车站虽然很小，但立有詹天佑铜像。行走在巍峨的长城城墙之上，极目莽莽原野，长城就像一条奔腾的巨龙，蜿蜒在群山之上，完全征服了我的心，激起了我们对祖国的无比骄傲。

在清华的前两年是学基础课，很多课程都是同年级的两个或三个专业一起。集中在大教室上大课，上完一堂课之后，又要走很远的路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课，而课间只有15分钟，搞得很紧张。我们房间的同学大多数都在宿舍晚自习，大家都很自觉，只要晚自习铃声一响，就停止其他活动，坐下来安静地温习功课和做作业，

下自习的铃声一响，大家立即收拾，抓紧时间洗漱，之后自觉熄灯上床，不再有人说话。清华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生活秩序，至今仍引以为傲。

清华十分重视体育健身活动，开学没几天，全体1955年度新生到大礼堂听马约翰教授作报告。只见他一身西式装束，童颜白发，红光满面，声音洪亮，作报告时不要麦克风，嗓音提得很高。主持人曾两次递麦克风给他，都被他拒绝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其核心内容就是讲“运动”两个字。清华的课余体育活动是很活跃的，到了完全普及的程度，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可以说人人参加。

毕业前夕，给0全班同学又和三院教室聆听了马约翰教授的报告。这一次可以说是临别赠言，他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了出去工作以后的养生之道，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他讲了如何坚持体育锻炼，如何保持生活规律，如何保护眼睛，在繁忙的工作中如何提高睡眠效率等。讲到如何提高睡眠效率，他说睡前先把寝室窗户打开通风，冬天也要这样。洗漱时要用冷水洗眼睛，然后到室外呼吸一阵新鲜空气，凝神站立，眼望远山或天空。天气晴朗时，最好远眺某颗星星，停止一切思维和杂念，让大脑变成一片空白，这样不多久就会进入半睡眠状态。这时返回卧室，关好窗户上床就寝就可以了。在清华打下的体质基础和养成的锻炼习惯，成为我后来在工作岗位上能适应各种环境和繁重工作任务的重要因素。

当留学生的辅导员

给0班有两名留学生，都是朝鲜来的公派留学生，是给01班金致谦、给02班郑

相俊，郑相俊的辅导员就是我。

当时清华的留学生不多，主要是越南留学生，有几十人；其次是朝鲜和印尼，其他还有苏联、阿联酋、埃及等国。每个留学生都派一名同班的中国学生做辅导员，协助他们完成学习任务。在校长办公室领导下设立留学生工作组，有几个学生参与工作，我班夏鸿文同学便是其中之一。1956年上学期，夏鸿文同学找我谈话，叫我搬到留学生宿舍去住，当郑相俊的辅导员。留学生宿舍就在三号楼的第五层，每间房住一名留学生，室内配置床、写字台、椅子、书架各两套，分别供留学生和辅导员使用。辅导员和留学生只是住在一起，就餐则各到各的食堂。

留学生虽然在进清华前已预修过汉语，但是其听和讲的能力与中国学生毕竟存在差距，加之有个别老师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他们就更困难了。当年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大多数是课程的教授自己编写讲义，而讲义往往是上完课很久才能发下来，全靠听课时当场消化和记笔记。每堂课的容量都很大，既要听懂又要记下来，这对于留学生来说无疑是勉为其难了。作为辅导员，帮助留学生补些笔记，讲解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内容，讨论一些作业中的难题，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郑相俊一起生活了四年左右，直到1959年我被抽调去工读班，才由冯德曾同学接管了我的角色。在和郑相俊相处的四年里，大家互相尊重，和谐融洽，亲密无间。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条体育锻炼穿的运动裤，是咖啡色的，他见了很喜欢，有意要和我交换，我就毫不犹豫地和他换了。郑相俊对我也是关怀备至，他假期回朝鲜探亲，回校时带了满皮箱的苹

果，还有烤熟的鱿鱼干、人参酒等食品。下了晚自习，我们一起喝酒，吃鱿鱼干、苹果，谈天说地，有时还叫其他朝鲜留学生一起来分享。有一次他从朝鲜回来，说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平壤医科大学的学生。他拿出照片给我看，是一个长相漂亮、充满青春活力的朝鲜姑娘，我对他表达了衷心的祝福。

郑相俊毕业回国前，为了表达送别之情，夏鸿文和我等人一起邀他游颐和园，并在颐和园的外宾餐厅为他饯行。我还送给郑相俊一把纸折扇，上面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的赠别诗。郑相俊知道我家境贫寒，他背着我先后三次给我家里寄过钱，每次都是十元、五元，在那个特定的困难年代，这些钱是很有用的。我是1961年毕业时回到家才知道他寄钱的事。

真刀真枪的教学实践

我们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后，接连到天津市的芥园水厂、上海市的杨树浦水厂和长桥水厂，还到过污水处理厂进行参观见习。这时，我对自己学习的专业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1958年，清华提出学生要真刀真枪搞设计，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以9字班、0字班学生为主力，首先是建筑系，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十大工程设计方案的全国竞选。接着，土木系跟进，轰轰烈烈地进行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国家科技馆、国家美术馆四个工程项目的施工图设计，稍后又增加清华主楼工程项目的设计，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设计工作十分紧张，晚上加班是正常的，有时甚至是干通宵。我曾连续加班50多个小时，人已处于疲劳的极限状态，但是凭着一股毅

力，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1958年夏，东长安街要从东单往东延伸到建国门外，给0班承担了这条路的地下给水管道工程施工任务，这是一条直径400毫米的铸铁管。我们的临时工棚设在前门一段城墙顶上，往返工地都是步行，上夜班深夜来回也是如此。同学们既当工人，又当管理人员。管沟的土方工程是人工开挖与机械开挖相结合，回填则以人工作业为主。土木系施工教研时，有一台教学用的链斗式连续挖沟机，听说当时是国内唯一一台，这样的施工机械也被派上了用场。我记得林仰驰同学曾经当过司机，有一次午休，一同学躺在链条上小憩，下午开机时差点出了事故。铸铁管油麻石棉水泥接口的人工打口作业、管沟回填土夯实的人工打夯作业，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当时正是夏天，所以人人都是汗流浹背，但是大家有说有笑，愉快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1958—1959年冬春之际，石景山钢铁厂新建二号高炉配套新建一个三号泵房，我们给0班又承担了该泵房的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同学们变成了起重工、架子工、



1958年冬参加石景山钢铁厂2号高炉扩建工程的劳动现场，前排右1为曾昭堃学长

瓦工、抹灰工、木工、模板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既当技工，也当小工。当时正是隆冬季节，但大家干起活儿来也是满头大汗，每个人都是使出十二分的努力。有一次在混凝土搅拌台上料时，我看见女同学郑孔秀一人扛了一袋儿水泥，让我十分感动。

在总结这两项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和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给0班同学分工合作，1959年编撰出版了《给水排水工程施工》一书，后来被作为高校教材使用。这段工程实践经历，不仅使我后来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时能更多地考虑施工因素，提高设计质量，而且为我在后来对工作的适应性和驾驭能力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1959年春夏之交，北京团市委在北京高校抽调人员组成百人工作队，支援河南省“大跃进”。清华是抽调人员最多的单位，给0班只抽调了我一个人。我参加了登封县钢铁厂的设计，边设计边施工，我还参加过开挖引水明渠的劳动。工作了大约三个月，没有建成就撤退了。在离开的前一天，县里安排大家参观游览了嵩山和少林寺，派人去村子里叫来几个和尚，给我们表演少林拳。

1959年底，土木系从各专业抽调50人组成工读班，作为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试验班。我是班委会成员之一。工读班名义上是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全天工作，具体工作任务是清华主楼工程和806工程（现200号）的设计。1960—1961年，郭旗煌、杨祖良、李仲三和我作为设计单位驻工地代表，在806工程工地住了好几个月。在工地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施工和监督工程质量。

同学情深

给0班同学在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关照，使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庭般的温暖。从低年级开始，我就感受到夏鸿文同学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百般爱护，我也把他视同哥哥一样亲近，感情是比较深的。在清华期间，只要我进城，我多半都会到他家串门儿。他原来的家在珠市口东大街，乘公交车前往也很方便。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奶奶，奶奶对我亲切热情，每次去都要留我吃晚饭才让走，并且饭前总是吩咐夏鸿文说，昭堃会喝酒，去打点酒回来。

1961年7月，毕业离校前夕，我祖母去世，家里来电报说等我回去送葬。于是，在未进行毕业分配的情况下，我匆匆离校返乡，夏鸿文、金文漪、杨祖良、郭旗煌等几位同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临别前，夏鸿文对我说，报毕业分配志愿时，我再通知你，使我能放心离校。后来我填报去部队的志愿，就是通过夏鸿文同学帮助办理的，这一切到现在我都心存感激。

给0班的同学比我们调到工读班的同学早半年即1961年初毕业离校。给0班的毕业照没有忘记我们工读班的同学，叫我们也参加合影留念。1961年元旦，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特定历史时期，给0班筹办了一次丰盛的聚餐会，也邀请了工读班的同学参加，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受到给0班集体温暖。

我毕业后到军委总后勤部的白城办事处，从事国防战略后方基地工程建设，出差机会比较多。只要有会，我都会去拜访老同学。1965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广西老家探亲，还绕道到南宁市拜访了肖睿

书、吴铸钦两位同学，当时他们都在广西综合设计院工作。巧遇吴铸钦结婚，还应邀参加了他的家庭婚宴。1968年到北京开会，听说金文漪在“文革”初期被遣送回原籍的悲惨遭遇，她后被平反回北京原单位，我立刻去看望了她。看到她虽居陋室，生活清贫，但和爱人郭恒恩爱有加，工作正常，平和度日，我心里略感欣慰，这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相见。

我1976年转业回到广西，后在南宁市自来水公司担任总经理、总工程师。80年代，我到昆明公干，驱车几百公里，专程到锡都个旧看望卞全同学。他向我详细谈了他毕业后不久，因工作关系携带新建水厂设计所需的地形图等有关资料，出差途中去西双版纳游览的路上，被误认为携带机密外逃而银铛入狱。劳动改造期间，又因说林彪的长相像奸臣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加判重刑，直到1980年才获释、平反。好在他当时已恢复了待遇，还是个旧市政协委员和个旧市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因此我们之间的倾谈还是轻松愉快的。我还拜访过好些同学，如郑孔秀、朱瑞麟、杨祖良、李正隣、林仰驰、陈庆星、蒋难先等。

1991年我回校参加清华80周年校庆，第一次与部分老同学欢聚。直到2000年给0班毕业40周年之际，给0班同学才第一次回校大聚会，使我尽情享受了同学久别重逢的欢乐。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校工作的井文涌、蒋展鹏、杨志华和在京工作的夏鸿文、杨祖良、唐幸生等同学，是他们的无比热忱和真诚奉献促成了这次难忘的聚会。

我满怀深情地向给0的同学们祝福并共勉：但愿人长久，一路夕阳红！

学生、挚友邓澍宏

○ 卫景彬（1970届力学）

2022年4月30日，周六，晴空万里，春意盎然。美国南加州清华校友会举办年会活动，热烈庆祝母校清华大学建校111周年。庆祝晚会在洛杉矶太平洋棕榈度假圣地的的大礼堂举行。大会授予中国侨联海外总顾问、1952级清华校友张素久“清华校友终身成就奖”；美国飞洋物流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长期服务侨社的南加州知名侨领、1978级清华校友邓澍宏“清华校友杰出成就奖”。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地区清华校友会创办人和第一任会长，我也代表我们校友会送去祝福，向张素久学长、邓澍宏同学表示热烈祝贺。回想我在清华工作期间，曾担任邓澍宏所在的工程力学系热八班的班主任和老师，因此非常高兴写下此文，以对邓澍宏同学的业绩和贡献作一些补充，也再现

我们难忘的友谊和美好的记忆。

邓澍宏同学是1978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从接待新生开始，我作为班主任就认识了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后我们专业迎来的第一批生龙活虎的新秀。热八班有38位同学（其中4名为出国代招生），有10名同学不满16岁，且有3位同学刚满14岁。热八班同学的优点都很突出，每位同学的优点我都可以讲上几分钟。热八班在在大一还被评选为全校五好班集体，当时校刊《新清华》主编张正权执笔，在《新清华》撰写了报道，题目为《娃娃班在成长》。同时，为了支援基础课师资力量，我曾辅导李欧教授等基础课老师给热八等班讲授“高等数学”和其他数学课程。期间为了提高同学们数学能力，我将力学系部分教师张量讨论班的内容整理成《标量向量和张量》专题讲义，在热八班进行了几个学时的讲授。在热八升入高年级后，我又参与燃烧专业课教学和毕业实习指导工作。同学们毕业后，我们仍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断交流，友谊深厚。

回首往事，与热八同学相识至今已有44个春秋。40多年交往中，与邓澍宏同学的师生情、友谊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对邓澍宏同学的印象可以归纳为：理工严谨科学思维，文史哲理通达融汇，文体艺术修为深广，清华校风大业情怀。

给我留下第一次特别深刻印象的是1979年大一暑假期间，邓澍宏从家乡给我寄来厚厚的一封信，是他创作的一部话剧



2022年4月30日，美国南加州清华校友会年会上，邓澍宏获“清华校友杰出成就奖”。左起：邓澍宏、卫景彬、童育英、邓澍宏二子邓仲忻

剧本，是为了暑期开学后，迎接1979级新同学欢迎晚会的演出而准备的。话剧内容是清华大学活跃的学生生活，号召同学们重视体育，加强锻炼，展现清华“7+1>8”的良好体育文化。作为班主任，我为有这样积极参与学校工作、主动奉献的同学很是感动。邓澍宏请我修改剧本，还希望我也参演，就担任剧中班主任角色。我认为剧本创作得非常好，立意好，剧情好，有文学艺术修养。我认真做了我所能的修改和建议，回寄给邓澍宏。暑假返校后，我与他商量，班主任角色最好也选一位同学参演，这样可以调动更多同学积极性，而且演出中同学们肯定会更有创意，话剧演出会更成功。最后，参演该话剧的热八同学有：邓澍宏、刘桦、杜兰萍、壮迁、熊柚民等。该话剧在全系1979年暑期开学后的迎新晚会上被评委们一致评为第一名。能获此殊荣，邓澍宏同学的编剧、指导排练功劳第一。

邓澍宏同学还热爱足球、体操和田径运动，他说足球运动量大，能锻炼耐力、锻炼体魄，也能锻炼思想锻炼意志。他与班里其他三位同学组成4×100米短跑接力队，曾获得全系运动会亚军。

“文革”前的清华工程力学数学系，大部分毕业生被分配到航空航天部单位。1983年热八毕业时，他们都被分到国民经济各个能源动力部门。邓澍宏同学考取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后在石油研究院获得优异成绩，他参与的多项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深得领导同事好评。1990年，邓澍宏获得全额奖学金，被美国大学录取，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赴美前有两个月短期休假，邓澍宏来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我的办公室，

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一些工作锻炼一下。当时，我在力学所分管青年工作，同时接替力学所党委副书记刘守喜所担任的力学所新技术公司总经理职务。因邓澍宏来工作的时间不长，完整完成一个项目时间恐怕不够，因此我与邓澍宏商量可否请他参与我们一篇重要论文的整合和压缩工作。1990年我即将赴欧洲参加三个国际学术会议，都有论文发表，其中7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23届国际燃烧年会最重要，因此安排邓澍宏同学的短期工作就是在这篇论文原有基础上，把我博士论文中有关内容，以及我们其他几篇英文论文，略去研究过程中的细节，压缩成仅有“干货”的精短论文。该论文论述我们一项发明研究成果的机理，名称叫《关于扁平射流燃烧器火焰稳定机理的研究》，该项成果达到了实际工业燃烧器的强化燃烧、低污排放的效果，已应用于多家大中型电厂动力燃烧锅炉，并由工业部门、高校、国家教委、电力部、中科院等部门燃烧专家在河南和山西电厂通过了严格工业运行鉴定。工业部门工程师和一线技术人员在使用中常把其称为“大风铲燃烧器”。

邓澍宏有很强的能力做好这件事，他顺利完成论文压缩和整合工作。论文提交给国际燃烧会议，三个评审专家一致给予高度评价，无差别地建议作为会议宣读论文。国际燃烧会议被接受的论文分为两种：会议宣读论文和文字板报展示论文（Poster）。国际燃烧年会的论文接受率仅为42%，不到一半，一半以上提交的论文在审查阶段会被“枪毙”掉。中国燃烧界学者提交给这次年会的论文，仅有我们这一篇被年会接受。所以我跟邓澍宏说：“你做的工作是世界水平的工作，也

□ 我与清华

为中国燃烧界增了光。”我在会上报告了仅有四页的精短论文后，有几十位国际学者，或于会议期间、或寄信来索要更多研究内容。这也再次体现了邓澍宏同学的工作能力，整合意图完美体现，论文效果圆满达到。

我夫人童育英毕业于清华工程化学系，在中国石化研究院工作，邓澍宏本科毕业到中国石化研究院读研究生，因此我们三人既是清华校友，我夫人还与邓澍宏成了同事，邓澍宏常到我们家聊天。童育英在石化院曾从事验收国外仪器设备，研究色谱-质谱对油田采样鉴定以及提高石油采收率等工作。在童育英和合作者翻译《提高石油采收率（第一分册 基础理论及分析）》一书时，她邀请邓澍宏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为该书出版作出了贡献。该书于1989年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石油研究院研究生等有关人员的重要参考书。所以，邓澍宏是我们交往40多年的老朋友，更是学术交流、事业进步、共同提升的挚友。

邓澍宏在1990年赴美后，在盛产石油的宝地阿拉斯加大学顺利完成学业，奠定了坚实的业务基础和综合素养，培养了社会交流和团队配合能力，培养了开创事业的领导、协调能力。他拼搏进取，1995年开始创业，开华人快递先河，创办了在中美两国业界都颇有影响力的GCE飞洋物流集团公司，旗下有15家分公司，成为在华人规模最大、服务最全的中美货运及电商物流供应商。

自1994年起，邓澍宏参与创立多个美国南加州重要侨团并担任领导职务。他参与组织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1997年访美和时任总理朱镕基1999年访美欢迎晚宴，并



2018年4月，邓澍宏学长（中）作为特约嘉宾为南加州清华校友会“水木职业发展论坛”作主题演讲。演讲结束与其他嘉宾和主持人合影

代表全美华侨华人在江泽民主席欢迎晚宴上致欢迎辞。2012年还参与组织南加州华人华侨欢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活动。

作为杰出的美国华裔企业家和侨界领袖，他多次受邀回国参加重要活动，包括五十、六十、七十周年国庆观礼及2015年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等。邓澍宏对中美及台海两岸关系等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常有著述并受邀在各媒体做政治时事评论，成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杰出代表人物。

2017年，邓澍宏被推选为中国侨联“侨创联盟”海外委员，同年被美国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评选为“杰出企业家”。现在，他不但把飞洋物流事业做得很成功，还拓展事业远渡日本加入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电视媒体事业；还带领团队创办新媒体平台，把短视频业务开展得风生水起。

邓澍宏同学的事迹，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体现，他常谈到自己的理想就是：牢记清华校风，不忘母校培育，开拓国际视野，服务世界人民，无私奉献社会，回馈清华母校。

清华教我挑重担

○杨定英（1968届汽车）



杨定英学
长近照

1962年入学时，“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两条醒目的横幅标语赫然映入眼帘，成为我一生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是我们向母校汇报的时候了。

回顾这50多年，勇挑重担、勇往直前、永争上游是我一生奋斗的写照。以清华人为荣，以清华人自我加压、自我鞭策、自强不息是我一生的工作态度。而学校教我们学好基础理论，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找书看书的方法，成为我攻克一个个难关的基本方法。

记得刚入学时，艾知生副书记给我们新生讲话，他说，到大学来最主要的是学好三个本领，第一个是学好基本理论，包括理论基础课、技术基础课里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定理。清华的学生后劲大，就是因为基础理论扎实。第二个是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学会这种方法，遇到不懂的问题、难解的问题才能通过分析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要学会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要按蒋校长要求的，工科学生要学好唯物辩证法，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练好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功。第三是要学会找书看书的方法，遇到不懂的问题要知道应该看什么书，到哪里找书，怎么看书。因为大学里学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只有学会找书看书的方法才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前进。我把这三种方法牢记于心，在校时我就注意这三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工作后更是自觉地运用这三种方法不断地攻坚克难，取得了多项成果。

1970年4月，我从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后回到陕西汽车制造厂。成立设计科时，我是年资最低的产品设计人员，给我分配的任务是汽车动力转向系统十个分组的设计工作。动力转向系统是汽车中原理最复杂深奥、加工精度要求最高的部分。在筹备建立陕汽时，由北京汽车制造厂援建陕汽的人员测绘过法国戴高乐越野车的动力转向系统。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动力转向的任何技术和产品。但北汽测绘此产品的人因为家庭原因没有来陕汽，所以我接手的只有一套不够完整的测绘图纸，没有其他任何技术资料。动力转向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样起作用的？图纸上的某一个沟槽、某一个孔眼是干什么用的？谁都不知道。

我们三线厂，条件很差，没有书店，也没有图书馆。于是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科技书店买液压原理的相关图书，因为当时就没有动力转向的图书。我昼夜

攻读，对照图纸一点一点研究。我还注意把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三者结合起来，搞不明白的地方就向年长的设计人员和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傅请教，和他们一起研究。

经过我的刻苦钻研，终于搞清了液压动力转向的原理，搞清了转向机、控制阀如何起作用，油泵、助力油缸如何起作用，搞清了每个沟槽、孔眼的作用，绘制出了液压动力转向原理图。那时每周有一次交流学习，由设计人员讲解自己分管的产品。当我在讲台上给全科设计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宣讲时，引起了大家的高度赞赏，因为大家都知道，液压动力转向是刚刚进入我国的新东西，我年纪最轻，刚刚接手就搞得这么清楚，确实不易。后来我在汽车工程学会转向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宣讲了此论文，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转向油泵是动力转向系统中最重要的动力源。当时也是测绘的法国戴高乐车使用的转子泵，陕汽没有该泵的图纸，该泵由泰安汽车制配厂直接交给陕汽配套。该泵实在是太糟糕了，要么一用就发热，烧坏了油泵，整个转向失灵；或者是压力不够，方向打不动，司机怨声载道。后来换了榆次液压件厂生产的齿轮泵代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再没有生产转向泵的了。怎么办？厂里决定攻关，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

这时我就想起清华教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试验分析，我总结出影响油泵正常工作的因素有九个，也就是说有九个矛盾，但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哪一个零件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这可不是一眼能看出的，要进行充分的实践、试验。我就限制一个因素或者突出一个

因素地试验，看它带来什么效果，最终找到主要矛盾是齿轮和轴套，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齿轮。我对齿轮设计提出了相应的严格要求，对轴套的结构和材料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还要兼顾解决其他矛盾。于是我将齿轮泵过去传统的两体式结构改为三体式，使加工工艺大大简化，加工质量大大提高；将壳体由铸铁件改为铸铝件，将溢流阀、限压阀都设计在中间壳体上，缩短了液流线路，简化了加工工艺……总之，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了。我按照试验的结果，设计出了完全新型的转向油泵，且一次设计成功，经台架强化试验和装车道路试验，完全达到了标准要求，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得到陕汽重型越野汽车的主要用户总后勤部的肯定和赞誉。

后来该转向泵不仅装在陕汽的车上，一汽、二汽、济汽、江淮等重型车上都安装了此泵。1979年，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转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宣讲了该论文，受到汽车工程学会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献曾先生的高度评价。他说：“我知道，转向油泵是动力转向中的大难题，陕汽的杨定英同志把它解决了，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我们就要像陕汽的杨定英一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攻关，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攻关，只有零部件过关了，整车打入国际市场才有可能。”在这个大会上，我被选为最年轻的转向专业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在1981年重庆召开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我的论文《重型汽车转向油泵的设计和试验》又从选送去的440篇论文中，筛选为大会交流的40篇论文之一在大会上做了宣讲交流，引起

同行业的极大关注。会后又作为优秀学术论文，刊登在国家一级杂志、汽车行业最权威的《汽车工程》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国汽车工程师学会。该论文又被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评为优秀学术论文。我的这篇论文还被转向专业委员会选入《全国动力转向教材》，由汽车杂志社公开出版，我也为委员会举办的全国动力转向培训班到南宁和济南讲课两次。

之后，我推导出循环球曲柄球销转向器角传动比的数学公式，奠定了该型转向器设计的数学基础和理论基础。我在《汽车技术》杂志上看到过齿轮齿条转向器角传动比的计算公式，但到处找不到循环球曲柄球销式转向器的公式，因为该转向器是新引进的技术，而且司机反映转向最轻点不是汽车直线行驶的中间位置。我就想把把这个公式给推导出来填补这个空白，同时解答司机师傅提出的那个问题。能不能推导出来，我开始也有点犹豫。但我就自我加压，自我鞭策：在人们心中，你是清

华大学的高材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你推不出来，谁能推出来？你不能给清华丢脸！于是，我分析转向机的结构，分析其运动，找出相互间的数学关系，然后解微分方程，得出了角传动比的数学公式。我又代入几个参数算出不同的角传动比，列出计算表格，根据表格画出角传动比曲线，形象地表示出角传动比的变化规律。我知道，任何一个物体或运动只有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才能更深刻地揭示事物或运动的本质。当我把公式推导出来后，我异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把一个工程问题表示为数学问题，也是我把大学所学数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于工程实际问题，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我写的论文在转向行业会议上宣讲后，又一次引起轰动，同行们称我又给转向行业填补了一项空白，又作出一项贡献。

革新滚珠导块，使转向机的装配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是我的又一项成果。

原测绘的循环球滚珠导块是由两个半拉一号锌合金组成一个弯曲的循环通道，一个转向机上要两组这样的导块，而且这四个半拉导块要与钢制的转向螺母打8个配钻孔，用铆钉铆上，一个熟练的装配工一天装不了5台转向机，严重地制约着生产的发展。而且锌合金硬度差、质地脆，经常出现断裂现象，造成转向失灵甚至翻车事故。我仔细研究了导球原理，分析了导球的受力状况，感觉原设计非常不合理，把一个简单的事搞复杂了。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用黄铜材料精铸的整体式导块，这个导块不需要和转向螺母连接，装配时用黄油（润滑脂）把导



参加汽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清华校友合影。前排左起：吴时生、李龙天、盛景方、孟少农、胡亮、xxx、宋镜瀛、xxx、程宏，第3排左3为杨定英学长（1980年12月，重庆）

□ 我与清华

块粘在螺母里侧即可，导球的通道变成一个直通道。这一大胆革新，彻底推翻了原测绘的外国循环导球理论，大大提高了转向机的性能质量、可靠性和装配效率，使大批量生产转向机成为可能。1981年起，陕汽转向机除了装配陕汽军车外，还被交通部门的长途客车、城建部门的公交车辆上广泛采用。通过这次革新，我也深深体会到，外国的东西不都是好的，只要我们吃透了原理，敢于创新，就一定能创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东西。我的不断创新、不断改进，使我厂的转向机成为行业知名的品牌，广泛应用在全国包括军用越野车的

重型车上。我也成为全厂甚至全国有名的转向机专家。

我在陕汽15年刻苦攻关，取得很多成果，我设计绘制、管理了三百多张产品图纸，在全国汽车刊物上发表了15篇8.6万字学术论文，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八次宣讲，撰写了14份28.8万字的技术文件，这些都记录了我的工作，记录了我的成长，记录了我的成绩，记录了我为陕汽作出的贡献，记录了我为祖国汽车事业作出的贡献，也记录了一个清华人勇挑重担、勇往直前、永争上游的奋斗精神。

2022年7月20日

记我的班集体——水资 5

○武晓峰（1985级水利）

从1990年本科毕业已经有30多年了，同学们的人生都进入了下半场，大家在一起时常回忆起大学的时光，那实在是一段美好的年华。

班主任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是何成旆老师，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系里原来给我们安排的班主任老师去了伊拉克的水电工程工地，临时让何老师替代一段时间。大家知道此消息后，心里都有些暗暗的不安，担心临时接替一段时间的老师会不会不太上心。但很快，大家的顾虑就打消了，何老师非常和蔼可亲，对班主任的工作非常用心，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了。他会经常到我们的宿舍来，了解大家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每次来，许多同学就围在他的身边，他会给



武晓峰校友

我们带来许多系里的消息，也会给我们分析各门课的情况，让大家长了不少见识。不知不觉间，因为何老师的认真负责，同学们也不再说起他是代行班主任职责了。何老师一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直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后来听何老师自己讲，系里因为看到他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就决定由他一直来担任。

我们班同学都很为自己的班集体感到骄傲，一个好的班集体的形成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班主任老师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班主任老师有年龄的优势，在同学们的眼中，他就是清华老师的代表。又由于他能够经常和学生门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清华老师的风格，对同学们的影响是具体的，而且是深远的。

我从何老师身上学到许多做老师的经验，要注意有意识地在课外和学生多交流，要多到学生宿舍、食堂等地方和学生近距离接触，要注意多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掌握了学生的情况，才能给学生一些很具体的指导，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等等。我后来留校工作，在系里和学校都做过学生工作，自己的成长经历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高校对学生的培养，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处在一线的一大批班主任老师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和班集体的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像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只有打好了地基，大楼才能盖得高。这些年学校愈发重视班主任工作，有一大批长聘教授担

任本科生的班主任，我想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浓厚的学习氛围

说起本科五年的大学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清华良好的学风。我可以举出如下几个例子。

除了寒暑假以外，我们很少有走出校门的记忆，大家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上面。北京的季节四季分明，按说每年春秋两季去踏青和秋游是很应景的活动，但是我的记忆中这样的活动是很偶尔的，并不是每年都有。国庆节的时候跑去天安门广场照张相寄给家里，似乎是对走出校门最深刻的记忆。总之，大家的心思和时间几乎全部在学业上，真正做到了“学习是学生最重要的职责”。

我们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大学的课程很满，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件事让我很有压力，那就是每天中午在食堂吃完午饭回到宿舍，我发现同宿舍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躺在床上在看书了。利用中午饭后午睡前的一点点时间读世界名著，是那时候我们同学中普遍的做法。大家都是同时下课，说明他们时间抓得比我紧，吃午饭所花的时间比我少，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读书和休息。

大家普遍非常重视读世界名著，加强自己人文方面的修养。那时候除教材以外，要读其他的书都要到图书馆去借，图书馆的书都是人工借阅的，每本书的后面都附有一张借阅记录，借阅人不用填写自己的



1990年6月，水资5班毕业合影

姓名，而是学号。每次借书，很容易看到前面都有哪些人借阅过。又一项有压力的事情来了，那就是当自己想起来要读那本书的时候，发现周围的许多同学都已经读过了，感觉自己在读书方面又落在了别的同学后面。在清华，我相信最多的故事一定是和刻苦学习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优秀的同学们

回想起班上的同学们，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个个灵动的身影，他们聪明、勤奋、积极向上，实在是为这样一批优秀的同学发自内心地点赞。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相互学习，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五年的大学生活，同学们之间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往往觉得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还要更加了解。

先说说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学吧。来自黑龙江的吴志宏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宿舍是个小集体，但要做好这个小集体的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得到了我们大家一致的尊敬和认可，当我们宿舍里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是他说了算。蔡喜明是我们宿舍的老二，他总是乐呵呵的，对谁都极其友好。他是我们班大学期间第一位入党的同学，有什么工作只要是他布置的，大家都会努力去好好完成。老三潘安君是我们班唯一一位高中时期入党的同学，我想许多同学在上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高中还能入党这回事。我们对他有一种很崇拜的感觉，他也一直在我们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也是我们班好几位同学的入党介绍人。老四王雅山

来自河北唐山乐亭县，是李大钊的老乡，他总给我们讲大海的故事，让我这个来自黄土高原的人对大海充满了无限的向往。我是老五，听起来和“老武”挺像的。老六詹世强是聪明和勤奋的化身，他是我们宿舍最小的，他让我们相信“越小越灵光”，他不仅绝顶聪明，而且也十分勤奋。他总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提醒我们：聪明人都那么勤奋，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因为繁重的学习任务，我平时和其他同学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班上每一位同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个人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和特点。胡亚林是我们班唯一一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大高个，一看就很有“分量”的感觉。他温和、可亲，并没有让大家感觉到有距离，他是我们班篮球队的绝对中锋，特别擅长投三分球，为我们班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来自内蒙古的唐杰同学是运动场上的一匹骏马，是速度和耐力的完美结合，特别



2005年5月1日，水资5班入学20周年时和老师们在密云水库团聚。前排左起：储昭顺、吴志宏、何成旆老师、翁文斌老师、王雅山、武斌、陈亮雄、陈绍林，后排左起：倪士林、任铁军、王建军、高晓文、梁向峰、潘安君、胡亚林、唐杰、武晓峰

擅长中长跑。我们俩从本科一个小班、研究生一个班到博士同一位导师，在清华做了11年的同学。毕业后，我俩都留校工作，又做了几十年的同事，我想人生中这样的缘分应该很少很少。来自辽宁的高晓文同学性格温和，考虑事情细致周到，毕业后被同学们公推担任我们班永远的秘书长。来自广西的两位大才子我一直都还在不断地加深对他们认识的过程中，赵木林是一位体操王子，获得过不清楚是哪一级的冠军，总之是足够的牛。蓝文的故事许多都在我的认知范围以外，他的字是我见过写得最好的，我当时就极为佩服，读书人都很看重字写得怎么样。后来听说他有许多爱好文学的朋友，感觉他的才华绝不仅仅限于书法，我们最感到神奇的是听说他有许多校内校外的粉丝。不爱写作业的王建军每次总能顺利通过各种考试，毕业后第一个住上了别墅，又成了毕业后我们班读书最多的人。热情似火的倪四林虽然是王建军的老乡，是浙江人，但他更像是一位来自北方的豪爽的兄弟。任铁军和我一起读了环境系的双学位，他总是认真地、细致地、无怨无悔地做着各项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工作。总是奔跑在足球场上的赵红标、陈亮雄因为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在我心中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潮流。赵卫是唯一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他似乎更钟情于电子类的专业，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外系的课程，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刻苦的人之一吧。来自农村的我们觉得吃苦耐劳是应该的，但是看到来自大都市的他同样那么努力，也刷新了我们对城里人的看法。爱开玩笑的武斌是我们班最快乐的人，也带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欢笑，毕业了，我们总盼着他能到北京来出差，和大家一起

聚聚，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重温那种欢乐。来自陕西的梁向峰有大山一样的稳重，目光中总让人感受到一种要不断探索的劲头。来自四川的陈绍林是很精干的四川人的样子，我们许多同学去四川实习，他成了东道主，热情、周到地服务同学，让大家感受到精干之外的厚道。来自重庆的邓庆文是一位敦实的汉子，是我们大学时代的舞蹈王子，见多识广。来自云南的邵荣，我至今都没搞清楚他的家乡到底有多么遥远，和来自大西北的我相比，我感觉他回趟家比我还艰难许多。他说着好听的云南话，脸上永远带着笑容。来自湖南的文凤雏是一位大才子，不仅高考成绩好，而且文字功底深厚，他后来转去读了文科的双学位，我们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向。来自内蒙古的彭瑞虽然个头不高，但性格中很有内蒙古人的豪气，有非常典型的来自辽阔草原的性格特点。来自山西的董翊立同学是一个十分内秀的人，记得他曾经写过的一篇反讽文章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自湖北的高锋温和、友善，学习非常认真。来自江苏的周刘宗，皮肤白净，人很精神，符合江南水乡的特点。来自山东的王稚是我们班唯一一位女同学，她顶着我们班的半边天，压力应该还是有的，但是她一直都很开朗、大方，也积极参加各项班级活动。她让我们班免于“和尚班”的灾难，对我们班集体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要说的话实在很多，限于篇幅所限，不能把每一位同学的许多故事和特点一一记录下来，我想将来我一定会再找机会把班上的同学们再好好写一遍。有些文字是同学间的玩笑，有不当之处，也请各位同学包涵。



● 榜上有名

聂海胜校友荣获“八一勋章”

2022年7月27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清华大学2007级航天航空学院硕士校友聂海胜获颁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

1996年，聂海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加航天员选拔，从1500多名优秀空军飞行员中层层选拔、脱颖而出，1998年光荣成为我国第一批航天员。24年来，他始终牢记“为祖国出征太空”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听从召唤任挑选”的军人本色，坚持刻苦训练、时刻准备，先后三

次受命备份、三次领命出征，圆满完成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聂海胜用24载造就了三度飞天的壮举，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辉煌历程，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他“一心只为飞天，一生只为飞天”的庄严承诺。

“八一勋章”是我国军队最高荣誉，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全军有深远影响的军队人员。（田阳）

三位清华人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5月24日，欧洲科学院选举产生470名杰出的国际学者为欧洲科学院院士，名单在其官网上陆续公布。在已公布的名单中，三位清华人榜上有名，他们是：

罗开红，现任清华大学燃烧能源中心教授。1985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南安普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长期从事燃烧和燃料、流体力学和复杂流体、空气动力学和气动声学、跨尺度复杂问题的基础研究及其在能源、动力、航空和交叉科学等领域的应用。

姚良忠（1987级硕、1990级博，电机），现任武汉大学智能电网研究院院长、电气与自动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大规模及分布式新能源并网与运行控制、直流输电及直流电网、智能电网及新能源发

电中的电力电子技术应用、规模化储能等技术研究工作。

徐泽水（2005—2007博后，经管），现任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智能决策、信息融合、模糊数学与优化算法等研究，系统地创建了复杂信息决策理论与方法体系。

欧洲科学院，又称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学院，外文全称为Academia Europaea（The Academy of Europe），成立于1988年，由英国皇家学会及欧洲各国国家科学院发起，总部设在英国伦敦。下设23个学部，学科领域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等，是国际上跨地域和学术领域最广泛、学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自成立以来，已选出近5500名欧洲科学院院士（MAE），其中有近9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田阳）

吴北生：英雄无言 岁月有声

○吴新姿

吴北生，1929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江苏省常州市。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1957年11月进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长期从事导弹技术和武器系统的研发工作，参加过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等多种类型十多个型号的预先研究、技术攻关和工程研制；曾任二院二部主任，二院科技委主任等职。曾担任七机部地空型号总设计师组副总设计师，负责我国地空导弹系统研制的技术抓总工作，先后任红旗三号、红旗七号副总设计师，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技术负责人，B610、B611、B6系列总设计师，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2次，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1次，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各1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2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布的12位导弹功勋之一。

20世纪60年代，一辆由华沙方向开来经莫斯科转西伯利亚至北京的火车驶进北京火车站，车上下来的是刚从东德采购“8109”工程所需设备归来的吴北生。漫长的旅程深深刺激了吴北生，仅仅在交通方面，中国就与国外差距巨大，更不用说科技水平了。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难道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办不到？”

“——能！”



吴北生学长

他完成了首次雷达卫星标定实验和对空目标的监测预警研究试验。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发射雷达标定卫星和组织观测试验，组建了我国卫星发射史上有名的“一箭三星”中的一星。从“东风二号”“红旗三号”到“红旗七号”，再到“B610、B611、B6系列”，亲历并见证了我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

吴北生说他“开了很多头”，正是这些开头为后来的研制工作趟出了路子，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我国防空导弹研制能力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

从基础薄弱的大环境起笔，到耄耋时“淡泊明志”收笔，一幅关于拼搏与梦想、开拓与创新的画卷，伴着“导弹人生”的荣光，满怀“国家富强”的期望，铺展开来，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吴北生进入清华那一刻讲起。

又红又专，躬身报国敢担当

1948年9月，吴北生正式到清华大学



青年时代的吴北生

电机系报到，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从此也开启了吴北生在共产党和新中国培育下的新的人生追求，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那时，正值北平解放前夕，刚入校不久的吴北生在中共清华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保卫学校，反对南迁”的学校“保卫战”运动。对于吴北生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共产党先进思想影响下，吴北生逐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充分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10月1日，吴北生与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听着毛泽东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他无比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对于吴北生来说，清华园的求学时光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他思想觉醒的关键时期。在清华，他不仅具备了过硬的科学素质，培养了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还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将家国情怀根植于言行举止之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北生和清华园的许多进步学生一起，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到志愿军的行列，国家考虑到建设新中国的要求，不提倡理工科学生参军，他们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吴北生迅

速调整心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

1952年8月，吴北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军委通讯部。在张家口军委通信工程学院，吴北生正式参军入伍。1953年，吴北生接到一纸调令——“西北军区急需通信人才”，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位置偏远、条件艰苦的兰州，仅用一年时间就从“门外汉”成为人人称赞的“行家里手”。1957年，为发展我国导弹武器系统，吴北生被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余生都深耕于此，赓续绵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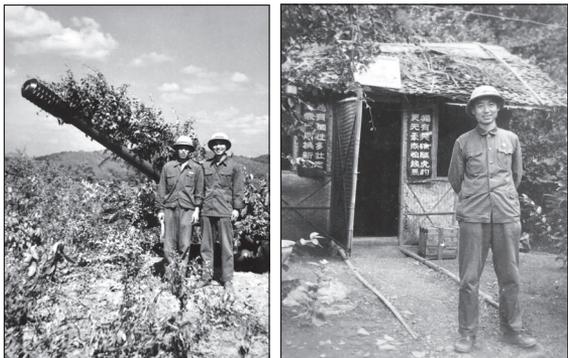
舞台虽不同，本色永不改。他就是这样，家国情怀大于个人追求，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组织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毫无怨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大胆。要想！要愿！要敢！”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要努力培养自己成为红色专家。195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强不息，大漠沧海射天狼

1967年初，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时任国防科委组织器材工作组副组长的吴北生根据组织安排，远赴前线。他们的任务是收集被我军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内的电子武器装备。

第一次上战场，听着头顶上飞过的轰鸣作响的轰炸机，他感到自己从未离死亡如此之近。神圣的使命感，令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和战友们在山势险峻、地形复杂的北越阵地穿梭。他们必须时刻做好警惕和隐蔽，避免受到轰炸机的无情扫射，每一次下来，对每一位成员都是体力、耐力和意志力的严峻考验。

吴北生和小组成员住的房子隐蔽在山脚下，是用竹子编织的席子和竹竿搭建而



吴北生在越南战场工作基地

成，屋内潮湿阴冷。虽然生活条件简陋，但是他们拥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住处的门上还贴着毛主席的诗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此来激励自己。

经过诸多艰辛的吴北生小组，在越南战场上奋战了7个多月，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这次经历，让吴北生真切体会到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兴则社稷兴。

临危受命，脚踏实地攻军贸

相较于其他领域，军贸型号合同执行严格又苛刻，时间节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果延误交付不仅是赔偿的问题，还将对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这意味着研发既要达到较高的靶试精度，也要在短期内达到一定产量。当时，我国没有可供军贸出口的产品，航天领域一致认为开拓军贸市场势在必行。

为此，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火速上马B610项目，并确立为全院各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优中选优、强中选强，成立了一支强强联合的战队。64岁的吴北生再一次

临危受命，任项目总师，老搭档沈忠芳任总指挥，两人带领团队开疆拓土、驰骋沙场。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吴北生的思路就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已有的技术优势完成研发。

“将红旗二号导弹改装为B610地地导弹，把无线电制导的地空导弹改成以新研制的捷联惯性制导的地地导弹”——吴北生经严密论证后创新性地提出了首选方案。此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普遍质疑，但在当时二院院长刘从军坚决支持下，沈忠芳、吴北生团队坚信这是争取军贸合同唯一可行的方案。

可惜的是，首次飞行试验未能取得成功。面对失败和质疑，作为团队主心骨，吴北生顶住巨大压力，保持冷静，他对导弹残骸进行细致的故障排查，记录实验数据，展开缜密分析。

将错综复杂的问题抽丝剥茧，吴北生提出了“两年闯四关”的计划，同时确定了十项技术措施，进一步改善设计方案，为团队指明了研究思路。接下来的一年里，吴北生团队没日没夜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攻关，终于在1988年6月迎来了万众期待的首飞试验成功。大家相拥在一起，任凭泪水肆意流淌，“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B610导弹武器系统工程项目在我国属于开创性工作，即使在全世界，也仅有少数国家掌握该技术，试验成功的意义不言而喻。大家欢呼雀跃，相拥在一起，任凭泪水肆意流淌。吴北生久久不能入眠，他回想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感慨万千，不禁挥笔写道：

□ 清芬挺秀

一箭冲霄展宏图，“红旗”化作“东风”舞。

莫道旧瓶装新酒，得来全凭苦功夫。

挫折可作成功母，众志成城无险阻。

今朝重任齐踊跃，明日从头迈新步。

1990年，B610试飞成功！

1992年，B610出口试飞成功！

1999年，B611试飞成功！

吴北生团队先后取得了B610多次大型飞行试验的成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批生产军贸交付任务，顺利打开合同执行的大门，实现军品贸易零突破，为国家创汇上亿美元。发展利用B610创立的技术基础，1999年又创新发展了全新的B611型号。B610、B611先后荣获航空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吴北生本人也受航空航天工业部通令嘉奖，二院为他记二等功。

时代的荣耀属于创新者。吴北生继续打破思维定势，提出了“型号系列化、滚动发展”的决策，带领团队开辟了以B611、B611M等多个对外合作项目为中心的B6系列导弹武器系统，成功签订多个大型出口合同，积累开拓了市场，为型号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次次难题出现，一次次创新攻坚。吴北生始终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冷静的心态分析局限，以进取的精神脚踏实地，那些“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才得以滋养、向阳生长，终成“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美景象。

厚德载物，淡泊名利守初心

应对严峻的军贸市场形势，高效的工作是确保合同如期履约的法宝。如何管理好团队？如何构建良好协作配套体系？如何有效解决等、靠、要、推诿、扯皮等老大难

问题？答案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吴北生每次会议从不迟到，他始终坚持“到一线、察实情”“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科研生产一线，总能看到头发花白的他坐在年轻同事的身边讨论问题、听取意见、倾囊相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吴北生犹如一颗定心丸，只要他在的地方，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只要他在的地方，就会产生一种凝聚力。

从B610到B611的每次进场靶试，吴北生从未缺席。有一次进试验场前，年逾70的吴北生腰部患上了带状疱疹，无论站立坐卧，都疼痛不已。医生和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试验场，在家安心休息，万一感染就会有危险。“就是些小疱疹，没什么事，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好。”吴北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出现在试验场，他强忍着病痛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奋斗，令整个团队深受鼓舞，士气高涨。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快圆满完成试验任务让吴总早点回京治疗和休息。

“正步”人生，从不“稍息”。即使在退休后，80岁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技术研制一线，像其他人一样实行8小时工作



吴北生（左）返校参加校庆和同窗好友凌瑞骥在当年住过的宿舍楼前留影

制，出差、开会、坐车深入戈壁滩试验场、亲临现场分析数据是吴北生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对科学技术的孜孜以求，“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着年轻一代工作者。

吴北生极具亲和力，很少用“我”，而多用“我们”这样的字眼。面对事业上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他常说：“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的贡献微不足道。”型号队伍里无论男女老少，谁生病

了，他也记挂着，亲自嘘寒问暖，分房子、评职称，他也都主动让给更需要的同志。

对于“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样的经典之问，无论任何时候我们的回答不应有改变，犹如吴北生，英雄之于国家，先锋之于民族。伟大的成就生发于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行者无疆，星辰大海；心怀炬火，点亮苍穹。

（吴新姿根据马杰、宋晓明主编《导弹人生》等资料编写）

西域边城的科研探路人

——访 1998 级水利系校友孙福宝

○任风远

孙福宝，2002年和2007年分别于清华大学水利系获学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委员，二级研究员，兼任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新疆阿克苏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

一场洪水过后，结缘水木清华

近年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干旱、洪水等灾害常常令孙福宝感到“时不我待”。他长期关注全球变化与陆地表层水热格局，水资源与河流保护更是他决心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信仰。他总对学生说：“没有发自内心的爱，你很难把水利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而他与水利的缘分，还要回到1998年全国范围内洪水肆虐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孙福宝刚刚参加完高考，他



孙福宝校友

记得很清楚，去学校车轴山中学报志愿的那天，家乡河北唐山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洪水淹没了农田和村庄，连回家的路也被淹没了。曾经温柔的母亲河为什么变成了摧毁家园的猛兽？忧心忡忡的孙福宝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只花了几分钟时间便填写好了唯一的志愿——清华大学水利系。

来到清华园的第一天，孙福宝从学校

西南门走到东大操场报到，跨越了大半个清华，每一栋建筑、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到新奇。“一时间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怎么学习。再加上我高中就入了党，在清华参加了一些党组织活动和社会工作，也不知道每个方面该占多大比例，可以说是懵懵懂懂地过来了，但整体还是很兴奋。”

“双肩挑”是清华的传统之一，尽管学业压力很大，孙福宝还是担任了年级党支部书记、党课组长，以及系里的团委副书记和辅导员。“清华的辅导员向来对低年级同学非常爱护，学弟学妹有什么问题也愿意求助于辅导员。例如每次考试后，总有些学生情绪低落，那么辅导员就要去疏导，有时候还会帮着辅导一下具体的功课。有段时间，我经常跟学生谈话，聊到晚上的一两点钟也是常有的事情。”孙福宝在辅导老师、学长、助教的多重角色中，逐渐学会了站在不同人的角度来想问题，在集体中尽量考虑到大家方方面面的诉求。“清华给了我一个这么丰富的世界，让我有机会不单纯只是关注课业的学习，也有机会生活在一个积极向上团结的班集体中，还有机会得到了组织协调能力的锻炼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这使我更全面地成长，对我后来从事管理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难忘恩师教导，坚定科研道路

在孙福宝看来，清华之所以能塑造人，很重要在于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师，他们在向学生讲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传达着内心的理念和责任。孙福宝的本科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博士生导师雷志栋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水文水资源学

科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很执着，对学生也非常耐心、宽容，这对孙福宝的影响非常大。

孙福宝读博期间，做了两年辅导员，牵扯了部分精力，导致博士开题报告并不顺利，评审得分较低。“很多老师希望学生只做科研，雷老师却看重学生的全面成长，他不仅没有反对我做辅导员，还经常骄傲地对其他老师说：‘福宝现在是孩子头儿！’事实上，雷老师既是学术带头人，又当过系主任，本身就是‘双肩挑’的标杆。”

同时，雷老师从正面来鼓励学生，指出孙福宝的研究还是有优点的，比如文献的综合回顾做得不错。他总是耐心地和学生一起调整研究方向，重新设计题目，在计算结果中提炼出关键的信息。孙福宝感慨：“处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甚至有些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很多老师急于让学生写出论文、发表成果。但学生的成长有快有慢，有适应和不适应，雷老师能够理解并包容我慢慢进入科研状态，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文献、做计算、做实验，这是很难得的。”

毕业时，孙福宝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共20名）及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前1%），这两份荣誉对孙福宝来说意义非凡，他从此坚定了做科研的信心。如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只要一想到老师对自己的信任和包容，想到自己曾是清华优秀毕业生，获得过清华优秀博士论文，就觉得学术这条路还是应该走下去。

此身远渡重洋，仍记归国初心

毕业后，孙福宝选择出国深造，先后



二〇〇七年，孙福宝（右）与时任校党委书记陈希在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现场

在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于2011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讲师。在国外学习、工作期间，虽然孙福宝的研究方向随着不同项目经历了几次调整，但他都能很快适应，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还获得了欧洲地球科学学会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这得益于我在清华读博期间打下的基础。对于如何阅读海量文献，如何把一个科研项目从0推进到1，我内心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孙福宝说。

孙福宝所在东京大学的科研团队是一个人数较多的大团队，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气氛相对严谨，看重敬业精神、守约守时的工匠精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研团队则是个小团队，两位著名科学家指导一个博士后，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气氛也更轻松，更容易给人思考的空间。

“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在与导师一起喝咖啡聊天的过程中萌发出来的，而那些想法后来证明是比较有原创性的。特别是我在澳大利亚的导师Graham Farquhar教授，他是澳大利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另一位Michael Roderick教授是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会士、道尔顿奖章获得者，他们视野非常开阔，聊天时思路很发散，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在孙福宝看来，拥有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经历和视角是非常宝贵的，对后来自己带团队颇有帮助。

在外深造的这些年，孙福宝时常思考回国事宜，当初出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去开拓视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学成之后肯定是要回来服务国家的。

“我18岁就入党，算是一名‘老’党员，一直想回国发展，心里总有这个情结。”2014年，他辞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职，作为“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工作。刚回国的时候，孙福宝的收入比在国外工作时低了不少，尽管让人有些不理解，他却认为回国并不是多难的选择。

“报效国家不是一句空话，国家对你的需要比国外对你的需要大得多，你不再只是单纯做实验、分析数据、发表论文，而是要切实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清华老一代教育家邢家鲤先生常对我们说，清华的学生不应追求做世俗意义上的‘精英’，而应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守理想并为之奋斗，不忘为人民服务。邢先生是一位‘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终留影于壁上’式的教育家，那种‘有温度的教育’影响了我们一代清华人的选择。”

科研行政“双肩挑”， “自强不息”是一种韧性

孙福宝回国之后，赶上了中科院地理资源所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时期，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地大物博，各种典型的地理单元都有，以水为组带的地理科

学问题很多，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孙福宝找到了归属感，组建了科研团队，看到了未来事业的方向。

让孙福宝略感意外的是，不久，地理资源所领导决定任命他为综合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主管行政事务，通常很少由一线科研人员担任，孙福宝一时犹豫，但回忆起自己在清华“双肩挑”的经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无论在哪儿，都得把国家的需求和个人的特点相结合，在科学院系统工作也是如此。我很感谢组织的信任，应该平衡好自己的时间，珍惜难得的机遇。”

办公室杂七杂八的事情特别多，孙福宝就周一到周五处理各种事务，晚上和周末加班做科研。那段时间，孙福宝需要处理各种综合材料，接触到了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和阐释问题的方式，原来地理科学是这样一门大学问！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地理科学的内涵和经世济民的使命，从关注纯水文问题拓展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灾害的适应性，逐渐聚焦于全球变化与陆地表层水热格局这一方向。”孙福宝就这样把旁人眼中繁杂的事务性工作经历转化成了科研优势，陆续在国际高质量期刊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几十篇，多次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作特邀报告，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晋升为二级研究员……孙福宝以第一作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时，有同事开玩笑调侃：“所办主任也能发表PNAS论文！”“知难而进，这大概就是‘自强不息’吧，”孙福宝对记者说，“人生都是曲曲折折的，有时候

顺一点，有时候阻力大一点。毕业越久，对清华校训的感悟就越多，我理解的‘自强不息’就是一种人生的韧劲和坚持。”

从甘肃到新疆，愿做一名探路者

2016年，受组织委派，孙福宝前往位于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挂职任副校长。

“因为我是科学院来的，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把分管科研的重任交给了我。虽然我是挂职，实际上和任职并没有差别，而我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事情。”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长期以来局部生态环境问题却十分严重。2017年，中央督查组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专项督查。孙福宝清楚祁连山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于是建议学校领导重视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并从生态环境的保护来理解学校的学科定位。2017年，河西学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张掖市政府成立了祁连山生态研究院，并邀请甘肃乃至全国的研究力量参加祁连山生态论坛，共商祁连山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河西学院还成立了祁连山菌物保护利用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此期间，孙福宝鼓励学院教师积极申请科学基金和科技专项，并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帮助大家完善科研计划，大幅提高了国家级项目的批准数量，有力提高了学校科研水平。

2019年，孙福宝又作出了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他决定远赴新疆，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科院党组和新疆生地所考虑到工作上的需要，想选拔一位专业性强的、年轻的干部去任职。刚开始找到我，我有一点迟疑。除了家庭的因素，

我还要考虑在北京的科研团队。好在院里和所里都很重视，不仅对我的家庭生活比较关照，还保留了我的科研团队，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奔赴新疆。”

新疆地域广大，约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虽然有多个国家级的野外台站，但地理位置或分散或偏远，要进行试验测试和实验研究都有很多困难。面对这样的科研环境，孙福宝身上却散发着一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他将自己比作探路者，相信这份工作会带来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独特收获。“新疆潜藏着非常多的科研课题。来到新疆，我最大的任务是在内地与新疆科研工作中发挥桥梁作用。”

新疆地理研究亟需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支持，面临着经费短缺、人才流动性大、队伍难以稳定的困境。2019年在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下，院里启动了“新疆可持续发展研究”特别专项，孙福宝参与了这一专项的前期设计和组织实施，并与团队一起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严格执行工作部署，高质量完成了任务，推动专项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新疆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但我作为骨干全程参与其中，很有干劲儿。为了科研，再苦再累也值得。”

与此同时，孙福宝还兼任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阿克苏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阿克苏地区是天山南麓的西域边城，从乌鲁木齐出发，孙福宝需要先乘飞机到阿克苏，再开两个小时的越野车，才能到达阿克苏站。为什么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承担这项工作呢？这其实与清华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导师雷志栋院士长期关注该流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曾亲自带来此做野外调查，前后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这里有很多科研人员至今还记得他。雷老师获得的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都是以阿克苏站所在的塔里木河流域为核心内容，我永远不会忘记雷老师去世前在医院对我的教诲和嘱托。我当这个站长是对清华精神的一种传承，也算是完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小愿望吧。”

在新疆工作的这些年，孙福宝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线科研工作中。野外站、课堂、餐厅、宿舍、篮球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如今，传统水利已逐渐向生态与智慧水利迈进，孙福宝也从一个单纯的清华学子成长为一位站得高、看得远的学者和管理者，斗转星移，气象变换，不变的则是在一代代清华人身上传递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2021年，孙福宝（中）参加新疆第三次综合科学考察

厉侃：科研报国，矢志初心

○祝传海



2017年，厉侃（左）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与时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在授奖仪式上

成熟期的蒲公英种子，会随风飘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落地生根。如果将这些种子换成微型传感器会有怎样的有趣应用呢？

2021年9月22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厉侃与美国西北大学约翰·A·罗杰斯、黄永刚课题组等多所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合作研究成果——仿风传种子三维微电子飞行器相关论文，在《自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

作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厉侃告诉记者，这一成果以风传种子为灵感，设计了一类可随风飞行的被动驱动微飞行器，能够实现无主动驱动的长时间、远距离飞行，是迄今为止人工制造出的最小飞行器之一。更为有趣的是，这些“种子飞行器”还能搭载复杂的集成电路，为未来的物联网技术提供更好的空间范围，对环境、生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在不久前，厉侃与华中科技大学黄永安团队开展飞行器柔性智能蒙皮测量技

术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首创了大面积柔性智能蒙皮传感/测量系统、大规模多元数据采集系统、大数据分析与显示系统。

虽然刚回国没多久，但是厉侃的研究没有丝毫停步，他希望回国后，与团队成员一起携手开展新一代先进飞行器智能感知研究，并进一步推动我国三维柔性结构与可延展电子的科研探索进程。

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彬彬有礼，斯文绅士——这是厉侃给记者的第一印象。采访之后，“别人家的孩子”“学霸”“才俊”……这些关键词又接连跳出来。

厉侃“开挂一样的人生”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2010年高中毕业凭借物理竞赛成绩直接保送清华，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博士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永刚院士，博士后在剑桥大学……青年科学家、海外优青、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收获这些令人钦羡的成绩时才28岁。

1993年，厉侃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父母都是医护工作者。中学时，受班主任的影响，他对物理竞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学校参加物理竞赛的氛围并不浓烈。初三到高一，他开启了自学阶段。当时，学校注意到他的兴趣之后，专门划出一间教室，让他在不上课时来这里备赛。学校的资源原本很紧张，却能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为学生创造学习条件，这令他十分感动。最终，厉侃不负众望，在

物理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并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厉侃起初选择在物理系的数理基科班学习。“军训以后，一次机缘巧合，同学拉着我参加钱学森（工程力学）班的二次招生考试。”厉侃再次“幸运”地考上钱学森力学班，在清华大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为他的科研铺平道路。

临近本科毕业，厉侃通过学校公派项目来到美国西北大学做交流学生。在这里，他第一次如此接近活跃的一流学者——机械工程系教授黄永刚院士。聪明好学的厉侃很快就得到了黄永刚院士的认可，而且还投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得到黄永刚老师的指导，厉侃的科研水平竿头直上。留学期间，他不仅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金，还发表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2017年，厉侃在《自然·通讯》上发表题为《柔性电子器件的自组装三维网络设计》的论文，文章阐述了如何用“缠绕的卷曲藤蔓”连接传感器和电路。这也是他颇为满意的一篇论文。

“以往的柔性可延展电子一般基于二维设计，比如蛇形导线、分型导线等，通过面内设计来增加器件的可延展性。”厉侃告诉记者，这些二维设计只有在无封装情况下，才能实现超高的延展性。但在实际使用情境中，这些器件都需要增加一些封装予以保护，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器件在实际应用时受到外界损伤，同时也避免植入式器件的有毒部分给人体组织造成毒害。但是加了封装材料以后，此前二维设计的可延展性会变低。因此，厉侃采用三维螺旋导线设计，去替换以往的二维蛇形导线。最终，螺旋线在封装状态下，依然

可达到131%以上的可延展性。可以说，这项设计就像一个缠绕的卷曲藤蔓，可以连接传感器、电路和无线电。加之电子电路问题和机械问题也被考虑在内，物理布局将得到充分优化，比如传感器的放置、电线的长度，都会被设计得尽可能减少信号干扰和噪声。

从这篇论文开始，厉侃在三维柔性结构与可延展电子研究领域所向披靡，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2019年博士毕业后，他来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是晶格材料的力学分析与设计，师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主席诺曼·弗莱克。在不同的国家，跟随领域内大师学习，开阔了厉侃的眼界，他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科研的养分。他说：“我希望我做的这一切，可以在日后更好地回馈、报效祖国。出国就是为了更好地回国，这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

他与爱人为幼子取名“轩辕”，一则音谐母姓“袁”，二是寓意中华民族，希望孩子也能铭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奇妙的三维柔性电子之路

厉侃多年来的科研成果中，“三维”是最高频率的一个词。而这个研究方向也是随着科研的不断深入才逐步确定的。到如今，他已经和三维柔性结构与可延展电子难舍难分了。2018年，他更是通过把工程薄膜热电材料集成到柔性三维结构中，解决了传统热电器件可延展性差的难题。

近几年来，具有能量收集功能的微型半导体设备为可穿戴技术和传感器铺平了道路。尽管热电系统的表现十分可观，但随着设备小型化趋势的加速，越来越难实

现在小型器件的冷热两端保持较大的温差。研究中，厉侃发现三维结构和薄膜热电材料有着完美的契合度。他采用热电材料单晶硅的微条带，构建出三维热电线圈互连阵列。基于此，他提出把二维薄膜材料设计成三维线圈的形式，这样就能增加它在冷端和热端的温差，不仅能有效匹配热阻、增加热电功率的转换效率，还能为这类热电器件引入柔性的特点。

在这项工作中，厉侃与合作者采用单晶硅制备了热电螺旋线圈结构——在蛇形结构中加入P型硅带和N型硅带，还给系统顶部和底部都封装上聚合物涂层，以机械方式引导组件通过压缩屈曲的方法，即可让二维蛇形结构生成三维螺旋结构。如此一来，系统就可从二维模式转为三维模式。在需要器件进行大变形拉伸和弯曲的应用中，三维线圈能提供充分的机械柔性和稳定性。这种特性使得系统非常适合在人体手腕或脚跟上应用，利用人体与空气间的温差为可穿戴电子器件供能。

事实上，这项研究成果和厉侃的“种子飞行器”也有关联，都属于三维结构应用类成果。以在热电领域的应用为例，三维结构往往具备二维平面结构无法实现的特殊性能，“种子飞行器”所展现的是三维结构在飞行器设计中能在流固耦合领域产生特殊效果。

2019年7月，厉侃以《先进材料的屈曲和扭曲成可变形的三维微观结构》为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论文。这也是一次关于三维结构的探索，不仅研究了三维结构的用途，还探讨了是否有更好、更有趣的三维结构，以及是否有制造三维结构的新方法。事实上，此前的三维组装方案是在均匀的基底上去

形成三维结构，而厉侃的这项研究关注的是能否将均匀基底替换成一些具有剪纸图案的基底，从而去形成新的一类具有局部扭转的三维结构。

2021年年底，结束博士后研究之后，厉侃全职回国，入职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黄永安教授课题组是国内柔性电子最好的团队之一，其实实验室柔性电子微纳制备技术甚至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能让我的科研更有的放矢。”厉侃告诉记者。

“在柔性电子领域，现在国外和国内已经不能简单评价谁更先进，因为无论实验条件、经费支持力度还是研究团队水平等都没有太大差异，有的仅仅是区域文化上的区别。”厉侃说，过去我国强调科研的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但现在也开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有些学校甚至允许老师10年不发表文章、专注基础理论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前，厉侃与黄永安教授团队合作，针对复杂曲面多功能电路的共形制造关键难题进行攻关，取得理论与技术进展，提出了曲面高精密电路的自愈合剪纸拼接策略，实现了柔性传感系统在复杂表面上的共形组装与应用，可以极大推动柔性智能蒙皮走向航空航天的实际应用。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我目前的研究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共同努力，将这项研究做成一个热点，让我国的原始创新领先国际。”回国后，厉侃也在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他希望可以帮助每一个团队成员去实现他们想完成的东西，也希望团队成员既有单兵作战的实力，又有团结协作的能力。

将甘为人梯的精神传递

如今，全职回国的厉侃有了多重身份。

他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严谨、上进、心怀梦想，期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辉煌的成果；他是一个新手爸爸，温柔、细腻，期待给年幼的孩子最好的宠爱；当然，他也像自己曾经崇拜的黄永刚院士一样，成了一名老师。他感恩自己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也时刻铭记着恩师的教诲和无私付出，并希望将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没有见过伊利诺伊州的日出，不足以谈勤奋。回忆在美国读博的过往，厉侃依然清晰记得，黄永刚院士凌晨3点和我们一起逐字逐句修改论文的情形。

“黄永刚院士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起床非常早，一般是凌晨3点就起来。有时候他会早起和我们一起改论文，我就不定一个凌晨3点的闹钟。”厉侃说，黄永刚院士会投入非常多时间帮助学生，而不是仅仅给一个建议。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厉侃说，当一名教师，被学生们称呼为“老师”，是责任，更是人生的修行。不过，在学生眼中，他更像一位“学长”——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不会让人感觉到丝毫的压迫感。但在科研上，他又非常严谨认真，像自己的导师一样，对学生的要求异常严苛。

什么是创新？“创新绝不是炒剩饭。别人做了一个工作，跟风去做，或者只是做点改动、做点拓展，这绝不是创新。”厉侃认为，创新必须是全新的方法或技术。

就拿柔性电子领域来说，近年来，我国把与柔性电子息息相关的新一代信息产

业、先进材料、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等列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抓住这一绝佳的历史性机遇，实现超常规、跨越式的开道超车，而不仅仅是在别人开辟的赛道上弯道超车，就必须大力推进柔性电子学科发展，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

“做科研一定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定力。”对于自己正在培养的这些未来科研工作者，厉侃充满信心，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科研兴趣，要有内驱力，而不是让导师成天在后面“拿着小鞭子抽打”。第二，要不断拓展自身能力，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要学会从不同学科的交叉领域获得启发，进而不断完善自己各方面的科研能力，不断学习提升认知曲线。第三，要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无论讲PPT还是做具体的科研项目，都一定要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千万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最后，还要培养一些业余兴趣。“要知道，工作并非生命的全部。”厉侃说，现代社会压力巨大，必须有调节的手段。有时，他也会通过撸猫、打游戏或者听音乐、看电影来放松自己。“在科研之外，也需要一些独立的兴趣来丰富生活，支撑自己。”“执着、坚守、有趣、年轻”——这是对这位年轻的“90后”博士生导师的最好注脚。

怀揣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秉承润物无声的师者风范，厉侃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更像一位阅历丰富的老师，在科研之路上开疆拓土，为推动我国柔性电子领域科研探索进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转自“科学中国人”公众号，2022年8月10日）

李浩然：多面中国的观察者



李浩然校友

李浩然，中国香港人，2009年获得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2009—2012年任贵州省息烽县县长助理，现任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首席战略官、华润资本境外业务部董事总经理、基本法基金会会长。2016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2017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太平绅士”职衔。2021年12月，经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当选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

学业主轴 立足基本法

2000年，李浩然结束了自己在英国的硕士学业，来到清华大学继续攻读法学第二学士学位，至2009年博士毕业，他在清华大学一待就是十年。

从香港到英国再到北京，三段学习经历横跨三种不同专业。这一常人看来有些突兀的转变在李浩然心中却有内在逻辑。

“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我本科是在香港读的，后来又去了英国。但在英国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于是萌

生了回国读书的念头。北京作为首都，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自然而然成为我回国的第一选择。同时，我对法律一直都很感兴趣，但是大陆的法律体系与香港、英国的普通法系相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我也想了解一下大陆的法律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选择了法律专业开始学习。”

在清华大学拿到法学学士学位后，李浩然先是跟随王振民老师进行了两年的研究工作，随后于2006年开始跟随王振民老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香港的成长经历让他对基本法有着天然的兴趣，也让他选择将香港基本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确保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实施。但是，当时在香港真正研究基本法的人却非常少。如此重要的一部法律受到了不应有的“轻视”，这让李浩然觉得很不应该。这种反差，让他觉得更应将基本法研究好、研究透。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积累了大量制定基本法的原始资料，这也给李浩然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仍有部分起草资料保存在香港政府基本法图书馆中，而这部分资料又无法外借。于是他只能回香港，将这部分资料复印后带回北京进行研究。资料数量之多，以至他必须使用行李箱作搬运工具。在翔实的资料支撑之下，李浩然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

下乡扶贫 驻心息烽县

“没有接触过中国的农村，永远也不

敢说自己真正了解中国；没有了解过中国的农民，我的学习也是不完整的。”在李浩然博士毕业时，恰逢清华大学与贵州省有合作协议，由清华大学选派优秀毕业生去贵州工作。在导师王振民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李浩然来到贵州，担任息烽县县长助理，分管全县的教育、司法、法制等工作。

李浩然说道：“当时贵州省是中国最为贫穷的省份之一。我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对于农民、农村知之甚少。但几个月接触下来，我发现农民身上有着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美德：他们勤劳、淳朴、善良，生活艰苦但是乐观。这让我相信他们的贫困一定只是暂时的，经过适当的引导，他们肯定也可以过上好日子。”

“扶贫过程中，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既要扶贫，也要扶志，还要扶智。以往直接对贫困户进行物质帮扶的方式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在扶贫工作中，更应考虑如何带动贫困户自己的积极性，使他们自己有动力、有想法去摆脱贫困。”

让李浩然感激的还有清华大学在扶贫期间给予的帮助与支持。“我当时分管全县的司法、法制工作，深感一个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影响着当地发展。因此我邀请了法学院前院长王晨光老师，由他带领28名法学院师生来到我们县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培训讲座。平常工作中，当地干部很少有机会接受系统化培训，所以一轮讲授下来，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非常大。我还要感谢清华大学校医院，当地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儿童得了白内障但没有钱去治疗，所以我请了校医院的医生前来义诊。在校医院医生们的帮助下，许多孩子的白内障都被治好了。”

2012年，李浩然在息烽县挂职期满，离开贵州。“但我的心从未离开贵州，现在我还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港澳委员会委员，在贵州还有我的很多好朋友，我每年都会回去几次。”

感恩母校 难忘清华情

尽管已毕业多年，学校生活还是让李浩然难忘。

“我在清华大学法学院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好的兄弟姐妹，我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叫‘饭会’的组织，高峰时有四五十人，平时凑在一起做不同类型的研究，形成了很多学术成果，闲时则遍寻北京城，寻找各处有名的饭馆。

我在硕士期间学习‘非洲发展学’专业时开始明白，要了解一个地方，一定要对它的经济、社会、人文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北京、香港只能了解中国最繁华的一面。我到了贵州，到了农村，才对中国的另一面有了了解。感谢清华大学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最后，李浩然对清华的师弟师妹提出了自己的寄语。“进入公共部门的同学们一定要牢记，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理想，一份责任，一份对国家和百姓的理想，一份对个人对民族的责任。希望将来大家能够善用自己的才能，多为老百姓做实事。我目前在香港参与的一个国家科创项目中，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友，我们从未刻意联系，只是觉得清华人对于国家有着一种特殊的责任，所以都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希望同学们也能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历史！”

（法学院分会）

姚东：为了这口“气”，他一头扎进故乡15年

○桃 林

长期以来，清华大学积极引导支持毕业生“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为表彰坚守在公共部门、国防及军工领域和其他重点领域的基层一线校友，学校今年首次开展“笃行励业奖”评选。经过校友个人申请、地方校友会审核推荐、学校评审等环节，共评选出165名公共部门校友、62名国防军工领域校友和6名其他重点领域校友获“笃行励业奖”。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姚东正是其中的一员。

姚东，现为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西气东输中卫压气站工作人员。作为我国跨世纪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背后的一名管网战士，他不畏严寒酷暑，坚守在条件艰苦的西北戈壁天然气生产运输一线，守护着国家管网集团一座重要的枢纽场站。

最初的选择

2007年，姚东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他没有选择到大城市中去工作，而是一头扎进了他的故乡——宁夏。

姚东生在西北，长在西北。虽然这里没有大城市繁华，但依旧是他深爱的故乡。循着报效祖国的决心，凭着自身过硬的专业技能，姚东迈进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大门。

参加完3天入职教育后，他就来到了一座典型的西北场站——西气东输盐池压气站。在学校时姚东也曾在工厂实习或者参观过，可这里的工作环境完全不一样。初来乍到的姚东感到惊讶，但并没有



姚东校友

因为偏远的地区和艰苦的条件打起退堂鼓，反而是快速调整好自己，进入了工作状态。

每天与风沙、烈日和偏僻的生活环境为伴，跟着老师傅跑现场、学技术，踏遍了基层场站的每一个角落……姚东还在两周内翻译修订了1000多条英文报警信息，有效提升了机组故障排查和启机效率；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个压气站管容计算和放空量统计程序，帮助值班人员提高计算精度，提升了工作效率。

“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姚东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也只是是一个肩负能源供应使命、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普通人。

“我们的工作保障了国内主要的天然气供应，是面向全国人民的服务性行业，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感觉给我带来了很强的成就感。”正是这种爱国情怀引起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以及建设家乡的决心，让他选择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

无畏的奉献

夜深人静时，姚东关上办公室的门，结束一天疲乏的工作，走向宿舍。在节假日时主动坚守岗位、带头值班是他的常态。除此之外，他率先承包了场站安全风险因素最多的压缩机区域为责任段，高效完成了多项冬季保供等重点任务。

2014年，西三线西段宁夏段工程进入投产攻坚期，姚东在现场坚守了4个月。在11月底漫天飞雪的西北，他一直处于24小时待命的状态，将近一周的时间一直睡在车里，靠着在野外吃火腿肠、泡面、盒饭度过了投产的关键时期。最后，83公里管道、1座联络站和4座阀室一次投产成功，使得中亚天然气顺利输入陕京管道，及时缓解了首都及周边地区冬季用气压力。如此“风沙现场吃盒饭、冬季雪天守工地”的艰辛对他来说是常有的现象。

姚东的工作流动性较强，他先后在盐池、靖边、延川、中卫等地工作，他的妻儿都在银川。忙起来的时候，他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只能靠视频聊天来缓解对家人的思念。虽然无法一直陪伴亲人，但他的家人都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他自己也扎根于此，从未想过离开。

他用自己的行动承担和践行了管网人的责任和使命，将“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真正地内化于行。“现在的状况跟我当时的初衷是一样的，我从一开始就想到工业生产的一线去。”姚东坦言。

如今，他守护着的西气东输中卫压气站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场站，他所在的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更是天然气行业的领头羊。在姚东看来，这里已然可是他最好的归宿。

母校的培育

15年来，姚东已获得国家管网集团劳动模范、西气东输公司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个人、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安康杯优胜个人等荣誉称号，并带领中卫压气站成为中央企业青年突击队“百面旗帜”……

他能一直坚守在一线并取得如今的荣誉，与他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姚东认为，在清华，“爱国”是一种美好的传统。在大学期间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从最初就坚定进入中国自己的企业中工作，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清华培养了姚东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优良的学科教育也让他筑牢自身的专业知识，帮助他在工作中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从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就全身心投入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事业中，踏遍了场站运行的每一个角落，走过了管道保护的无数个台阶，勘察了工程建设的许多个工地。进入这个行业之后，让姚东感触最深的就是国内生产供应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必要性。

西气东输一线管道的所有核心设备在近十几年来已完成了巨变，关键设备实现了国产化。这让姚东感到很骄傲，也让他更进一步立志于在国家管网事业大发展中奉献力量，将抱负与热血继续投入这片理想之海。

当初与他共同扎入西气东输工程的同届清华学生，如今绝大部分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之上。姚东也希望更多的人在认识到条件的艰苦和工作的强度之后，仍然坚定地选择成为一名光荣的管网人。

李寅飞：没有浪费所学，想成为相声名家

○梅建明

他是京城学历最高的相声团体的领头人，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他说起相声来，文艺范儿很足，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元宵晚会。他，就是今年36岁的北京小伙子李寅飞。

大二与相声结缘被选拔进入德云社

2022年对于李寅飞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年。这一年，是李寅飞的本命年，也是他和伙伴创立“大逗相声”团队的10周年。8月13日，“大逗相声”将在北京展览馆进行10周年庆典演出，李寅飞和同伴们为此筹备了很长的时间。

李寅飞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一口流利的京腔，让人印象深刻。父母都是医生，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他从小成绩优异。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毕业后被保送清华读研，之后又考博成功，成了大家口中的“三清”。他是不折不扣的学霸，但他没有和很多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高材生一样加入媒体行业，而是从大二起成了一名相声演员，研究生期间还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大逗相声”。

李寅飞说，与相声结缘是在大二，“因为喜欢相声，我参加了德云社的选拔，幸运地成了德云社鹤字科的学员，当时招收学员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李寅飞随后师从相声名家王谦祥先生学习，练就了扎实的相声基本功，开始走上相声之路。“好多人认为我是郭德纲先生的弟子，事实上我不是他的徒弟。因为没有拜



李寅飞校友

师，所以不能称作是徒弟。我在德云社学了三年，每周去上课，学得不错了，就去小剧场演出，一周大概能演四到五场。”李寅飞回忆，当时都是上大课，主要是郭德纲先生的弟子高峰和李菁前来授课。郭德纲先生也亲自来给他们学员授过几次大课，但单独见面的机会不是太多。此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李寅飞的相声水平逐渐精进，在大学的舞台上展露才华，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这给了他鼓励，也坚定了他从事这个行业的信心。

读研时创立“大逗相声” 博士论文也和相声有关

2012年，硕士在读的李寅飞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大逗相声”团队，李寅飞任班主。“那时在学校经常参加演出，结识了一帮一起说相声的小伙伴，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创办一个团队，接大大小小的演出。”

李寅飞告诉记者，在校期间，他和搭档经常一起演出，取得了一些成绩。更让他觉得成就感满满的是，相声不仅没有影响学习，反而与他的学业相辅相成，“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民间说唱艺术的都市传播》，是相声给了我灵感，我在论文里分析了作品是否能打动人，需要关注表现形式、受众群体、传播方式等内容，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李寅飞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已小有名气，2012年，他和搭档受邀参加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大联欢。2014年，他们在第七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上配合默契夺得铜奖。2016年，他们又因为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相声作品《我知道》而闻名全国。2021年，他们的作品《叫卖》再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还在上学的李寅飞，凭借自己的努力，已在相声界打出了自己的名头和天地。同时，“清华学霸”“高学历相声演员”也成了他的标签。谈及这些标签与光环，李寅飞说：“刚出道时，清华的背景确实给了我一些热度，但我不可能一辈子拿这做招牌。在相声行当里，观众看中的是你的内容实力，相声能不能吸引他们，让大家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才是硬实力。”

想做相声界一股清流 高学历成灵感源泉

李寅飞告诉记者，自己的搭档叶蓬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我们的理念和想法都是较为一致的，坚持相声这一行是因为热爱，我们合作很默契，一起想段子，一起练习，一起表演，很多得意作品都是我俩合作完成

的。”李寅飞说，他们团队所有成员都上过大学，应该是北京学历最高的相声团队。

清华博士转行做相声，会不会觉得浪费所学？李寅飞说：“其实清华教会我的自强不息、行胜于言，我一直牢记，并且时刻运用在我的工作中。我觉得在任何行业里努力工作的人都没有浪费，学习能给我带来知识的积淀，包括现在我们创作很多原创的段子，很多想法、思路，都来自于多年的积累。”

李寅飞和团队努力做原创作品，良好的教育背景让“逗逗相声”的原创内容充分彰显了团队深厚的文化底蕴，充满知识性、趣味性、深刻性。比如，他们推出了包括《大话鲁迅》《大话古文》《我爱写作文》等“语文书”系列作品。一些书本上原本严肃的定律，也成了他们创作的源泉，如《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牛顿三大定律》《阿尔法狗》等“理工类相声”系列作品。“我们要远离为人所诟病的‘三俗内容’，追求上至80岁下至8岁的观众群，争做相声市场上的一股清流。”李寅飞说，“现在全部演员均为80、90后，年轻人对时代的敏锐捕捉和对相声的热爱，让我们在十年间创作出了数百段原创作品，成为京城最高产的相声团体。一年52周演出，场场内容不重复，是我们对观众的承诺。”

如今，“逗逗相声”团队创立已经十年，李寅飞还在坚持，他说，清华博士确实是自己的一个标签，但他不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一个标签，肯定要做出比这个更大的成就，让人提到李寅飞时，不是说他清华博士，而说他是相声名家。

（转自《扬子晚报》，2022年8月8日）

厚植爱国情怀 坚守为民初心

——在202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夏帕克提·吾守尔（2002级精仪）

夏帕克提·吾守尔，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精仪系，2011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委常委、柯坪县委副书记、阿克苏市委副书记，现任新疆阿克苏地区行署副专员。

本文是他的线上发言。

首先，向即将毕业的各位同学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如今我离开母校已整整10年，10年间，我在新疆阿克苏奋勇实干，10年后，我万分荣幸，心存感恩之情，向母校递交阶段性人生答卷，与学弟学妹们共诉初心情怀。

20年前，在一生从军、终身报国的父亲影响下，我立下学成报国的志向，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我至今还记得，入校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学校组织了天安门观旗活动。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为祖国自豪的感情油然而生。学子当传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这是清华人的使命担当，更是清华大学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自此我立志，必将为祖国、为人民不懈奋斗，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

四年本科、五年直博、一年留校任教，受益于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我在清华度过了人生中难忘



夏帕克提·吾守尔校友

的10年。10年中，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哺育滋养了我，“两弹一星”元勋中14位清华人用“甘做隐姓埋名人、以身许国壮河山”的豪情深深震撼了我，让我立下“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满腔的热血，怎样挥洒最有意义？身处伟大时代，只有与党同心、与祖国和人民同行，才有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才能在追求“大我”中找准“小我”的人生航向。对我来说，回到新疆，到基层去，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并以此激励和带动更多各族青年奋发向上，这样的人生才最有意义！

我扎根祖国边疆奋斗的十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十年。何其荣幸，我的人生小梦想与祖

国的大梦想步调一致并紧密相连，让我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能为实现“我的梦”“中国梦”贡献力量。在这里我有两点感悟与大家分享。

厚植爱国情怀，团结奋进、同心筑梦，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信仰和追求

清华自诞生起，自强不息的清华人始终以国家至上、以人民为先。对新时代清华学子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对于这一点，我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中有了深刻的感悟。2012年，我在库车县工作期间，以身示范、现身宣讲，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精准施策，通过开培训班、办农民夜校、建文化礼堂、搭乡村舞台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掀起各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潮。在此期间，母校还帮助我在库车县设立了远程教育基地，提升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水平和质量。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各族群众通过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了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素养，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互学互助、共同致富，创造着美好生活，同心筑牢中国梦。

坚守为民初心，开拓创新、实干担当，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和使命

百年回望，一代代清华人心怀国之大者，肩负使命、砥砺前行，在实干中成就事业，在开拓创新中展现清华人的勇毅担当，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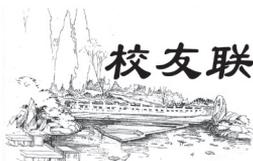
身为清华人，我一直坚持实干为先、笃行不怠。2017年，我在沙雅县工作期间，全力推进新疆50万亩农业高效节水增收试点项目。我带着干部进乡入村，走棉田梗、入农家院，给群众讲政策、说收

益、开视野、转思想，期间，母校专家亲赴沙雅提供技术指导。我们从开辟第一片试验田，到三年时间建成50余万亩规模化高效节水农田，帮助近6000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形成在南疆可复制推广的“沙雅模式”。

行胜于言、为民服务、学以致用、开拓创新，这是清华学子该有的本色，也是新疆干部的普遍姿态。在阿克苏，一代又一代各族群众用“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柯柯牙精神，成就了让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成就了经济发展勇立潮头、生态文明建设华丽出圈、民生改善暖心聚心的大美阿克苏。

在阿克苏引才聚才、重才用才的浓厚氛围下，在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引领下，在党组织的培养关怀下，我在阿克苏的十年，历经四个县市、多个重要岗位的锤炼，运用所学、施展才能，投入到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中，见证了阿克苏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在此我鼓励同学们要观大势、勇立潮头；立大志、志存高远；明大德、培根铸魂；成大才、苦练本领；担大任、奋勇争先，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朝清华人，一生家国情。盛夏时节的清华校园芳草萋萋，祝愿同学们满载学业收获，饱含爱国深情，践行“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奔赴基层的广阔天地，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绽放青春、施展才能、建功立业。



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王希勤当选清华校友总会会长

2022年6月19日，清华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校召开，会议选举王希勤为校友总会会长。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袁驷、王岩等63位理事参加，会议由史宗恺主持。

史宗恺首先介绍因学校领导工作调整，邱勇同志不再担任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并感谢邱勇同志在任期间为校友工作作出的重要贡献。随后，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王希勤同志为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同时，会议同意由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提名的校友办副主任（挂职）、工物系副教授施嘉儒同志担任校友总会副秘书长，任期至挂职结束。

王希勤在讲话中感谢校友总会历届领导，特别是邱勇同志及第八届理事会在联

系校友、团结校友、服务校友上大力投入，校友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他结合当前学校改革发展的思考，对校友会工作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对各校友组织的联系指导和组织协调，广泛听取一线校友的意见建议，使校友更多参与到学校运行中来。另一方面要团结动员广大校友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等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校友会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各方校友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清华力量，彰显清华人应有的责任担当。

参会理事们围绕校友工作和学校发展进行了讨论交流，并对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友宣传等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钱箐旋）

邱勇、王光谦赴青海看望慰问校友并参加座谈

7月6日，校党委书记邱勇、副校长王光谦一行赴青海看望慰问在青工作的校友，与部分校友进行座谈。青海校友会会长熊敦邦主持座谈。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党办校办主任丛振涛及十余位校友参加。

熊敦邦对邱勇、王光谦一行来青表示欢迎，对母校长期以来对青海校友的特殊关怀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邱勇认真听取了校友在青海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介绍，对青海校友会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表示，20多年来，以对口支援青海大

学为契机，清华大学向青海输送了大量人才，有力支持了青海发展，各位在青校友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大家的付出和努力母校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大家。王光谦深情回顾了青海工作近十年的历程，与校友分享了在青期间的一些趣事，勉励大家扎根青海、热爱青海、奉献青海。

参加座谈的校友纷纷表示，邱勇书记和王光谦副校长的慰问和鼓励让大家倍感亲切和振奋，将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馈母校的关心和厚爱。（青海校友会）

王希勤率队赴贵州考察并看望校友

7月27日至28日，王希勤校长率队赴贵州省考察并看望在黔校友。28日上午，王希勤出席了在黔选调生及青年校友代表座谈会。20余名选调生及青年校友代表参加并分享了工作生活心得体会。王希勤感谢贵州省对在黔校友的关怀培养，对选调生校友保持清华人本色，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表示肯定。他介绍了学校当前的改革发展情况，解读了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涵并指出，校训要求我们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他勉励大家要传承清华人的家国情怀，坚持国家为先、人民至上，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努力做到“真实、务实、坚实”，把个人发展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为贵州改革发展贡献力量。他希望校友们做好省校合作的桥梁，促进清华人才和科技优势服务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访黔期间，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省长李炳军会见王希勤一行，并见证省校合作协议签约。王希勤一行还与贵阳市领导就市校合作事宜展开交流，并赴中国天眼、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十研究院等调研学习。贵州省和贵阳市相关领导，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副校长彭刚，校天文系、团委、国内合作办、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科研院等相关负责人参加有关活动。

（国内合作办公室）

校友总会 2022 年第一次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举行

6月16日，校友总会2022年第一次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以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在紫清大厦举行。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副秘书长杨柳、联络部部长田星燕、发展部部长宋述强，三创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袁剑雄，校友总会所属八个行业专委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共计23人参加会议。唐杰主持会议。

各专委会主要负责人先后做本年度上半年的工作汇报和下半年工作展望。虽然疫情存在，但是各专委会克服困难，积极开展特色活动，给母校学生开展讲座，走进校友企业，并继续加强与地方企业的合作。随后，三创秘书处前任秘书长梅晓鹏和新任秘书长袁剑雄也先后发言。大家围

绕如何进一步发挥专委会资源优势服务母校人才培养、进一步办好三创大赛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

唐杰在总结中对各专委会在疫情之下能取得目前的工作成果表示肯定，同时希望各专委会增进相互间交流与学习，进一步加强和校内院系部处的合作与交流，在服务学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在承办组织三创大赛各赛道活动中，群策群力，不断创新，让三创大赛越办越好；在专委会会员发展、顾问聘任、品牌使用等方面加强规范化管理，依据《清华校友总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和各专委会管理办法规范办会。

（校友总会联络部）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艺术研究与实践学习班”开班仪式举行

8月20日，“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艺术研究与实践学习班”开班仪式举行。本期学习班为期一年半，共有32位校友学员报名参加，校友们因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相聚在一起。

在开班仪式上，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对学习班历经周折后成功开班表示祝贺，希望校友们借助此次学习班，进一步强化终身学习的意识，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美院院长马赛表示，此次开班体现了学校在“无体育，不清华”的基础上增加了“有美育，更清华”的美育理念。美院副院长杨冬江希望校友们学习后，为

美院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授课教师代表、绘画系教授李睦希望通过艺术班的学习，能够让艺术伴随校友一生。社科学院校友、上海校友会副会长韩威作为学员代表发言。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化工系校友朱德权认为“有美育，更清华”将带给校友更有趣的灵魂，他表示将继续支持校友终身学习。美院原党委书记、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李当岐表示，艺术学习班的开设对校友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希望学校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实现“有美育，更清华”。仪式最后，与会者在艺术班背景板上签字并合影留念。（校友总会）

2022“昆山杯”清华校友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

8月15日，2022“昆山杯”清华校友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清华人的动人瞬间”为主题，分为初始赛道（指原创且未公开发表，包括“清华人与清华情”“清华物与清华景”两个主题赛道）和荣誉赛道（指原创并已公开发表）征集校友拍摄的短视频作品。其中，初始赛道采取“组委会初评+网络评审+专家评审”方式，初评入选作品在“清华校友总会视频号”等媒体平台进行展映。最后以网络评审（展映后两周内的网络传播效果，占40%）与专家评审（占60%）共同打分为依据，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另外，大赛还单独设置最佳人气奖，分别统计初始赛道与荣誉赛道展映后两周内的网络传播力，排名在各赛道前五的作品获奖。

大赛自1月17日正式启动至5月31日截稿，共收到投稿视频作品65部。其中初始赛道46部，荣誉赛道19部。经组委会初评，初始赛道37部入选。参赛作品均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最终，“清华人与清华情”赛道中，《毕业二十年大会》等2部、《敦煌》等4部、《游子心》等7部和《四月天》等5部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明天会更好》等5部作品获得最佳人气奖；“清华物与清华景”赛道中，《时光巴士》等2部、《创业正当时》等4部、《清华暖二班相册》等7部和《清华印迹》等5部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红土地 清芬情》等5部作品获得最佳人气奖。此外，荣誉赛道《画记清华》等5部作品获得最佳人气奖。（宗和）

各地校友会简讯

湖南省清华大学校友会正式成立

6月19日,400余位湖南校友在长沙见证了湖南省清华大学校友会正式揭牌成立。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左清、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朱志明等领导出席;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秘书长唐杰等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远程参会。大会由湖南校友会秘书长陈峤主持。

史宗恺、左清、朱志明分别致辞。朱志明宣读了民政厅关于批准设立湖南省清华大学校友会的批文。唐杰等送上了祝福。左清、朱志明和湖南校友会会长徐岳衡共同为校友会揭牌。随后,徐岳衡做工作报告。常务副会长严文交宣布了校友会章程、财务管理办法、首届校友会理事名单等。副会长李蔓球宣读了校友会分会暂行管理办法,并且邀请荣誉会长谷新珊等为各分会及兴趣组织授旗授牌。大会当天还进行了捐赠致谢、湘民陈家驹奖学金颁奖、选调生座谈会等活动。(湖南校友会)

北美校友会联合会会员大会召开

6月17—19日,主题为“沟通、思考、共进”的北美校友会联合会2022年会员大会暨首届北美校友工作研讨会在加州召开。第三届理事会主要负责人、32家会员校友会代表及校友张素久、张耀华等近50人出席。联合会秘书长何维国主持大会,理事长何宇滔致欢迎辞,会长仰文奎做工作报告。随后,由何宇滔主持的校友工作研讨会就如何有效开展校友工作等主题展开讨论。创会秘书长马喜庆分享了联合会的创会历史。17日晚召开了疫情发生后的首次

线下每月理事会会议。大会还举行了晚宴、晨跑等活动。(北美校友会联合会)

2022年甘肃校友会年会召开

6月25日,2022年甘肃校友会年会在兰州市举行。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秘书长唐杰,第六届甘肃校友会理事会全体理事和部分在甘校友、特邀嘉宾等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年会由副会长瞿金叶主持。史宗恺肯定了校友会工作,并提出殷切希望。唐杰介绍了学校近况。会长马文杰作2020至2022年度工作与财务情况报告,副会长李俊作兴华基金会运行情况汇报,校友代表蒲铭、赵军、马彦军发言。年会结束后举办了清华校友陇原发展论坛,多位校友围绕甘肃新能源发展展望主题开展了学术交流。(甘肃校友会)

“河南校友会校友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7月16日,“清华大学河南校友会校友之家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30余人参加活动。郑州欧美同学会会长魏宁娣介绍了同学会及海创中心的成立过程。河南校友会会长詹玉荣感谢同学会为校友会提供活动基地,期待与同学会联手合作。三创大赛组委会副主任梅晓鹏表示将继续推进三创项目落地河南,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仪式现场,郑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红梅与梅晓鹏、魏宁娣、詹玉荣共同为“校友之家”揭牌。随后,校友们进行了座谈交流。仪式前,大家参观了基地海创中心。(河南校友会)

2022级天津新生座谈会举行

7月30日,2022级天津新生座谈会

□ 校友联络

在津举行，80余位新生代表、中学教师代表和校友参会。天津校友会会长庄宇向新生们表示祝贺。天津招生组负责人范宝龙介绍了在津招生情况。中学教师代表梁宏艳、吴迪等希望新生们树立远大理想，筑梦未来。新生代表曹子轩、魏煊航等表达了对中学母校的感激之情和对清华校园生活的憧憬。校友代表张翼、陈洋等鼓励新生们要以清华为新起点，面对未来挑战。名誉会长梁肃和秘书长郝玉林对新生们表达了深切嘱托和殷切期望，并希望大家毕业后回到天津建设家乡。（天津校友会）

纽约校友会举办2022线上迎新会

7月31日，大纽约地区校友会为即将赴美留学的新生举办了线上迎新会，邀请几位校友嘉宾和律师为新生们讲解校友会活动、留学和工作签证、求职和纽约生活。校友会联席会长马婧介绍了校友会的近况及如何关注和加入校友会。随后，曾晖律师为新生详细讲解了从F1学生签证、OPT/CPT到H1B工作签证和绿卡申请的过程，以及亲属类签证的发放。校友嘉宾李昊、张昊、张文心、崔雪宁等分别就新生关注的科技和金融行业、面试流程与前期准备、衣食住行、医疗服务和娱乐等作了经验分享和指导。（张文心）

韩国校友会举办清华论坛

8月3日，韩国校友会在首尔举行第五届清华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中韩建交30周年，未来合作的准备与课题”。会长朴胜赞致欢迎辞。韩国留华校友总会会长朴钉在视频致辞中希望韩中双方能深入及时沟通。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通过视频连线转达了来自母校的问候。中国驻

韩国大使邢海明希望两国能不忘初心，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等嘉宾在论坛讨论环节就两国关系、人才引进、双边贸易、学术交流等进行了分享。论坛在“清华人之夜晚”的晚餐中圆满落幕。（韩国校友会）

青岛校友会举行2022级新生座谈会

8月11日，青岛校友会2022级新生座谈会举行。青岛招生组老师张磊、胡震和校友代表一起与新生共话情谊与发展。会长王帆致欢迎辞，向在座新生们表示祝贺。张磊、胡震勉励新生们努力学习，成长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人。副会长邓力希望新生们能在毕业后回青岛助力家乡建设。副会长李晓雨讲述了自己的创业经历。新生代表郭孟涵、王裕硕表达了对清华园学习生活的向往和清华精神传承的责任感。在校学生代表姜晓雪分享了她作为招生志愿者所做的工作。校友会还向新生们赠送了会员卡。（王玉海）

南京校友会举办2022级新生欢送座谈会

8月13日，南京校友会2022级新生欢送座谈会在宁举办，老中青校友代表和新生代表参加。校友会秘书长钱俊向新生们表示祝贺，并简要介绍了校友会的发展历程和近年来的主要情况。沈国栋、陈承仁、汤本金学长勉励新生们好好学习，全面发展，学成后回南京支持家乡建设。校友企业代表刘鹏、李强介绍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在校学生代表2020级外文系陈与欣分享了入学两年来的学习生活经验。新生们依次作了自我介绍并畅谈参加座谈的感受。（南京校友会）

沈阳校友会召开庆祝母校建校 111周年大会

7月24日，沈阳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111周年大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校友总会副会长韩景阳到会祝贺，近300名校友参会。校友代表张坚强宣读校友会致母校校庆贺信。联席会长于宝海作工作总结；周宇作章程修改说明，全体校友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刘元畅作联席会长分工说明。校友代表夏德明、李卫国作工作经验分享。随后，校友会与启迪之星（东北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韩景阳对校友会工作给予肯定，并欢迎校友们常回母校看看。联席会长兼秘书长哈刚主持会议并作校友会二级组织说明，公布新任秘书处成员名单，最后代表校友会向母校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沈阳校友会）

西雅图校友欢聚一堂共迎中秋

9月3日，200余名西雅图地区校友及家属在Juanita Beach Park举行野餐会，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参会成员中有1970年代入学的老校友和“15后”海外“清二代”，也有事业有成的杰出校友和应届毕业生。校友们举行了才艺表演、野餐会、露天烧烤、草地排球等娱乐项目。席间，校友会会长石学工公布理事会换届信息并介绍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前秘书长完强介绍了本地区校友工作的历史沿革，上届理事会成员李岚、李峻、王印海等通过录音送上了对新一届理事会的寄语。校友会Logo设计者翁辰介绍了设计巧思及自己的清华求学历程。校友会还举办了清华纪念品义卖，电影《无问西东》同款西南联大校服获得了校友们的追捧。（原博）

南安市校友会举行夏日野餐会

8月28日，145位加拿大南安市校友及家属参加了“后疫情时代”首次校友聚会。赵长聪会长欢迎大家的到来，并邀请来访的黑龙江及哈尔滨校友会秘书长虞云、温哥华校友会会长何维国和理事陈梅分别作了简短致辞。随后，主持人李宝松邀请所有南安市校友兴趣团体的队长们汇报了近期活动，包括线上讲座、摄影赛、云合唱、云舞蹈，还有近期网球队、排球队、高尔夫队在加拿大中国高校赛事中斩获冠军的喜讯等。重头戏夏季野餐会令人耳目一新，餐饮组订购了聚会的必备美食，包括川菜、炒饭、自制苹果汁等，还有虞云带来的面包甜点。席间还进行了有奖游戏。野餐会在校友们的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合影留念。（南安市校友会）

2022 波士顿校友会迎新活动举办

9月11日，百余名波士顿地区校友和友人齐聚麻省剑桥市，欢度中秋佳节，喜迎新校友。新老校友畅叙校友情谊，探讨职业发展规划，分享日常生活工作。新任会长高苹代表校友会致欢迎辞，校友会将会一如既往地联络和服务大波士顿地区的校友。香港同学会负责人之一王顺龙校友作为嘉宾发言，回顾了自己在清华求学以及服务校友会工作近三十年的经历，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不同校友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校友会精心准备了龙舟队选拔用划船机，新老龙舟队员及很多新同学都踊跃参加，相互比拼和交流探讨，延续了热爱体育、强身健体的良好传统。本次聚会还吸引了很多兄弟院校及长期关心关注波士顿校友会工作的朋友参与。（颜昊）

● 校友消息

物 602 班不简单，全体同学“八零后”

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堪称奇迹的班级，就是工程物理系 602 班——2022 年，物 602 班全体同学都度过了 80 大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八零后”，而且一个都不少。这不仅在清华大学 1966 届极为少有，就是全国恐怕也罕见，值得热烈祝贺。

是什么成就了物 602 班的奇迹呢？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大家都心怀强烈的责任感，在各自单位都是中坚骨干，不负韶华、不负使命，为祖国的发展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分在核战线的同学们隐姓埋名，不惧核辐射的危害，甚至身揣核辐射损伤残疾证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分在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同学们，科研成果累累，教学成绩斐然，桃李芬芳满天下；有的同学曾任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国际核裁军谈判，却从不张扬；还有同学从政，位居高官，却不忘初心，永葆普通一兵本色；也有同学自主创业，成了业内领军人物，可谓“行行出状元”。每位同学都有一段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故事。

其次，每位同学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这也要感谢母校对学生健康理念的培育。大家都记得每天下午四点半，所有同学到操场、球场进行体育锻炼，使大家养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受益终身。

最后，物 602 班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永葆不变。1966 届本科学制六年，毕业之际赶上“文革”，晚了两年离校。八年相守，同学之间亲如兄弟姐妹，即使在“文革”期间，同学们也能友好相处。毕业后每次校庆，物 602 班返校率总是名列前茅，

可见该班同学情之深意之切。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永恒不变的是同学情。由于大家毕业后各奔东西，又身处“文革”时期，不少同学还隐姓埋名从事保密工作，因此，直到退休后，大家才互相联系起来，而旅游则是最好的联络方式。很多同学多次出国游，国内几乎跑遍了主要旅游景点。史方喜欢骑电动车，带上老伴到处兜风游览。张炳岳喜欢开车，64 岁拿到了驾照，之后买车开始了自驾游之旅，过足了开车瘾。同学们还自发组织了三次旅游聚会。

除了旅游，锻炼更是日常不可缺少的活动。很多同学通过锻炼保持了身体矫健和柔韧。张炳岳擅长三角倒立，80 周岁后仍然喜好单双杠“童子功”，还喜欢惊险刺激的运动——在新西兰玩过 1.2 万英尺高空跳伞和世界最高的高空秋千，还驾驶过好似水上过山车的喷射快艇。王少阶爱好唱歌，黄建周上学时是清华京剧队主力干将之一，业余爱好相伴一生。大家最欣赏的是一位 87 岁美国老太太的至理名言：“我们不是因为年老而停止玩乐，而是因为停止玩乐才会变老。”

80 岁后的物 602 班同学都成为耄耋老人了。虽然岁月的沧桑使大家失去了年少时的稚嫩气息，但面容里还深藏着年轻时的模样，而且多了几分稳重、成熟和儒雅的气质。

80 岁一个不少，物 602 班同学做到了。祝愿他们 90 岁越多越好，100 岁还能把同学找。物 602 班，加油！（宗和）



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张彭春在清华学校（1923—1926）

○金富军（1994级物理）

1923年5月，曹云祥校长以张彭春“学问渊博，热心教育”邀请其任教务长，负责课程设计等工作。7月4日，张彭春到校视事。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在清华担任教务长两年有半。

在清华期间，张彭春积极推进师生交流、改进过渡期内课程方案、设计大学部培养方案、推动向全国公开留学生选拔等。张彭春反对照搬西方教育模式，强调要融会中西教育之长“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他的理念和实践对推动清华由学校向大学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也对以后清华大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梳理张彭春在清华事功之荦荦大者，谨以纪念他诞辰130周年。

促进师生交流

清华自建校起，教学严谨、考试频繁、淘汰率高。在繁重学业压力下，学生疲于奔命：

清华学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除放假外，均似在教习命令下讨生活。今天预备这范围，明天复习前面几节，这周有小考，下周有月考，一科如是，科科如是，而学生之几许时光，已被支配殆尽矣！一日出此堂，入彼堂，忙忙碌碌，疲于奔命。

另一方面，学生抱怨师生交流不足与不便：

清华师生交际现状，诚令人不满意。



1925—1926年，清华学校教务主任张彭春与同事合影，左起：朱敏章、余日宣、张彭春、何培元

除少数平常往来的教员和学生外，大部分都有下列几种现象：（甲）教员除在课堂里教书外，似乎与学生无关系。（乙）学生在课堂里对付教员外，平时怕见教员。（丙）师生俱荣会连合得太少。

1923年9月27日，张彭春在教员会议上表示：

本校现用学科制，好处固也不少，但是结果容易把教育看成分散的，不是统一的，所以教员和学生毫无联络。在教员方面，以为教完功课，就算责任已尽。在学生也以为读完功课，只要各学科分数及格，就称心满意。其实所谓真正的教育，岂止学科而已哉？本会议的目的：在使各科教员互相联络，某生英文程度如何？国文程度如何？算学程度如何？再调查各生对于作业之兴趣，然后定实地指导的方

□ 人物剪影

法。每星期聚会三四次，想成绩必有可观也。

1923年秋季学期开始，张彭春排定教员分组会议下分国文等七个组。每个组定期开会，且开会前先期通知张彭春。教员会议主要讨论教材、教学法、教学进度、设备、新书、新著作、报告、专家演讲等。这样分级会议的目的“在使同级教员有所联络；对于一学生能知其各科学业之状况，而使便于引导”。

张彭春加强师生交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借鉴美国大学通常设置的Open Office Hour制度，要求每位教师每周都要定出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见学生。张彭春的建议得到了教员的积极响应，48位教员每周安排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和学生见面。一般而言，教师每周安排两次见面，每次1小时。部分老师每周一次，但时间为2小时。也有部分教师延长见面时间，例如梅贻琦每周3小时；甚至有老师每周6小时。这一制度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今年诸位教员，每礼拜都有一定接见学生的时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了。”

这个制度让师生面对面交流，谈现实与理想、现状与未来、困惑与思考、个人与社会等多个话题，拉近了师生距离，增进了师生感情，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和教育了学生。

订立清华人才培养目标

建校初期，清华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方针。到1913年后，清华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这种表述，与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相适应。但从长远看，仅满足于

培养合格留美人才显然不够。1923年秋，曹云祥坦陈：“清华之弱点，则为缺乏久远之教育方针，以为设施标准。”

1923年11月1日，张彭春在教职员会议上宣读课程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第一次明确了清华人才培养的目标。张彭春解释：

我们所希望造成的领袖，乃是比寻常人能做多而且好的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要特别的有效率。然而他们并不是超人，也不是混来一个洋翰林的头衔并侈然自足的。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是模仿外国。以为能办到与外国高等教育同样的地步方算高等教育。但是中国人不是没有文化的民族。外国的高等教育，若不经一番改造，断不会在中国适用的。我们应当根本反对这种模仿的思想，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清华在今日教育界占有特别的地位。第一，清华不是完全的国立学校。制度上、办事上，很有自由伸缩之余地。第二，清华的经费比较别校略为丰富。所以这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当然非清华担任不可。

这就是我们要清华作一个试验学校的意义。我们去担任领路的试验的责任，必须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我们的方法不必与中国或外国已有的方法相同；二、我们的办法又不可与国内的情形相去太远。否则我们试验的结果别人不能采取，那就太不经济了。

对清华明确提出办学目标，大受学生欢迎。11月1日张彭春报告甫一结束，即有学生高度评价这给清华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学期自从张教务长任事以来，对于

本校学制、教育方针与计画诸点，均力求有具体的确定，所组织的课程委员会又能积极进行，……对于新课程的讨论，第一件竟能将教育方针确定为“造就领袖人才”，这是一件何等可贺的事情！从此清华学校犹如造了一个大指南针一样，无论教职员学生都知道向那一条道前进了！

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的时候，清华学生从五个方面高度评价张彭春的贡献，其中第二条即“建立新大学，完全以在中国造就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清华永久之基”。

1927年，邱椿回顾清华16年发展，高度评价称赞：“清华的教育政策，就慢慢地从模仿时期，而达到创造的时期了。这真是清华的再生！清华的政策，是要建设纯粹中国式的大学。清华教育目标，是要养成中国式的领袖人才。这是何等事业！这是何等精神！”

负责过渡期内课程改革

1923年7月，张彭春到校。暑期过后，9月，学校组织了“课程委员会”，由张彭春、梅贻琦等人组成，筹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体步骤与措施。既包括对即将成立的大学部的课程方案，也包括已有留美预备部过渡期课程方案。

清华在1925年成立大学部之前，实行八年的长学制。“学文科的，到美国可以插大三，或大四；学实科的，有时可以插大二，有时还要进大一。”虽然清华借鉴美国学制在总体上适应了学生求学的需要，但也因此陷入“清华学校，以学制言，不中不

外；以课程言，非牛非马”“大学不是大学，中学不是中学”“学生程度，能插美校何级，尚不能知”的窘境。

与学制相连的是课程程度问题。学生到美国插班时的程度与在清华课程水平直接相关。由于某些美国大学并不了解清华课程实际程度，High School的毕业文凭又不能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曾有美国大学教务人员发出“清华高等科程度能否与美国High School相敌，尚系问题”的疑问。清华学生联系插班时候，或者出示清华英文章程等反复恳切说明，或找在读中国学生协助解释说明。如果某校此前没有清华学生就读而又对清华学生程度有所疑问，那么第一个联系该校的学生就会遇到诸多障碍。对于不能插入高年级的学生，只能从低年级开始，重复学习在清华已经学过的内容，造成时间紧张。而对于不能出国同学，由于在校所受教育不是完全的大学教育，走向社会后，就业发生问题。学生对课程体系提出各种建议，例如提高算学



1923年，清华学校教师合影，前排左6为校长曹云祥，左7为教务长张彭春

□ 人物剪影

程度、减少英文课时等。

张彭春负责设计全新的大学部课程方案的同时，也统筹设计过渡期内留美预备部的课程设计。针对这些实际问题，结合大学部成立需要增聘教师，他采取的措施是增加教师人数，在与原有课程衔接同时，提高自然科学程度。

1924年9月，张彭春谈本年教务方面改革：“本年最重要之改革即中文部之刷新。校长特聘比较多通新学之教师，庶几足以引起学生之兴趣。”“社会科学方面亦已增聘教授。清华正逐渐改为大学，故诸教授均知前程远大，虽能潜心研究，无五日京兆之心，是亦清华之福也。”

有学生比较张彭春主持制定的1925—1926年度课程与1924—1925年度课程，“其内容与今年课程无甚差别；惟钟点减少，科学提前，与国学各科稍微变动耳。”“来年之课程表，……其内容与去年大致相同，然有二特点，为以往课程所不及者。”“自然科学之又提高也。以往清华自然科学之肤浅，为中外所共认。高一始习平面几何，高三始习初级物理、化学。此种课程，既非取法乎英美，更不合中国部定之程度。”“近来课程大加改革，最显者即科学程度之提高。去年高三习化学、物理、生物，今年则高二已习之矣。明年则更进一步，高一矣有高中化学、物理、生物三科。进步之速，一日千里，此诚可为现在低级同学所庆贺者。”

张彭春对留美预备部课程的调整，客观上有利于课程难度提高，有利于毕业后插入美国大学较高年级。统计留美预备部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年级信息，在课程改革以后，毕业生插入美国大学高年级的比例相对此前保持了较高比例。

负责设定大学部培养框架

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改办大学加速进行。具体程序是：“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与分组会议。其中，分组会议包括课程及计划组、教职员待遇组、招考新生组、派美游学官费组等四组。分组会议的决议，提交联席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学筹备顾问，并呈报学校董事会，最后呈报外交部，批准后实施。以上各项会议外，最重要的是联席会议正式开会。

在联席会议下设的四个专项组中，张彭春负责课程及计划组。可以说，这个组是改办大学一揽子方案中最核心的内容，讨论事项有：（一）教育方针宜造就何种人才，（二）应设科目，（三）大学课程，（四）校舍与设备。

1925年4月，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曹云祥、张彭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张彭春设计的大学部分为普通与专门两科。张彭春任留美预备部主任兼普通科主任，负责制定普通科课程方案。专门科具体课程则在专门科主任庄泽宣领导下制定。

张彭春留学美国，对美国高等教育有较深了解。但在教育理念上，他主张中西融合，不迷信美国“制度”，注意吸取中

国传统教育中有益的内容。在设计大学部培养方案时，他注意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学徒制/书院制。普通科重在基础，专门科重在精深之研究。

1925年9月7日上午，张彭春对大学部普通科全体新生谈了培养理念。

（一）分班办法

分班办法，不以从前在学校之资格为准。前二、三星期之课，系甄别性质。第一年内之课，系试读性质。

（二）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

（1）现今高等教育之弊，为迷信“制度”。为学分制及自由选科制所缚束。其害约有数端：①师生隔膜，完全失去教育之真义。②性质机械——甚至按学分收学费，等于买卖。③不知学问之统系及联络，只得其片段。④虽有所谓Major System，然而不能专精，亦不能养成学者之创造能力。

（2）吾人所认为教育者，即一师一生间互相发生影响之谓。故清华大学重在人才不在制度。

清华大学普通训练之期望：①令学生有广阔坚实的基本知识，能了解现代之中国及其环境。②逐渐养成学生自行研究之能力。③令学生注意职业之选择，为适当预备之计划。

清华大学之专门训练，则完全采取个人指导制，令学生各就所选之门类，为自动的、专精的研究。同时要能知该门类全部之大意。专门训练之终，将有一最后试验，以试其知识及研究之能力。

清华之环境，在国内各校中，比较地实为良善。吾人若不及此暇豫，互相淬厉，以期有所成就，是太辜负

此良机矣。

应该说，西方教育制度有它先进的地方，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依赖于教育提供的强大的人力资源，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不盲从、不迷信西方，并注意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有价值的部分并自觉传承，也是张彭春文化自觉的体现。

大学部培养方案，“普通科为大学之前二年或三年，以使生知中国之已往与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专门科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

“普通训练为期两年或三年；专门训练之期限视其门类之性质而定，亦约为两年或两年以上。”普通科不分系，教学上“重综合的观察”，即学习一些普通的基础课程，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发给修业证书与成绩单，“学生或入本校所设之各项专门训练，或转学他校，或出外就事，一听其便。”专门科基础与理论、研究与实践并重，分三类：1.文理类；2.应用社会科学类，如商业、新闻业、教育及法政等；3.应用自然科学类，如农业、工程等。学



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第一排从左往右依次为王文显、张歆海、徐志摩、张彭春，第二排为辜鸿铭与泰戈尔，第三排右为曹云祥校长

□ 人物剪影

生成绩合格后，发给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普通科学生如愿意继续升入本校专门科，需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

张彭春设计的这个分阶段培养计划，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但也存在不足，那就是普通科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国内一般大学不相衔接，学生反映普通科“不文不理”，年限又太长，学了没用又无兴趣。同时，普通科不能直升研究科，相当于大学期间还有一次淘汰，这与其他大学迥异。张彭春辞职后，清华取消了普通科，设立17个学系，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

虽然张彭春设计这种培养方案遭遇重大挫折，但重视通识教育仍有其价值。正如图书馆主任戴志骞评价：“张先生很忠实，有主见，有才能，其大学计画于事实上虽未必尽善，但颇合教育原理。”

张彭春设计的方案也为以后清华大学的培养方案设定开辟了先声。1931年梅贻琦任校长后，坚持“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理念，1933年秋季以后，大一新生不再分系，规定大一学生需经过数、理、化等课程的甄别考试，并在及格后，方准选习“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同时，到第二年选系时，学生又受到入系的特殊限制。这表明，有相当多的系对学生做了二次挑选。这样做保证了学生的业务质量，也使得部分系只有少量学生。可以说，国立清华大学的教学方案吸收了张彭春当初设计的方案的合理因素。

推动公开留学生选拔

伴随着清华学校改办大学不断推进，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留美预备部不

再招生，在校学生按照旧章毕业即可赴美留学，1929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留美预备部自然终结。那么，大学部成立后新招的学生是否也要依此办理？如果不依照留美预备部，那么一校之内出现两种不同学生类型，课程体系判然有别姑且不论，学生毕业后待遇更是天壤之别。如何在过渡期内妥善处理，避免可能出现的两类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学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对此问题，张彭春态度坚决、观点明确。他在1923年4月9日日记中写到：

（一）学校与派留美分清为两项事业；款项也应在预算内作两种算法。下五年内派留学欠款应由五年后留学项下出，不应干涉学校进行。

……

（三）派留学应公开考试，清华大学毕业生与他大学毕业生有同等报名投考的权利。现在在校生都应一律送美，从本年秋学生起，入学时写清志愿书时标的不出洋。

张彭春将改办大学、大学部招生及毕业与选派留学分开的观点，为解决清华改办大学及成立国学研究院，学生出现分化、留美预备部与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三部短期共存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稳妥可行的思路和政策。

第三条面向全国公开考选留学生而非清华学生专享留学资格，这是张彭春对社会意见的吸纳。美国退还庚款溢款独用于清华而非普济全国教育，清华毕业生自动享受公费留美，不免引起有关教育公平的争议。与张彭春同时考取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赴美的许先甲在1914年撰文指出：

“清华学生有应最后考试之资格；其他无论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者也。”1915年，胡明复提出：“第二次

出洋考试最为适当。凡有志出洋者皆应得预考，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考而及格，即与出洋，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许先甲、胡明复本身即为庚款留美学生，他们的批评极有代表性。显然，张彭春同情并支持这些批评。

张彭春的这个意见为校长曹云祥接受，遂成为学校的方针。

1925年，学校聘请颜惠庆、王正廷和范源廉为专科女生考试评定员。同时，学校也评定通过了两年后专科生考试办法以及四年后留美考试办法。张彭春在1925年7月25日日记中记载了办法的主要内容：

一、二年后，男、女生各五名，都须大学毕业并一年以上作事经验。

二、四年后，共送二、三十人，公开考试，本校毕业与他校毕业同，并二年以上作事经验。男女合考，女生至少占全数三分之一。

接着，张彭春写了他对留美考试办法的理解：

按政策，留美考试必须于大学之外。选择方法很待研究。将来在美应入何科何校，也不应如现在这样没系统。选择标准与全国高教育有莫大关系。派送种类也不应只限一样。各承认大学教授，任职在三年或五年以上，有相当研究成绩及教授经验，每年可选派五人至十人。他们在外年限至多不过二年，并且他们任职大学及所派个人都须负相当供给之责，如学校出一年的半薪，个人筹旅费，或用别的方法鼓励学校及个人出相当代价。

面向全国公开留美机会，体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也体现着将来学校性质的变化。1925年成立的大学部定位于“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

洋游学之预备”“俟旧制学生毕业后，留美学额之给与以公开考试定之。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均得投考”。这正是张彭春意见。揆诸1929年以后学校历史，虽有迁延，但这些政策还是得到了实施。

余 论

1926年2月，张彭春辞职离校。他在致校长曹云祥信中表示：“在清华两年有半之工作，有无价值，亦听诸当世明达之公判。不过始终彭未背其主张。故今日决然求去，似可告无罪于良知也。”

清华学生发起“挽张去恶”运动。学生在致董事会请愿信中高度评价：

张先生在清华之重大功绩：

关于校政者

一、主张学校与游学划分，实行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班，历年关于留洋之纠葛，一旦根本解决。

二、建立新大学，完全以在中国造就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清华永久之基。

三、主张留学学额之给予，完全公之于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以公开考试定之。此议一出，全国各大学学生，均有游美深造之机会，外间攻击清华、忌妒清华之言论渐消。

四、提倡气节，以坚卓特立，不流俗为学生表率。

五、其言论操行无形中影响学生之思想行为者实深且厚，试细察清华年来校风之变迁不难了悉，非敢溢美也。

以上五端，万目共睹。即反对张先生者，亦莫能否认。总之生等此次之挽留张先生纯系为清华大局设想，为正谊公道求伸。众志所趋，如危崖转石，苟达目的，不惜牺牲。掬诚上陈，俾候毅然。

□ 人物剪影

遗憾的是，虽有学生极力挽留，但张彭春坚决求去，离京回津。

学生对张彭春的感情是真挚的、持久的。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在接收清华之际，张彭春被学生校务改进委员会推荐为与戴季陶、邵力子、胡适、凌冰、周诒春、周鲠生等政界、学术界名人并列的校长人选。

长期以来，张彭春在清华校史上隐而不显，正契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文中所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哲人其萎，思想永存。时移世易，张彭春关于中西教育的思考对今天仍不无价值。他对清华由学校向大学过渡作出的重要贡献，理应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肯定。

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

○袁 帆（1975级建工）



左起：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坚持14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中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大批民族英雄，而另有三位清华人也留下了光荣的名字，他们是：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

一、他们因何没能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

早期的清华学校虽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中共清华党支部早在1926年11月就开始建立。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分别于1926、1930、1928年考入清华，并先后成为清华早期共产党员群体之一员。

回望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成立还不到

十年的共产党，在经历了被国民党右派几近斩尽杀绝的至暗时刻，力量极其微弱，幸存的党员全部隐匿身份，转入地下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既要完成大学的学业，又要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地进行革命工作，清华的共产党员所要承受的风险可想而知。这也成为他们都没有拿到清华毕业证书的主要原因。

1. 1930年算学系唯一的肄业生“老冯”

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是1927年5月1日入党，在1928年1月担任了第六任清华党支部书记，还曾担任过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

非常难得的是，在1930年10月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纪念册》中，印有一张冯仲云的毕业照，还有同学对他的评价，一位署名“丞”的同学这样写道：

“革命和恋爱”，这是时下一班青年的口号，我们的老冯从前也曾躲在房里偷偷地狂吻着“他的她”的来信和照相过。可是他现在却时常在喊着“恋爱这玩意儿，咱是不干了”。他虽不谈恋爱，可爱



冯仲云毕业照（1930年4月）

讲女人，和他熟悉的人，总知道他是三句不离女人的吧。他不长口才，可很会描写，经过他口里渲染出来的事物，灰色会变黑色，红色会变为绯色。他是直爽而诚恳，他的脑筋确乎很敏锐，可是他还吹“老冯若使不……，也许脑筋还会好呢！”真是不晓得，老冯若使不……，他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乍一看，在别人眼里，被称作“老冯”的冯仲云怎么也不会让人感觉他是“道貌岸然”的君子，更不会将他与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同学们吃不准他是“怎样一个人”。

其实，这样的评价恰恰可以看作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们一方面可以认为这是“老冯”在日常生活中用“大智若愚”的形象掩护自己的秘密身份，而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把革命者想象成不屑“饮食男女”的天生圣人。

但是，“老冯”终究是“党的人”，他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要发展党的组织，要做民众工作，在接到党的行动指令时，他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就在“老冯”已经拍完毕业照还没有

完成毕业所需的论文或考试时，他参加了1930年4月20日（周日）北平工人和学生共同参加的示威游行。这次活动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被捕群众有180余人，“老冯”也在其中。

就这样，因为没有完成毕业程序，“老冯”的名字最终没能出现在1930届毕业生名单上。所幸的是，他在被关了五个月监牢后，竟然于1930年9月“逃离”魔爪。

出狱后的冯仲云却得到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哈尔滨商船学校需要一位数学老师，算学系的郑之蕃教授（1887—1963）就推荐了他。冯仲云于1930年10月来到哈尔滨，就这样开始了他在东北二十余年的革命斗争生涯。

2. 只读了一年半政治系的张甲洲

张甲洲（1907—1937，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2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0年上半年在北大入党。在此期间，他也曾经被捕，并在狱中与清华党员冯仲云相识。或许是与冯仲云的交往引发了对清华的仰慕，张甲洲宁愿放弃在北大物理系已有的学籍，也要考到清华来。

1930年秋，当他被清华政治系录取时



1930年清华算学会合影，后排右2为冯仲云

□ 人物剪影

已经23岁，凭借其社会组织与活动能力，他一入学就脱颖而出，自带很高人气。与他同年入学的陶瀛孙（1909—2003）就是由张甲洲介绍入党，并成为清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回忆道：“我们常能见到他——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诚恳的东北籍同学，活跃在清华园中。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在学校里对张甲洲是非常钦佩的。”

张甲洲在清华学生组织的平台上表现活跃。他曾担任过“第六级主席”和清华学生会中的“级代表”，学生会卫生科主任、民众教育科主任，同时还担任过《清华周刊》的编辑，负责《言论》专栏的组稿和撰稿工作。

在清华1931年出版的建校20周年《纪念刊》中，留有一张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当时的大一学生张甲洲在9名委员中赫然而立，充满自信。此外，在1931年5月清华师生与校长吴南轩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中，学生会紧急组织了护校委员会，张甲洲的名字也在15位委员之中。

也是1930年入学的胡乔木（胡鼎新，



1931年清华大学学生会执委会合影，后排右2为张甲洲

1912—1992），虽然只在清华读了一年多时间，但当时还没入党的他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骨干。张甲洲与胡乔木在党、团工作的交集中多有联系。以至于晚年胡乔木在1983年1月18日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信中还特别强调，张“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

然而就在张甲洲上二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师生立即表明坚决抗日的立场。“学生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并通电政府主战。21日，教职员公会成立对日委员会。27日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停课三星期，施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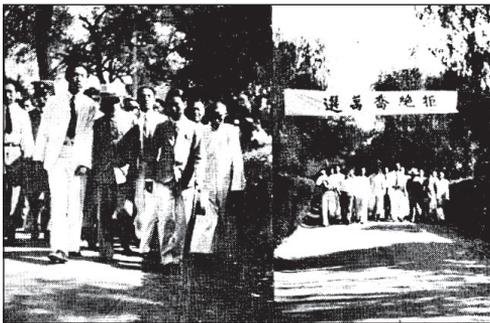
1932年春天，张甲洲联合几位在北平不同学校读书的东北籍大学生，毅然投笔从戎，秘密回到黑龙江省巴彦县老家，开始了与侵略者真刀真枪的殊死搏斗。这就是张甲洲曾经在北大、清华两所著名高校肄业，但又都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的真实背景。

3. 还差三个月就能毕业的于天放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成为国立清华大学。在这一年的招生中，有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学生于九公被录取到经济系，他就是后来成为清华三杰之一的于天放。

于天放（1908—1967，黑龙江呼兰人），他20岁进清华，那时正好处在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时期：内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外部日寇觊觎，侵略不断。对于之前在齐齐哈尔读书时就领导过当地中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并遭受过军警逮捕的于天放而言，在新的环境中同样不会甘于平庸。

在1928年至1931年的短短几年间，清



清华学生拒绝乔万选当校长（1930年）

华曾经围绕“校长人选”问题出现过激烈的斗争，于天放这一届学生就完整地经历了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三位校长频繁更迭，还有叶企孙、冯友兰、翁文灏三位教授间歇代理校务这样的奇观，直到1931年12月最终迎来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于天放当时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在驱逐吴南轩的风潮中表现积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在1931年5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而他的介绍人正是比他低两级的黑龙江同乡张甲洲。

就在于天放加入共产党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积极参加清华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赴南京请愿活动，并担任请愿团第三中队队长。请愿团冲破各种阻挠，于11月26日到达南京，发表《请愿宣言》，并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

通过此次情愿，于天放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敷衍态度，也彻底抛弃对政府出兵的幻想。经过短期准备，于天放与张甲洲一起，于1932年4月逆风而行，秘密潜回被日寇霸占的东北家乡，从此开始长达十数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斗。而此时距离他可以拿到清华毕业文凭仅有不到

三个月时间，其坚定的抗日信念完全可用“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来形容。

二、最早走上东北抗日前线的清华三杰

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在相隔一年半的时间里相继离开“象牙塔”，成为最早走上东北抗日前线的清华三杰，而当时他们的年龄都没有超过2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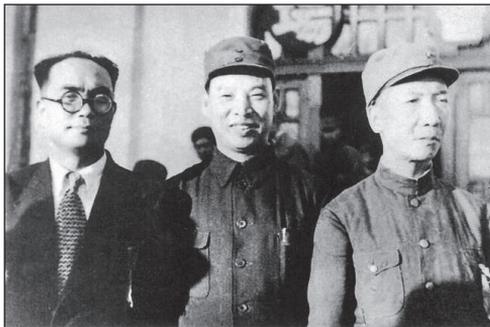
面对无比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和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其实他们既没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又没有稳妥的组织保障，更没有可靠的物质后援，一切都要赤手空拳，从零开始。即便是这样，三位同样在清华园接受过高等教育、又是胸怀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仍旧像三颗特殊的火种，坚定不移地投向苦难深重的东北大地，誓死也要燃烧起照亮历史的火焰。

1. 冯仲云的白山黑水岁月

冯仲云1930年10月到达东北哈尔滨，应聘哈尔滨商船学校的教职。哈尔滨商船学校创办于1926年，是隶属于奉系军阀的半军事化学校。有关冯仲云的这段经历，在1931年12月版《清华周刊（副刊）》的毕业同学消息中有一段记载：

冯仲云——他是清华被称为“绝”者之一，你不要说他“绝”，他在哈尔滨的商船学校教高级几何，是被称为第一流人物的。他住在一所临江小房子，夏天他那位“腊味儿”也从北平赶去了，老冯每每得意地说，我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家，免除一切结婚费用，也得着小家庭的温存了。

这段文字引申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冯仲云凭借在清华学到的数学分析与解题能力，成为让学生信服的“第一流人物”。在哈尔滨党组织与冯仲云接续组织关系之



冯仲云、彭真、周保中在东北（1946年）

后，他就开始了以商船学校教授为掩护身份的地下革命活动。

1931年春夏交替之际，他那位在北平读书的“腊味儿”（未婚妻）薛雯来到哈尔滨与他成婚，婚后不久她也秘密入党，从此夫妇两人并肩为党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遇到了重大考验：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在这种形势下，临危受命的冯仲云在新组成的省委中相继担任了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省委秘书长，坚决地投入组织东北人民抗日的斗争中去。

在一段时间内，满洲省委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失去联系，失去经费来源。当时的冯仲云在商船学校教书每月有260元的收入，于是他每月拿出180元作为党费。由于剩下的工资也常常被用于党组织工作的各种支出，以至于在严冬中无钱买柴火取暖，让第一次在东北过冬并已经怀孕的妻子“冻得蜷缩成一团”。

从1932年开始，冯仲云担任处于领导中枢位置的省委秘书长一职，全面参与、协调党的各项工作。1934年10月，冯仲云被派去参加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哈

东抗日游击支队，并在游击队被改编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他正式成为“抗联第三路军”政委时只不过32岁，但已从一个稚嫩青年学子成长为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者。1942年后他又奉命去苏联境内参加了“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整训领导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冯仲云作为接收沈阳的抗联代表随苏军最先回到东北，在配合中共东北局领导的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4月起，冯仲云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在曾经领导东北人民14年抗日斗争的诸多抗联领袖中间，冯仲云是少数几位全程亲历的幸存者之一。

2. 张甲洲与于天放的并肩战斗

张甲洲和于天放于1932年4月告别清华园，秘密回到黑龙江老家，迅速投入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各种抗日力量纷纷抗击日本侵略军，其中，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



1932年巴彦游击队领导人合影，后排中间为张甲洲，前排右1为于天放

日力量就包括有张甲洲领导创建的“巴彦抗日游击队”。

1932年5月16日，张甲洲首先利用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关系，联系到各方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200余人。他们正式组建了游击队，勇敢地向侵略者宣战。而在此过程中，于天放就是张甲洲的得力助手，担任游击队特派员及交通情报站负责人。

1932年8月30日，游击队攻下了巴彦县城，随后又连下几城，给哈尔滨以北地区的日寇和伪政权造成巨大威胁。1932年11月，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委。这一光荣史实已被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巴彦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势头引来日本侵略军的强力镇压，没有根据地的张甲洲部虽然一度发展到2000多人，但在日伪军的围剿下，最后队伍只余下70多人，被迫于1933年初解体。

彼时的张甲洲化名为“张进思”，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学识进入富锦县立初级中学（富锦中学），从教员开始逐步升为教务长、校长。他巧妙利用这一身份建立了抗日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并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三江地区的地下工作领导人。

而在1933年3月，于天放先是被派遣到齐齐哈尔，组建满洲省委“龙江特别支部”并任书记，后来因为恶化的形势使得他必须转移。此时，他正式改名“于天放”，由张甲洲介绍其在富锦中学担任英文教员，以后又担任教务长。在张甲洲被日本人调任富锦县公署教育股长后，于天放又接任富锦中学校长。

也就是说，张、于二人在长达近四年

时间里，共同潜伏富锦，并肩进行地下抗日斗争。他们凭借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为松花江下游各抗联部队提供军事情报及物资援助，著名的“抗联”七星砬子兵工厂的部分设备与材料，就是他们设法输送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于二人奉命转入东北抗联独立师。然而在8月18日，张甲洲不幸遭遇敌人的阻击，中弹牺牲。当时他刚满31周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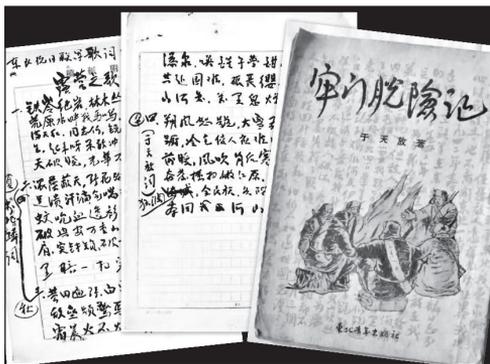
3. 冯仲云与于天放的战斗友谊

1928年秋天，冯仲云已升入国立清华大学三年级，而于天放刚入学。冯仲云曾回忆说：“虽然学的科目不同，可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平时沉默寡语，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热烈的，是一个有理智的青年。”“他确信共产主义，认识共产主义是中国将来应达到的最终目标。”

于天放在张甲洲牺牲后，进入抗联十一军负责部队政治工作。经过他的卓越努力，这支部队逐步成为抗联的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

1940年“抗联第三路军”编成后，于天放担任第六支队政委，而冯仲云此时成为于天放的直接上级，他们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他们率领的游击部队“在富锦、绥滨沼泽地带和完达山系的七星砬子山越地带，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战斗”。

1941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抗联各部队残存的力量奉命进入苏联境内整训。而于天放带领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分队却孤悬敌后，继续同日伪军进行殊死战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天放始终没有放弃抗日的信念，用尽各种方式同敌人缠斗，直至1944年12月19日被叛徒出卖被捕。



于天放撰写的《露营之歌》和《牢门脱险记》

无论日寇采用威逼或是利诱等各种手段，于天放都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坚决不投降，敌人只能决定对他执行死刑。就在最后的危急时刻，于天放在难友的配合下，利用一次转瞬即逝的机会，击毙日本看守，幸运地逃出了囚笼。惊心动魄的那一刻，发生在1945年7月12日凌晨。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于天放风餐露宿，昼潜夜行，躲过日伪军的重重搜捕，以惊人的毅力从北安跋涉300余公里，到达讷河县境内。在这里他听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讯，立即组织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迎接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为老同学、老战友的英勇事迹感到由衷骄傲，他在1946年专门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者之一于天放》一文中这样写道：

是的，于天放在（松）江省的确是极有名望的、无人不知的民族英雄。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是由于“八一五”事变不久前，他从北安狱中脱逃，日寇在（松）江省各地通缉他，悬赏几十万元要他的头颅，还因为他是（松）江省出色的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民族英雄。

三、他们为清华精神增添了一抹血色

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曾经有成百上千的清华人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走上战场。而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这三名共产党员作为东北抗日战争中的清华学子，更以他们独特的表现显示出无比可贵的气质，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增添了一抹血色。

必须强调的是，革命者不是苦行僧，也有七情六欲。但具有坚定信念的勇士与常人不一样的是，在需要舍生取义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儿女情长“断舍离”。

张甲洲在即将前往抗日前线的前夜，对他的夫人刘向书说：“有可能此去凶多吉少，确实听到我牺牲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的灾难。”令人悲痛的是，就在说过这些话后的第二天，他就真的“求仁得仁”，血洒黑土地……

无独有偶，1934年冯仲云在走上战场前，也将妻女送回江苏老家。临别时他对妻子说：“如果为革命牺牲性命，那这次就是我们的永别；……等革命胜利后再见面，这段时间可能要十年十五年了。”而当他们再得以相见时，真的是在经过九死一生的十二年后……

于天放的家就在呼兰县的某处乡村，他虽然在故乡游击了七年多，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见过一次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

清华三杰在不同时点的言行，表现出同样的“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无论何时读来，都会让人对真正共产党人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拳拳初心而心生感动。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清华三杰也都表现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超凡脱俗的飞扬文采。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幕出现于1938年，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于天放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豪情，挥笔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冬征》：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
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后来，著名的东北抗联《露营之歌》将这首诗歌录为“春夏秋冬”之第四段，铸就成为东北抗联文化遗产中的不朽篇章。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抗日英雄的历史功勋。2014年9月1日，在国家民政部正式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师长张甲洲”名列其中。同时，张甲洲的名字也分别被镌刻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英烈碑上。此外，冯仲云和于天放的名字也同时被记载在百年清华名人录上。

其实，还有一项值得彰显于世的殊荣，那就是冯仲云在1955年9月曾经获得毛泽东主席亲自颁授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而冯仲云是当时仅有的四位没有被授予军衔，但被授予至高荣誉的“无衔”开国元勋之一。

这两枚勋章，意义非比寻常。正如冯仲云自己所评价的那样：“这两枚勋章不只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这是凝结了满洲地下党、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中千万英烈的鲜血，也是他们的荣誉。”

与此同时，冯仲云也成为清华历史上曾被同时授予“八一勋章”和“独立自由勋章”的唯一英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完全可以看作是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牺牲”的清华英烈们共同的荣誉，是对清华精神的一种特殊褒扬。

四、结语

1932年的那个春天，张甲洲、于天放同时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和先行一步的冯仲云一起，用青春的热血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辉历史，成为东北抗联中永垂不朽的“清华三杰”。

可以说，不论以哪个时代的标准衡量，冯、张、于三人都是兼有远大理想和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今天，当我们追寻着他们从清华园延伸到抗日战场的足迹时，清华三杰视死如归的形象愈发清晰。

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前途的权衡中，他们都选择了需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艰难道路。这种勇气和担当给予后人的警醒作用和榜样力量，无论何时都将振聋发聩，催人奋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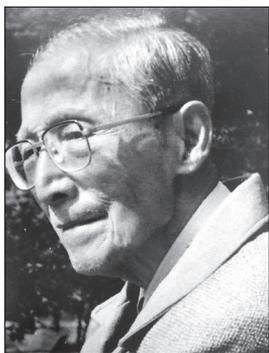
清华百余年的历史已经不断证明：博大精深的清华精神滋养、培育了一代代清华有志、有为的才俊，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自觉地将个人命运和祖国、人民紧紧相系，最终成为一批批时代楷模、民族英雄。

此时我只想道：踏着前辈足迹而来的清华人，请记住自己所负的时代使命，赓续传统、砥砺前行！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们将永远伴随我们！

2022年5月11日，撰于上海抗击疫情中

姜书阁：宦海沉浮不改书生意气， 柳暗花明续写传奇人生

○ 郑文会（1959届土木）



姜书阁先生

姜书阁，字文渊，满族，正黄旗，辽宁省凤城县朝阳岗人，1907年11月14日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四岁入私塾学习，熟读四书五经；五岁能诗，聪敏好学，常常为家中亲友、老师奖许，视作神童。192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唐山大学工科。一年后，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工科，于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30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校期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旁听了清华大学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几位名师的中国文史课程，颇有收获，这为他日后在中国古典文学、史学方面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27年，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写了《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一文，获清华丙寅论文奖金第一名，并有单行本出版。另一本学术著作《桐

城文派评述》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又编入《万有文库》，此书流传甚广。在校学习时，他还发表了许多译著，其中《美国黑人诗歌选译》发表于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以长天纾翻为笔名翻译的《雪莱小诗选译》发表于《清华周刊》，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对他颇为赞赏。此时的他正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然，也少不了诗作。他此时写的《清华园夏日》就抒发了这种心情：“曲槛迴廊夏日长，清风时送芰荷香。柳阴草软人闲坐，一派钟声下夕阳。”诗中提及清华园内多处美景，使人想起工字厅、荷花池，还有悠扬的钟声。

1930年初秋，正面临毕业即将离开清华园。我们又看到他另外一首诗《清华园初秋去留未定》，诗中写道：“久惯飘零客亦家，新来思绪乱如麻。风摇荷叶垂清露，雨洒杨枝起暮鸦。草际秋虫初作响，溪边古木久不花。露水濡发归来晚，倦鸟投林日向斜。”显示出他当时的心情处于矛盾与犹豫之中，正如题目中所言，去留未定，决心难下。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他这样下不了决心，现在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毕业离开了清华园，从此走向了社会。从1930年到1937年，他先后在哈尔滨教育厅、察哈尔教育厅和北平社会局任职。期间，在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同

一年还主编了《黑白半月刊》。1933年至1935年,《东北月刊》和《行健月刊》还连载了他的《世界治外法权史》之中的六章(余稿在抗战中散失)。1936年,又任《北京晨报》主笔。

“七七”全面抗战以后,他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南下参加抗战。1937年9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四部轻工业组上校组员,193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1940年调财政部任秘书,在国民政府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宦海生涯。历任国民政府税务署长、国税署长,在抗战时期主掌全国税收大权。有人说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财政掌握在他手上。至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之前,他已经官至财政部政务次长。而此时的他,一方面官职日高,而心情却充满了矛盾,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场腐败,官员的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他又以旧时治学的严谨、勤奋态度,竭力挽救当时濒于崩溃的政府财政,心中极为矛盾和抑郁。他一贯以书生自诩,保持廉洁自律、清高的为官之道,被称为国民政府中少有的“清官”。在离职卸任时依旧是两袖清风,一文不名。据说当时上海有一家专门揭露权贵的《铁报》,曾在头版刊登一篇《廉吏外传》,指名道姓披露他清苦的生活,并预言他“将以穷教授终其身”。这篇文章在当时上海财税界曾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6月,他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坚决辞去财政部次长的职务。不顾国民党“中统”“军统”的威逼利诱、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多次登门劝说,坚持拒绝离开大陆,不去台湾。同年8月,他悄悄乘飞机从广州飞抵重庆,逃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并在重庆迎了解放。

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参事,主持创办了西南税务学校和西南财政干部学校,并任副校长。期间赴贵州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担任西南第三期土改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1954年调至西南机关干部学校学习。

1958年,他已年过半百,犹以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响应党的支边号召,放弃大城市舒适的生活,变卖了所有家具,拎着几个皮箱携妻带女,自愿报名加入了大西北建设者的行列,来到青海师范学院任教,一干就是21年。在青海师范学院,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克服当时图书资料缺乏和学术信息闭塞以及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等各种困难,身居陋室潜心治学,完成了教书育人的任务之外,还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70余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由个人撰写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因为当时纸张困难,只作为青海高校教材印了300套。1964年又



1960年在青海西宁,姜书阁老师(前排左3)和他的学生们

□ 人物剪影

完成了力作《陈亮龙川词笺注》。虽然由于当时出版界的某些偏见未能及时出版，但他仍不灰心，将书稿藏于篋中，又投入到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之中。

后来，他又经历了十年“文革”。抄家，挨斗，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下国民党”的帽子，住“牛棚”，蹲小黑屋，在农场被监督劳动，成了家常便饭。1974年，虽然获得了平反，但却因不愿以“评法批儒”代替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而被迫退休。此时他已经是67岁的高龄老者，退休即意味着将永远脱离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和对古典文学、史籍的研究工作。他心有不甘，但又万分无奈，处于深深的痛苦和彷徨之中。此时他写了不少诗抒发这种复杂的感情，如《退休》《退休伊始，心烦意乱，不知所从，怅然而作》《彷徨》《孤寂》《自慰》《自伤》《惘惘》《无归二首》，等等。这里只摘引在《自伤》中的诗句，便可知他当时的心情：“空有千秋志，皇皇越与胡。年华垂欲尽，风雨一灯孤！”

1976年10月，平地一声春雷，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写了不少诗抒发自己兴奋的心情。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一时之间，广西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都找到了他。最后还是湘潭大学最快办理了他全家的调动手续，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湖南毛主席的故乡。此时，他的心情极为亢奋，写下了《别青海南下湘江》，他在诗中写道：“廿载青唐路，凄其重苦思。徐寒冰待解，古塞日升迟。候鸟归孤岛，春花发旧枝。天开云雾敛，展翼去从兹。”从中可以看到他兴奋的心情。

1979年他72岁，已到古稀之年，本以为会在青海一事无成终老天年，没有料到还能重新从事他所钟爱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研究工作，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如同千里马遇见了伯乐而欣喜若狂。湘潭大学的领导具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胆识、爱才的赤诚、容才的雅量，使他备感兴奋，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从此，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他重获第二春。在湘潭大学他又生活了21年，重新谱写了人生的辉煌。

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亮龙川词笺注》这部沉沦了17年的著作，一经问世，即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82年6月，他的《诗学广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他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旧作《中国文学史40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近作《先秦辞赋原论》。青海人民出版社热情索稿，1984年2月，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两卷集）在该社出版，作为曾在青海生活工作21年的他，留给青海学子及文学青年一份纪念。他的《文心雕龙译旨》于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40万字的《骈文史论》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0万字的《汉赋通义》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40万字的《说曲》于1990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时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90年代后期，他以时不我待的心情集中精力完成了两本论文集：《百一集》和《百一集续编》，共收入202篇学术论文，这两本巨著也终于在他去世后得以出版。

经过长达33年的艰苦思想改造和考

验，他终于在1982年75岁高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此时，他心情十分兴奋，百感交集，也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春从天上来》注了一行小字：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夜作述怀，今日晚九时，党基层小组讨论通过余之入党申请。”他在诗中写道：“纵朝闻夕死，一笑笑去、一任平章！不曾量，拼卅年磨杵，颖脱青囊。”在另一首《宣誓入党赋诗自勉二首》中这样说道：“……三十三年犹故我，脱胎换骨抑何难！扶床学步今方始，历块长驱道路宽。”抒发了他以入党为始不断自我革命的决心。

从此以后，他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八九十年代又担任了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顾问等职务。1988年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获湖南省高等学校“六五期间科研成果一等奖”。1991年《骈文史论》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该书又获全国高校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2000年12月，他在湘潭大学去世，给自己93年的传奇人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去世后，湘潭大学并没有忘记这位以终老之年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辛苦耕耘并收获满满的老教授，他的作品陆续出版。2017年湘潭大学推出了电视专题片《道路》，高度评价介绍了姜书阁老先生传奇的一生，同时又举办了介绍他一生事迹的专题展览。湘潭大学在大力宣传建校初期引进的六位大师中他名列首位，文学院提出的“中文四老”中同样把他排在首位。《湖南日报》也曾发文纪念这位为湖南省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

综观先生一生，堪称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他以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名高官历经解放后33年的艰苦磨练、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他自己所说：“……最后始来湖湘，于今又十五年矣。在此四十五年中，所历事变皆亘古所未有，踉跄追随，步履维艰。虽几经蹉跎，而终能革面洗心，不负此生，亦差足自慰已。”（《姜书阁自序》，1994年5月21日）

另一方面，在同一篇自序中，姜老先生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余少好文学，然在清华则专攻政治。”但是他在50岁时却转行作了文学学院的教授，从此用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成果斐然，这其中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勤奋与努力，但清华那四载寒窗苦读的岁月，与他日后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的突出成就恐怕不无关系。事实上他虽然早在1930年即离开了清华园，但在此后几十年间始终未忘记自己的母校。就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他还写下一首《春日客渝州感怀》，诗中开始就说：“帝里清华久不忘，连宵有梦下瞿塘。”可见清华园永远是他魂牵萦绕的地方。不久前看到一篇介绍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提到所谓“清华文脉”的问题，本人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在想，如果有的话，像姜先生这样的研究成就，可否列为清华文脉之一支呢？这只有留待专家们考证研究了。写到这里就用一首小诗作为结尾吧。

梦里清华忆恩师，
一尘不染出泥池。
脱胎换骨终闻道，
花开南国又一枝。



我的清华六年

○吴宗济（1934届中文）口述



吴宗济毕业照

2022年6月，由吴宗济先生生前口述，崔枢华记录、撰文，鲁国尧策划、作序的《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借此书出版之机，本刊特摘编吴宗济先生在清华六年学习生活的回忆，以志纪念。

吴宗济（1909—2010），国际著名语言学家，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1909年出生于山东济宁，1934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1935年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漫漫“寻音”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以古稀之年全身心从事语音学研究，其成果为中国实现“人机对话”，为科大讯飞的诞生提供了语音学乃至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考清华

我1909年出生在清末一个官僚家庭，幼时就读于家中私塾，少时曾在新式学校上海南洋中学读过两年书。1924年15岁时，我回到北京，进了建在平则门（今阜

成门）外的成达学校读二年级。我的一位远房叔公吴鼎昌曾任校长，他给学生训过一次话，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他说，如果谁三年考试都得全班第一，学校将资助他留洋深造。

我在成达学校读书时非常努力，常常半夜两三点钟就起来背书，不但古文、外语要背，连地理、历史的很多内容也能背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连续两年我都考了全班第一。可能是太用功了吧，刚上四年级，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在家养病。后来病大体痊愈后，我在成达又读了差不多一年。毕业了，成绩也出来了，虽然未能保持全班第一，但也很不错。我找到吴鼎昌校长，问他能不能送我去留学，被拒绝了，说你最后一年成绩不合要求。留洋的梦想破灭了，怎么办？成达四年毕业，程度相当于普通中学的高中一年级。高不成，低不就，今后的路怎样走？想来想去，对于我来说，路只有一条，即想方设法考大学。一来为自己的前途，二来也是要争口气。

高中一年级的程度，没有条件考大学或专科学校。虽然如此，年轻人对未来还是充满美好憧憬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满怀信心。当时向往的学校，是毕业后就业容易、收入稳定的学校。符合理想的学校有三所：一是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一般可以到海关做事，收入较高；另一个是一位法国神甫办的教会学校；还有就是清华。那时的清华，是出了名的难考。考上这

三所大学中的一所，就是我当时努力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自己具备报考大学的条件。当时的办法是先找一所大学，读它的预科。这样我来到了天津，在南开大学读预科。按规定，两年结业，相当于高中毕业，就具有了报考大学的资格。

在读南开预科期间，我还解决了终身大事，娶了小时候父母给订的娃娃亲——近代著名唯识学家梅光羲的女儿梅静明。婚后不久，听到一个消息：由于战争等原因，一些年轻人虽未能正式获得高中毕业的资格，但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不少学校允许这样的青年人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大学。我当时实际上只有相当于高中二年级的程度，但听了这个消息，也非常振奋，决定拼一拼，试一试。

我报名考税专，那所学校对外语要求太高，没有录取；法国神甫办的教会学校虽然报了名，但临时放弃了，没去考；只剩下最难考的清华，也只有全力以赴，准备应考了。我从街上买来清华历年的考题和配套的参考答案，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现在想想，当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新娘子把我关在屋里用功，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她张罗。就这样，我在求志巷自己的新房里苦读了一个多月。因为确实下了功夫，再加上机缘巧合，居然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

记得时事考的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刚好考前几天我在街上买了把折扇，上面印的就是这个内容。考试的时候虽然检查很严格，但扇子还是允许带的，本来这些内容这几天就经常看，又有扇子带在身边，因此这一门考了满分。无独有偶，国文考试，我用自己感觉有把握的

文言作答，结果刚好碰上阅卷的老师是杨树达先生，杨先生偏爱古文，也给了我满分。那年我的英文考了六七十分，数学平面几何我的基础比较好，解析几何的题碰巧跟历年考题里的一道题相近，也勉强做出来了，分数虽然不大好，但我有国文和时事两个满分垫底，所以还是光荣地被清华录取了。

记得我们那一届（1928年入学）一共录取了90名（实际137名，编者注）同学，我考第19名。

清华学校在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同年设立了国学研究院，直到1928年才正式称作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这一年，我进了清华大学。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届考上清华以后，清华大学才成了既有其实又有其名的大学。

读清华

清华当时是四年制的学校，可我从1928年考入清华，到1934年才毕业，前前后后用了六年时间。一般人在大学只读一个系、一个专业，我却是先学市政工程，后改化学，最后从中文系毕业。其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因病休假，又做了些与电影有关的事情。其中有很多曲折，很多往事，常常引起我的回忆。

我读清华期间，因为有庚子赔款的支持，清华比其他大学有钱，学校设备好，教职员工的待遇高，所以国民党几个派系的人抢着到清华当校长。有一段时间，校长换得非常频繁，就像走马灯一样。当时学校教授们有个组织，叫“教授评议会”，权力很大，哪位校长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就待不长。例如吴南轩在清华做校长时，因为任用其亲信担任教务长、秘书

□ 回忆录

长等事，只干了一个多月，就遭遇了“驱吴”风潮，被教授和学生赶走了。又如罗家伦先生，他从1928年起就担任清华校长，在任期间大刀阔斧，有很多大胆的改革，对清华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最后也是被赶走的。那段时间，清华出现了“校长常换、教授不动”的特殊状况。直到梅贻琦先生当校长之后，才稳定下来。

我考入清华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好像只有五六位，但毕竟开了先河，以后慢慢就多起来了。说起这种情况，当时有一件事，后来常常引起我的回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我刚上清华不久，有一次我夫人到学校来找我，不巧，在校园里碰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有同学问我，她是谁？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已经结了婚，仓促之间说是我表妹。本来以为这样就搪塞过去了，不想一位老兄居然看上了她，想要跟她交朋友，求我为他介绍。这虽然是一段笑话，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清华校园里，年轻的女性是不常见到的。

刚入清华时，我读的是市政工程系，系主任是施嘉炆先生。我们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的市政建设，设计下水道等地下管线。学习使用的平板仪之类的仪器是一种既能测定地面点的平面位置，同时又能测定点间高差的仪器；有时还要下车间，第一学期学木工，第二学期学金工。

但是我在这个系只读了一年，就出了问题：清华的市政工程系不办了。学生怎么办？学校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学习市政工程专业，但需要转学到交通大学，当时称作“铁道部交通大学”，本部在上海；一个是留在清华，但要转系。因父亲不愿我离开北京，我只好留在清

华，而改读化学系。

化学系的系主任是张子高先生。张先生是庚款留美的学生，学成之后回到国内。张先生是湖北人，讲课时开口总喜欢说：“这个时候的时候。”拿这句话当开场白，惹得同学们也在背后学他说话。记得有一次做实验，在煤气灯上烤试管，一位男同学操作不当，试管的塞子喷出来，从对面一位女同学耳边擦过。张先生见状说：“这个时候的时候，你怎么把个小姑娘这样搞？万一伤到了，让她以后怎么嫁人哟！”跟张先生相对的是数学系的罗邦杰先生，罗先生常常是一个人在黑板上哗哗地写公式，写完之后解释，每说完一句话总要不由自主地说：“这个……公式，奇，奇，奇！”他们二位，一位开场白有特点，一位结束语有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化学系读了整整一年，刚觉得学出点滋味，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30年夏天，我又一次生了肺病。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请求休学。按照当时清华的规定，学生就读期间，允许请假两年，假满之前，如愿意回来读书，可以请求复学，可以接着读原来的专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转读别的系。这样我就向学校请了两年假。

病休期间初涉电影

1930年夏天，我因为肺病休学在家。经过一段休养后，身体渐有起色。利用病休这段时间，我尝试着做了些与早期电影有关的事情。当时，中国的电影事业才刚刚起步。那时北京有个很有名的真光电影院，专放外国片子，原片上没有声音，另外有一套磁带跟着放音，不对口型。这就

是所谓的配音电影。

那时我认识一位先生，名叫朱石麟。他是搞电影的，也做编剧和翻译。真光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剧情介绍有不少都是他翻译的。他编了个剧本，叫《故都春梦》，在真光电影院演的，结果一炮打响，一时好评如潮。这部影片奠定了他在影业界的地位。我从小喜欢照相，对电影也有兴趣，因此当朱石麟找到我、劝我也搞电影时，我立刻同意，还说服了父亲拿出5000块钱以我的名义投资，让我以创办人之一的资格进了当时刚成立的大公司“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

加入联华之后，联华派我先到黎民伟的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实习与电影制作有关的事情。我到上海后，就在那里跟着他们学做电影摄影、灯光、剪接之类的事情。民新有颇具规模的车间，设备也很不错。我就此正式涉足影业，那一年是1930年。这时，中国开始有了片子上有声音的电影，电影技术有了长足进步。那个时期，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明星，如联华的台柱子阮玲玉和金焰，明星影片公司的女明星胡蝶等，还有黎锦晖带领的明月歌舞团。

我在上海实习了一年就回到了北京，和其他人一起筹划成立了第五分厂。当时它只是个空架子，但是即便如此，也要拍片子。1931年夏天，这个厂开拍了一部电影，叫《故宫新怨》，是朱石麟编剧。影片以颐和园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找了个民营的摄影师，这个人过去是拍新闻片子的，水平不是很高。为了拍片子，我们在北京办了一个培养电影人员的训练班，名称好像叫“演员养成所”。借用颐和园里的一处地方，招收年轻学生，

培养他们做演员或做其他技术工作。我那个班上招了三十来个学生，什么都教，有教导演的、教音乐的、教戏剧的，等等。专门有位话剧导演教导演课，我负责搞厂里内勤。拍《故宫新怨》的演员就是从训练班里选拔的。班里有个女学生，当时名叫杨君丽，就是后来的著名演员白杨。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故宫新怨》拍出来了，在真光影院上映，也很热闹了一阵子。但因为联华经营不善，到了冬天，第五厂得不到后续资本的支持，终于垮台了。这个制片厂经营了一年，昙花一现，厂子倒闭了，训练班不得不解散，我家投资的5000块钱也就打了水漂。一年多下来，铩羽而归，我只好回清华想办法完成学业，毕业后另谋出路。

重回清华

1932年春天，我提前结束休假，回到清华。这一段时间做的事情，主要是电影制作方面的事，几乎与化学没有什么关系，到决定复读时，大学化学课的知识全都丢了。因此重回清华后，根据当时的情况，我选读了中文系，念二年级下。

这次重回清华，除了不得不改变专业之外，家里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我休学期间做的事让家里损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复读之后的伙食费、学费等开销，父亲不主动给，我也不好意思要，一时让我感觉压力很大。幸好我夫人全力支持，拿出了她自己压箱底儿的钱，大概有三百多块吧，帮助我完成了学业。什么是“患难夫妻”，当时觉得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待到几十年过下来以后，才知道当时遇到的那点困难，真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清华中文系，可谓名流云集，

□ 回忆录

如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杨树达、刘盼遂、王力等先生，都是中文系很有名的教授。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这一段时间也在中文系任教，但不记得有没有听过他的课。刘文典先生与刘盼遂先生合称“二刘”。刘文典先生号叔雅，专门为我们讲《庄子》。他爱吸烟，身着布袍，口不离烟袋，讲起课来眉飞色舞，旁若无人。他讲课不看讲义，古书都背得滚瓜烂熟；也不看学生，自己表演。刘盼遂先生好像比刘文典先生还随便，他为我们讲诸子什么的。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也跟黄季刚先生学过。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里关于成大事业、做大学问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的说法，是刘先生介绍给我们的。在清华读书期间，感觉王国维先生的流风遗韵一直没有消失过。闻一多先生给我们讲《离骚》，对《离骚》有很深的研究，没人讲得过他。闻先生和俞平伯先生都习惯穿袍子，这与西洋文学系的王文显先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两位是绝对的“土”，而王先生是绝对的“洋”。俞平伯先生讲课很有意思，他讲课时，眼睛

总是半闭着的，从来不看学生，看似自说自话，但讲到他高兴的时候，甚至大呼小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俞先生负责给我们讲词，诗则是朱自清先生为我们讲授的。朱先生有几篇很有名的散文，像《荷塘月色》《背影》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但其实朱先生是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写白话散文只是他的个人爱好。还有一位先生叫吴其昌，给我们讲《昭明文选》，讲得非常好。听他的课，就像听故事一样。他对《文选》非常熟，全部能背，不用拿书。印象中他也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我刚到中文系的时候，系主任是杨振声先生。大概一年后，杨先生走了，系主任的工作由朱自清先生接任。

在清华读书时，有时学校也会请外校有专长的名教授来校授课。我在中文系读四年级时，有幸听过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罗常培先生的音韵学课。罗先生开的课是“中国音韵沿革”。最初选听罗先生的课时，我对音韵学毫无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出于误会：我因为喜欢写写旧体诗，以为音韵是讲授旧诗创作的，才选了这门课。待到听下来之后，才发现这门课虽然与诗歌写作没什么关系，但见真功夫，很有用，很值得学。罗先生对旧音韵学全凭口耳相传的教学方法所做的批评，令我受益终生。他说，音韵学必须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这是我后来从事实验语音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的座右铭。20世纪50年代，我离开科研队伍已经十多年，罗常培师几次托人找我，让我归队，才有了我后来的一点成绩，才有了我的今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从小在家里家教很严，到清华



吴宗济（左1）和他的老师赵元任（右2）及师兄弟杨时逢、董同龢、丁声树（从左至右）（1938年夏摄）

后，一下子放开了，学业没有人督促了，做事没有那么多约束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

首先是可以自由阅读。清华的图书馆很漂亮，藏书颇为丰富。这里是我最常去的地方。我初入学时，新馆还没盖。记得这座图书馆有三层，去看书时，只要在外面签了名，就可以进入书库。在书库里可以自由阅读，看完后，自己把书放回原处就可以了，不用办任何手续。图书馆专门有一层存放古籍，有很多善本书，有些甚至是孤本。这些书只要办个手续，都可以借出。我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游记、画册、国外大学介绍之类的书籍。总之，三教九流，一时对什么书感兴趣就看什么书。泡图书馆花的时间多了，有时耽误了课业，影响了成绩，看起来损失不小，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收获还是主要的。

在课堂上听诸位老先生的课，课下又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可供利用，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毕业论文《唐曲江考》。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阐述了盛唐时期曲江的繁华，考据出不少东西，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也还算是一篇比较像样的论文吧！

除了写论文之外，我有时也写写诗。古人说诗言志，我有时触景生情，心有所感，也喜欢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这个习惯陪伴了我一生，直到现在，兴致来了，还想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不是个高产的诗歌作者，平生写的诗都凑在一起，大约也就是几十首吧。可惜年轻时的习作都随手丢弃了。前些时候有人来看我，居然翻出我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的一首诗，我自己早都把它忘掉了。这

首诗的题目是《子夜歌》，发表的时间是1934年。那时的我也就二十多岁，按我的年龄，可以说是少作吧。现在看这首诗，还觉得很亲切。和后来写的东西相比，个别地方还不够规整，但话说回来，那时写的东西现在写不出来。现在的东西可能沉着些，但已没有了那种灵气。

再说一说清华的文体活动和其他课余活动。清华的体育运动开展得非常好。那时教我们体育的是马约翰先生，他是福建人，说话有明显的口音，人非常正直。他对体育健身的认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他的体育课抓得非常紧，他要求我们人人都必须学会游泳，否则的话不能毕业；还要求学会一种球，我选择的是网球。他要求我们每天早晨必须先跑一英里，然后再吃早饭。我读书的那段时间，大约是1929年底吧，马约翰先生率领我们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体育联合会的一次比赛，结果清华夺了冠军，令全校同学都大为振奋。

清华的文娱活动开展得更好，可以说是有声有色。我们有自己的乐队，先是军乐队，后来发展为交响乐团。军乐队的指挥，记忆中先是一位英国人，他是北京饭店还是什么单位的乐队兼职；还有一位军乐教官，叫王龙陞，他是当时北京唯一的一位职业指挥王龙海的兄弟；后来正式请了一位捷克籍的德国人，名叫Kupka，我们叫他古普克。他也在城里有兼职。我们的音乐室在大礼堂楼上，背后就是操场，那是我们练习乐器的地方。有时天太热，我们也在室外练习。

我在乐队里先是吹圆号，配合体育比赛，在操场上表演。演出时，我们都身着军服，有帽徽和绶带，精神漂亮，很出风头。第二年又让我改吹伸缩喇叭，因为我

□ 回忆录

学什么东西都学得比较快，所以乐队里缺什么，就让我练什么。乐队里的伸缩喇叭必须安排在第一排，行进时也走在第一排，很惹人注目，自己也觉得非常神气。我们乐队里有两个人吹这种喇叭。到我休学回来，又让我在交响乐团里拉大贝斯，就是超大提琴。我们的交响乐团演奏过许多名曲，包括舒伯特的交响曲。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与燕京大学的乐团一起在协和礼堂演出，很受欢迎，连演几场，都是满座。这样的演出也卖票，挣的钱全部捐给穷人，这就是所谓的“冬赈”，算是为社会做点善事吧。

在清华，我除了参加军乐队（后来是交响乐团）的活动之外，还参加了“清华摄影学会”。这个学会组织过不少技术学习、交流的活动，还举办过摄影展览，请刘复先生、郑颖孙先生为我们评奖。我那时认识了刘复先生，没有想到，大约过了七八年以后，我也步刘先生的后尘，走上了研究实验语音学的道路；更没有想到的是，再过几十年后，我到欧洲考察，竟然遇到了刘复先生的同窗、捷克查尔斯大学的哈拉教授，并因为这重关系得到他的关照。

文娱活动比较出名的是外文系，当时叫西洋文学系。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带出来不少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像李健吾、张骏祥、万家宝（即曹禺）等，那时都非常活跃，后来都成了戏剧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排演的戏剧，记得有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等，女演员是一位姓刘的职员的老太太，三十多岁，很放得开，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后来有了女生，演戏的事就多了。

在清华读书期间，1934年4月，我有

机会到日本去了一趟。当年读清华时，除了要交纳伙食费之外，还规定每学期另交10块钱。四年下来，可以积攒到80块钱。这笔钱到毕业时要返还回来，但不是退现金，而是用这笔钱资助学生外出游学。到我毕业那年，也贴出布告了，要求自愿报名，可以在西安、上海、日本等几个地方选择。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收买中国学生的心，向中国青年灌输日本文化，由文部省出面邀请这样的游学旅行团赴日参观游览。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在日本全境乘坐车船、住旅馆一律半价。当时不懂那么多，只是大致估算一下，有这80块钱，差不多够用了，就选择了去日本。

记得我们这个旅行团带队的是外文系一位姓钱的先生，加上他一共31人。同去的同学除中文系的之外，还有外文系、经济系的。能记得的同学有龙炳圻、顾宪良、马耸云等，还有四五位女同学，如尤淑芬、汪学熙等。

我们4月初到天津大沽口，从那里登船。记得是日本的“长城丸”号，直航日本门司港，从那里又坐了一夜火车，到了东京。那一次游了差不多半个日本，除了东京，还参观了京都、大阪、神户、长崎、横滨等地，大都是参观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庙宇等，游览了奈良、岚山、宫岛、琵琶湖等名胜。4月间正是樱花盛开时节，日本人，特别是青年人，观赏樱花时那种如醉如痴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到1934年夏天，我终于从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前夕，学校秘书处通知我留校，在清华出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又在冯友兰先生的鼓舞下，离开清华，投考了史语所，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

我的清华情结

○卢 谦（1950届土木）口述



卢谦
学长

卢谦（1926.6—2013.8），山东德州人。1950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1950—1952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助教、讲师。后调土木系施工教研组任教并作俄语翻译。1955—1957年任施工实验室主任。1984—1990年任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技术教研组主任。1985年任教授。曾兼任清华大学外语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统筹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基建优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我国传播苏联在建筑施工技术与建筑机械方面先进经验的先行者之一，完成索马里国家剧院舞台整套机械设计、自升式塔式起重机设计与试制等工程任务。通晓英、俄、德、日、法语，对俄语和英语速成教学有一定的研究与创新。

本文由卢谦口述，郑小惠等整理。

初到清华

我是1946年清华由昆明搬回北京后第一批招考的学生。因为家里比较穷，我高中没有上普通高中，而是上的北京高级工

业职业学校。这是一个专科学校，我在那儿就学的土木科。1946年毕业后，在北京市自来水管理处东直门水厂当技术员。同班同学觉得我好像当技术员不太合适，还希望我上大学。他们替我报的名，我也没有准备，到时候他们告诉我，我就去考，就考上了。

1946年10月入学。当时我记得，跟我同班的还有一个考上清华的，就是关铎。我们骑自行车驮着行李卷，从西校门进来，到了二校门一看，觉得清华真好真大，风景非常好。后来我们住到善斋，开始紧张的学习。我们那个班，一开始大概有50个人，有从上海、北京来的，广东来的也有，所以开始语言交流有些困难，不过慢慢大家就很熟了。

我觉得清华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而且你不能光是念教科书，还要看很多参考书，你才能通过考试。当时的清华老师都是国内很有名的，他们讲课的方法和他们的为人，我的确感觉到跟现在的教师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教学计划就有经济学、社会学，工科学生都要学，而且选课可以自由选，没有任何限制。我因为对语言比较爱好，所以我就选了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课。还有就是民主风气比较好，大家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我当时就是埋头读书，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感觉到将来国家革命成功还需要有人来建设，愿意搞政治的搞政治，愿意搞建设的搞建设。

俄语教学与翻译

1952年6月，何东昌同志找我，他说中央决定从1952年10月初全部改用苏联的教材。当时是6月初，到10月初只有4个月，要把全国的各专业，除了中文专业以外，其他全改用中文翻译的俄语教材。所以下一步就是让高等学校的教师用最短的期限学好俄语，然后能查字典，来翻译他自己教的教科书，要求在10月1号以前，刻蜡版油印发给学生。

我没有怎么考虑，就说试一下。那时候我才26岁，我说先办一个试验班看看成不成。当时何东昌同志就找了16个人，其中年岁最大的就是我们副校长刘仙洲先生，当时他62岁，我26岁。研究生、教授、副校长、副教授、讲师、助教，我们组成一个教学小组，我负责整个教学，下午和晚上就在蜡纸上刻写教材，都没工夫起草稿，我刻好之后他们就印。

俄语的语法比较难，但是我想出很多办法，让他们一下子就能会。因为他们都会英文，所有的讲课通过英文、俄文的对比，另外我还搞出很多的顺口溜来帮助学习。这些办法，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也真解决了问题。19天以后进行考试，是数学和几何的题目，考试就是两段文章，在两小时内抱着字典把它翻译出来，结果他们都通过了，而且翻译得很好。

试验成功了，就立刻上报中央，中央就说这必须赶快抓紧推广。这样，我下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全国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分批在清华轮训，等苏联的书运来了，就发给大家翻译。

接着是改编教材。我总结19天还是太

短，便改成一个月，然后把教材的内容充实。我培训一些教师，然后他们分头去讲课。我也讲课，还跟着大家编教材。这样总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到10月1号，全国高校的学生都拿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中文翻译的苏联教材。

搞完速成俄语之后，开学之后我编出四本教材，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发行量也很大。

与苏联专家共事

到了1952年底，中苏协定约定，我们派留学生，他们派专家。一开始派到清华的是五位，组长是萨多维奇，党组织就叫我去当专家的翻译。其实我的俄语完全是自学的，没有正式跟苏联人说过话。

当时蒋南翔同志任校长，也是新来的，在体育馆的二楼会议室接见苏联专家，让我当翻译。那一天来了五位专家，为首的就是萨多维奇。因为我对专业名词比较熟悉，所以翻译没有什么问题。下楼的时候，专家问我俄文是在苏联哪个学院学的。我说我是自学的，他不相信，他说我的发音完全是正规的，甚至于近似老式的发音。这可能是因为我住在北新桥，那儿原来是清朝划给俄罗斯人住的地方。俄罗斯老太太们早上到北新桥买菜，我每天早晨起得早，就跟着他们来回听，偷学俄语。

我跟的专家是白俄罗斯人，他是列宁格勒土建学院土木系的主任，是建筑施工管理方面的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学校批准成立了施工教研组。这是全中国第一个施工教研组，当时的主任是杨曾艺教授。

萨多维奇在阶梯教室讲课，我给他翻译。当时把全国有土木系的工科院校比较

优秀的教师都集中到清华来听他的课，他们叫“进修教师”。专家的讲稿都是自己写的，上课才带来，我来不及预先看，只能临时翻。这对我的翻译能力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专家的任务就是把苏联的“施工技术和建筑机械”这门课，还有“施工组织与计划”“结构吊装”“保安防火”，包括实习指导和毕业设计指导，一共五六门课，在三年里面都教给中国的教师们。我们就跟着他学习，然后逐渐整理出教材，有的铅印，有的油印。教育部还让我陪着这位专家到天津大学等学校，帮助他们组织施工教研组，以及进行有关的教学改革。

苏联专家在清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像在水利系的专家高尔金科，他的翻译是我同班同学、后来的水利系主任张宪宏。高尔金科帮助他们建立水力学实验室，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清华很好的实验室。这位专家也帮助我们建立了土建基地，就是现在土木水利学院新楼那个地方，包括结构实验室、施工实验室，外面还有一个空场，让学生开汽车、开拖拉机。我们那时候都得先学会了，然后教学生。每逢想起有幸和专家一道工作和学习的情景，我都感到非常欣慰。

这些专家都很热心，对中国真是很好，但是当时有些领导提出要检查执行专家建议的情况。蒋南翔就找我们晚上到他家里，当时还有何东昌、周寿昌。他说话很简单，他说专家是真心帮助我们，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的建议不见得完全合适，所以他们有什么建议，你们应该赶快反映，由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是照办还是怎么办。他对专家建议的这个说

法，在当时就很少有人敢这么提。

改教英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又被要求学英文了。那时清华有一位领导叫张健，是政治部主任，他到了我的家里，跟我说：“现在有很多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可以派人到美国访问和学习，大家不会英文，怎么去呀？你能不能想办法就在短期内教会他们？”英文是不变格的，更好教，所以我就答应了。

这回，大家是要到美国去讲学、去做访问学者，所以我这次更重视发音。那时，已经有块头很大的录音机了，可以用它教发音。我还经常给他们放《逃亡的人》，念一些《爱迪生传》的录音，注意会话、发音。这样大概学习300个小时，第一批学员就学完了。他们觉得很好，因为我的教学方法让他们学起来不枯燥。我后来还担任过清华大学外语教学委员会的副主任，各个系的外语教学都调研过，一起研究工科院校的英语要怎么教。

头一班成功以后，《高等教育通讯》还发表了总结，后来又办了几期。建筑系有位教授总结时还在大礼堂发言，说学了这个去美国，说话没问题，访问也没问题。

针对工科院校如何开展教学，我当时在外语教学委员会就提出来，清华每个专业、每个班级、每个学期要有一门课用英语教材，教师要用英语讲课，最起码要用英语写板书。这样一搞，大家就感觉到有所提高了。

技术革新

“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让我到北京六建二工区第四施工队帮助他们搞技术

□ 回忆录

革新。他们要搞一对齿轮，当时又花不起钱去外头加工。有个王师傅，是很有经验的机械工人，他跟我商量该怎么做。刚好我还自学了机械，就根据渐开线原理、齿轮的模数等，把这个齿轮整个形状都画出来，把大轮、小轮都画好。他教我怎么做钳工，我就跟他学了点钳工技术。“文革”的时候我下放到江西，后来到了德安化肥厂，锯钢材，还有钳工活儿，对安装那些化肥厂的高压管道都很有好处。

有一次下班忘了清理混凝土搅拌机，结果第二天混凝土弄不出来了，王师傅就准备打鑿子，来清除凝固了的混凝土。我就注意他打鑿子，他怎么蘸火（又称淬火），火烧到什么红度。1975年到石家庄，我在一个预制厂带工农兵同学实习。有一个学生叫李德禄，他看到厂里有一台“红旗”牌塔吊坏了，工人挑着运预制板，很辛苦。他就问我能不能把这个塔吊修好。“红旗”塔吊转动靠的是上下三排钢丝、两排钢球，钢丝断了，但是那个圈很大，两米多直径，需要解决这个大的圆圈钢丝的蘸火问题，使它有一定的硬度。当时整个石家庄的机械加工厂包括军工厂都说不行，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设备来搞两米多的一个细钢丝圆圈的淬火。我知道淬火应该是看钢红到什么程度，而且这种弹簧钢要用油来蘸火。所以我就根据从王师傅那里学的操作方法，让厂里用白铁皮做一个大盘子，里面搁上机油。然后买65锰钢丝，我因为会钳工，就给它弯成一个圈，先不焊接，然后把直流电焊机两个头夹在钢丝两端上面，让两个工人抬着两根竹竿，用石棉绳拴住这个圈，悬空，然后一通电，很快就红了。红到那个程度，我说我让你们放，你们就赶快放里面，我说

提，你们就赶快提。结果红到一定程度，我一说“放”，他们就放下了，“滋啦”一下；我说“赶快提”，提完了之后就回火，然后再放下去。这样经过淬火的钢丝外面硬，里面有韧性，不会断，我再用钎焊给它焊上。大家把这个东西安上之后，再把塔吊竖起来，螺丝一紧就完了。我们从上午8点钟一直干到第二天上午8点钟，除了吃饭，24小时没有休息，等到上班的时候，塔吊已经转了，可以吊运预制板了。

再比如说西大饭厅（现已拆除）。1952年4月，那时候已经知道中央要学苏联并扩大招生，所以就要搞个大饭厅，北大一个，我们这里一个，跨度33米多，是当时远东最大跨度的木结构，由我和同班同学关振铎来设计。我们最初是用钢的，因为那么大跨度，钢的最便宜，材料又省。可是上面说不行。因为那时候抗美援朝，钢铁都得供给前线，所以又改木头了。木头的连接用螺栓，但是这个木结构吃力很大，一个24毫米直径的螺栓也会把木材顶裂了。所以我们就在螺栓孔外面专门搞一个圆圈形的槽，然后把带竖向裂缝的一段短的无缝钢管两端做成锯齿，再把它砸进槽去。上下这样一砸，中间穿上螺栓拧紧，将来受力的是圆管，力量足够，木材不会破裂，这样就解决了33米大跨度木结构的问题。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做的，除了关振铎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刚从美国回来的刘恢先教授。这个结构经受住了50年的考验。

我的导师张维先生是研究壳体的，张先生让我做一个壳体屋顶，就是现在机械馆东边的波浪形状屋顶的燃气轮机实验室。这种结构计算起来很复杂，那时候没

有计算机，都是手摇计算器，要算三个月才成。我就一想，它不就是这么一个壳吗，就像罐头筒，切一半，只要两边很硬，它的筒就很结实。我就把它看成一个梁，只不过断面是弯曲的。研究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半个小时就把它算出来了。算出来以后，我做了一个1:10的模型，就在机械馆东面的锅炉房院里，我跟工人搬砖、加荷载，下头用千分表量测，如果最后发现能成，就做大的。大的顶上4公分厚，但这个东西到下面就必须加厚，还得有边梁，前面有隔板，保持它的刚度。等要施工了，我愣了，这个模板怎么制作？要完全用好木头模板，就很麻烦，要用一个一个的券（圆拱形的）胎，每米一个、一片一片地支好，然后上面再用长条平板子铺成壳面，那就要用好多好木头了。后来我一看，我们“三校建委会”那时候由东北买粗大的原木，然后用跑车锯，把原木开成板子，开成方子。板皮就是带树皮的薄片，都尽量开得很薄，拉到食堂烧火做饭去。我就跟我们木工朱师傅商量，我说咱们先用板皮做券胎怎么样？他说太好了，他立刻拿着墨线，就在我们机械馆前面马路上抡开了，画了一个1:1的券胎大样，然后就把板皮拿过来，找好中心，把线一画，拿斧头一砍，就砍成圆弧形的了；然后叫小工们钉，很快就解决了券胎的问题，上层的模板将来拆了还可以用。然后打混凝土，为了保证质量，我就亲自跟他们一块干。

我住照澜院，离壳体施工现场很近，有时晚上我突然惊醒，穿上鞋就跑到那儿去看看，看它好好的没事，再回来接着睡。等到浇完混凝土，一个月28天养护，一拆模，质量很好，到现在也没坏。

施工教研组的兴衰

我们施工教研组经历了几回兴衰。专家在的时候是高峰，等专家一走就不行了，因为当时领导无力，而且另外的一个专业特别强。等到“文化大革命”，教研组干脆解散了，我们那些机器、模型，能拆的都拆了，有人把里面的小电动机拿走自己用都没人管。后来我到兄弟学校一看，人家（如同济大学等）都还保存着，我当时心里很有感慨。

等到“四人帮”覆灭以后，有人提出来，还是得有一个施工教研组，于是在1977年又恢复。但是那时候实验室都没有了，就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几个原来的老人，后来又招了点新人。

当时建设部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张恩澍同志，是我1954年在长春汽车厂工地工作时认识的。他后来成立一个教育中心，我们施工教研组跟他们合作，我们的老师去给他们讲课。第一批学员是二十几个人，都是各大学分到中建的本科生，包括暖通、结构的、土木的，还有建筑学的。我给他们拟了一个教学大纲，第一批学生就在颐和园谐趣园西门对面山坡上一个平房上课，住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楼里面。我就教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菲迪克（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施工合同。没有中文，我就影印英文的，用英文给他们讲这个合同，其他的课我也尽量地让教师们说点英文。然后我请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很有名的口语老师教他们口语。这批学生学了一年，最后通过考试，搞一个投标报价的模拟演习，都挺好。

他们7月1号毕业。过了两天，我打电

□ 回忆录

话问张恩澍怎么样，他说挺好，全都放单飞了。他说过去一个工程师出去，要配上翻译，现在他们用不着翻译。又过了一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简直好极了，他们到那儿，就跟外国的监理工程师直接对话，直接讨论问题。过去虽然有翻译，但他不懂专业，比如说“moment”，本来是弯矩、力矩，翻译成“片刻”，你说“片刻”怎么配钢筋？本来是根据弯矩的大小去配钢筋的。

所以这个办法很好，他们都是小青年，到那儿很快就学会了开汽车，出去也用不着司机，一下子我们的司机大大减少。而且他们还经常跟外国人一块打排球、打篮球，搞得都很熟，工程有点纠纷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这样工程顺利，中建公司就开始赚钱了。

公司说还要办。后来就在丰台一局，就跟我们当初速成俄文似的，对各地要派出国的工程师进行培训。这回就比那回复杂了，因为他们有的学过英文，有的根本没学过。我专门给他们编一套教材，从ABC开始学，另外还讲合同等。还从英国请了两个专家，英国很有名的大律师，专门讲项目管理，讲合同纠纷如何处理。我就给他们当讲课翻译。

后来，水利系派教师、学生到伊拉克的水利工地去，又挣钱又学了本事。搞承包以后我也写了些东西，跟其他同志合作写了书，还得了建设部一等奖。后来我就看到房地产这个新玩意。因为我常到香港去讲课，我跟香港理工大学房地产系的主任（英国人）很熟悉。我就派人如刘洪玉等去跟他学习。现在，刘洪玉当副院长了，还有一个学生在香港理工大学当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兼建造与土地利用学院的副

院长。因此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房地产管理专业，后来发展成为建设管理系。它的发展，我觉得符合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满足了改革开放对专业的要求。之后许多学校都有了这个专业。

体悟清华

我在清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好地对进清华的学生讲清楚这八个字的意义。

通过我一生的工作、经历，我很肤浅地认识到，每个人都要自强不息，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但是，你还必须厚德载物。如果你就想突出你自己，没有照顾到周围的人，没有照顾到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你就会犯很大的错误。

我来到清华最大的收获除了校训以外，就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像张维、施嘉炆、陶葆楷，还有很多，他们真是忘我地工作，都是很好的老师。我上过好多人课，像刘仙洲先生、陶葆楷先生、张维先生、钱伟长先生。我觉得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爱国，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因此他们即使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不埋怨，还是努力工作。

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前面没有提到的老师，特别是陆士嘉老师、赵林克悌教授、王佐良教授、萨多维奇教授、葛邦福教授、陈振源老师、倪继昌老师、刘佐姚老师、潘切雷耶夫老师。能和他们相识，得到他们的教诲和指引，使我欣慰地感到，这坎坷的一生实在是不虚此行。我深深地感谢老师们，怀念老师们。

（摘编自《清华记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从《清华周刊》发现中国

○胡一峰（2002级硕，人文）

110年前，清华学堂建立。在这百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经历了风雨沧桑的历史，积淀了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奉献的杰出人才。这其中，《清华周刊》作为一份不可或缺刊物，见证和记录着清华大学的早期历史。

《清华周刊》创刊于1914年3月24日，是一份由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原名《清华周报》，1914年9月22日改名为《清华周刊》。改办大学后，《清华周刊》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刊物，由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委员负责组织编辑出版。1947年9月25日被列为禁刊，停止发行。内容有言论、译丛、文苑及校闻等。该刊承载了清华23年的历史（其中1937年1月—1947年1月停刊），是清华大学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之一，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社会思潮史、学生运动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裨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从一场关于梁启超的争论谈起

1923年10月，梁启超应邀到清华演讲。此时的梁启超已到知天命之年，逐渐走出政治的聚光灯，向一个文化学者转型。但他要到校演讲的消息，还是让清华学子兴奋不已。一位学生写了《欢迎梁任公先生》一文，表达对作为“国学讲师”的梁启超之敬意与欢迎。不料，梁启超演

讲结束后，另一位清华学生却大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认为梁启超的演讲充满了对革命党人的政治偏见，“梁先生既不痛斥北洋派的流毒，复不痛骂研究、政学等各系的播弄，又不痛惜人民程度的低浅，更不痛咈外国侵略主义的煽动，而独责备主义始终如一、流血不知多少的革命党不应暗杀、行刺、运动军队”，并提醒同学们切不可因为梁先生发表政治偏见而不去听他的学术演讲，但也切不可因为梁先生发表政治偏见而完全信他的见解。

第一位同学名叫梅汝璈，听完梁启超演讲的第二年，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7年后，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他当时所穿的法袍今天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之中。第二位同学叫王造时，是梅汝璈的江西老乡，比梅汝璈年长一岁，入学却比梅汝璈晚了一年。后来他就读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并获博士学位，还在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研究员。1936年，因为呼吁抗日救国，王造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梅汝璈与王造时的这两篇文章刊发在同一本刊物——《清华周刊》上。这虽然是一本学生刊物，影响却飞出清华园。王造时批评梁启超的文章，被《时言报》和《顺天时报》转载，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

□ 史料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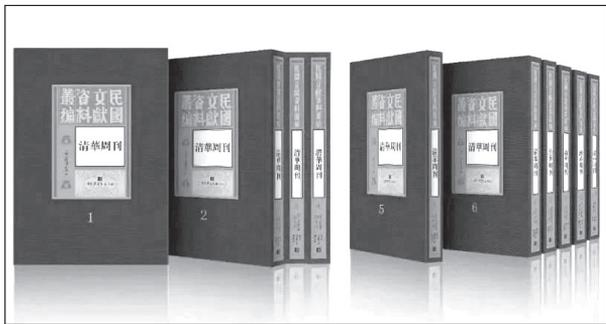
在《清华周刊》这本刊物上，我们可以读到近现代中国特别是文化领域的许多大事，还可以看到许多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行程的重要人物的“青葱岁月”。比如，1923年胡适与梁启超的“国学书目”之争的重要文献就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第一篇文章——张君勱的《人生观》也发表在《清华周刊》。清华大学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一百多年来，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中，几乎都活跃着清华学子的身影。可以说，欲了解今日之中国，不可不读清华之历史；要了解清华，又不可不读《清华周刊》。202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影印版《清华周刊》，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本“神奇”的刊物提供了便利。

“史的意义”非同寻常

1926年，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读书的姚名达在《〈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一文中这样写道：“《清华周刊》实负有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我叫他‘史的使命’”，“《清华周刊》不是游艺园的剧单，不是大公司的广告，更不

是捏造新闻的晚报，也不是有闻必录的日报；《清华周刊》实在是记载清华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留给落笔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看的，使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知道这秒钟以前的我们。《清华周刊》的执笔者，应该具有史家的眼光，怀抱史家的态度，去记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清华有意义的人生，全部活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赓续无穷，使清华的史，昭垂万古。”今天，距离姚名达撰文已过去了85年，我们重读《清华周刊》，首先感受到的还是其“史的意义”。

正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1914年3月24日，《清华周刊》创办之时，样式为寻常小报，第一期共4张，分为言论、纪录、校闻、校声、清华阳秋、警钟、文苑等栏目，当时名为《清华周报》，从9月22日第13期改为《清华周刊》。从1914年至1937年1月，《清华周刊》共出版636期。1947年2月《清华周报》复刊，共出17期。此外，还不定期出版了一些增刊和特刊。1947年9月25日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刊，停止发行。从时间上看，《清华周刊》存在23年（1914年至1937年，1947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23年只是沧海一粟。但在清华校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这23年却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清华周刊》本是一张清华学生编辑的小报，发行范围限于校内师生，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它与《时事类编》《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100余家刊物进行交换，几乎每



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周刊》

天都收到多家国内各图书馆函请赠阅收藏的信息。举凡清华学制变迁、校园建设、办学经费，以及教学情况、学生生活，《清华周刊》巨细兼收，从而勾勒出老清华的生动剪影，也成为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教育、文化、思想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

以学生运动为例，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谓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两次学生运动，不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是现当代中国政学两界“大人物”的摇篮。学者欧阳军喜发现，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周刊》曾刊登清华学生代表团日货调查股的《日货调查一览》，列出药品类日货179种。清华学生代表团还发行《清华周刊》“号外”，每日出版两次。上午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及本校消息，下午为各报摘录的紧要新闻，由同学誊写两份，分贴在高等科、中等科食堂前面。这成为清华学生关于运动消息的主要来源，也为学生采取下一步行动提供了主要依据。而在“一二·九”运动前夕，《清华周刊》发文批评丁文江对日“低调”的言论犯了“严重错误”，并认为“今后中国的出路，不是屈服，而是斗争”。“一二·九”运动中的进步学生领袖蒋南翔、姚依林等人，都担任过《清华周刊》的编辑或撰稿人，蒋南翔更曾任总编辑。《清华周刊》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说到清华的进步学生活动，不能不提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他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担任清华第一个进步社团——“唯真学会”的会长，还曾担任清华学生会会长。1927年3月，他在美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1930年回国工作。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

牲，年仅34岁。《清华周刊》是记录施滉烈士的事迹和思想的重要文献。1924年，《清华周刊》上有一篇《见孙中山先生记》，生动记录了施滉、徐永煊、何永吉三人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的情形。施滉对孙中山说：“我们暑假后便要到美国升学，请大元帅指教我们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孙中山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又说，“以前求学，美国最好，因为美国比较谋的是多数人的幸福。现在则不然，比较上谋多数的幸福的，乃是俄国。”并谆谆告诫，“诸君要到美国念书，极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带坏。”《清华周刊》还刊载了多篇施滉的文章。在《学生对于社会应该怎么样？》中，他写道，“学生应该为社会谋幸福”。在《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言》中，他提出，清华之使命有二，一是“对于国家为解决国家问题”，二是“对于世界为介绍中西文化”。还认为，清华虽是留美预备学校，但不可把教育目标定在培养学生入美国大学，相反，“务必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不可仅以造就能够应付美国社会的学生为满足”。他还感慨道：“这四五十年中国是危险的，纷乱的，污浊的，清华人才应该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并奋斗。”平实的话语，让我们读到了一个清华人的自我期许。

《清华周刊》的编辑和作者群覆盖广泛，除了革命者，还有一大批文化名家。王瑶曾说，40年代各大学名教授中的清华校友，“差不多都当过各栏编辑”，就以

□ 史料一页

清华本校而论，社会学家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文学家闻一多，哲学家贺麟均曾在《清华周刊》效力。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的梁实秋，在《忆清华》中写道：“说起《清华周刊》，那是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周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写，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这段文字可与总编辑吴景超的回忆相印证：“这一年的编辑生活，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当时与我共同编辑《周刊》的人，最重要的，是一樵（顾毓琇）和实秋。我们那年住在‘新大楼’，便是现在的一院，三人共住一间寝室，课余时间，大部分便用在《周刊》上面，因为当时我们真把《周刊》当作一种有兴味的事业而合作的。一樵的主要职务，好像是编辑新闻，我与实秋，专写社论。每当发稿的前夕，我们大家商量几个题目，把意思交换一下，然后各人分开去动笔，在熄灯之先，假如还有工夫，每人也许再写一篇。写完之后，交换阅读，互相欣赏，自己便觉得真有了当大主笔的快乐。”

诚然，青少年时期往往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是筑就一生志业的关键时

期。据笔者所见，《清华周刊》上许多作者署了笔名，详加考证是一项极有意义而又极其艰巨的工作，或许我们已经很难对这个群体究竟包括哪些人一一落实，但这个群体生逢民族大变局的时代，作为“执笔之士”，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他们通过《清华周刊》留下的这份宝贵资料，不但让我们听到民族曲折前行的坚定足音，而且告诉我们，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学问、思考国运、砥砺人生。

清华文化与精神的导览图

曾经的《清华周刊》编辑、后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的浦薛凤说，《清华周刊》应该灌输新思潮、新学术，讨论新思潮、新学术，创造新思潮、新学术。在今人眼中，清华以及清华人以踏实、内敛的形象著称。然而，踏实不等于迟滞，内敛也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清华在新文化的传播和输入中，从未缺席。

笔者曾以《清华周刊》为基本史料，梳理过话剧在中国的早期发展。话剧是舶来的艺术，深受清华师生喜爱。从1913年起，以年级为单位，清华学生在圣诞节、除夕、新年等节庆期间经常举行丰富多彩的话剧演出。据统计，仅1913—1920年，清华有记载的演剧达到77次。演出最多的1914年，从年初演到6月，年底又大演一番，全年共演了19场。我们熟悉的“清华名人”如曹禺、吴宓、闻一多、汤用彤、吴文藻等，都曾登上清华的话剧舞台。而对于清华话剧的创作演出情况，记载最丰富的正是《清华周刊》。更重要的是，

《清华周刊》上刊发不少话剧理论评论文章。比如，1917年，《清华周刊》上出现了第一篇专论话剧的文章。文中说：

“学生演剧如其情节果风雅动人，有关世道，其习练纯熟精密，布景周到完美，多大纯而少小疵，则不特演者得增进阅历，引起刻苦勤劳之精神，悟分工合作之要，即观者亦受无穷之感化矣。”“夫学生之所短者，在经验之浅薄，而演剧能补助之。学生之所以见轻于社会者，乃少刻苦勤劳之精神，而演剧能贯注之。学生之所以大抵落魄无聊者，乃傲慢自大，无服从之自觉，与协同之精神，而演剧亦能挽回而矫正之。”因此，学生参加话剧活动，“实亦一种优良之实验教育也”。应该说，这篇文章透露出当时清华人的话剧观是十分先进的，他们重视话剧的美育价值，把话剧视为人格养成的手段。这些当年的“话剧粉”还借助《清华周刊》的平台，翻译了不少国外的话剧作品和理论著述，比如专文介绍Isaac Goldberg Kidd所著*The Drama of Transition*, K. Mac Gowan & R. E. Jones Harcourt所著*Continental Stagecarff*。德国的豪普特曼、巴塞尔曼，英国的狄更斯、萧伯纳，包括日本的菊池宽，也都在《清华周刊》上“混了个脸熟”。而清华话剧人放眼世界，目的是推动本土戏剧发展。1936年，《清华周刊》一篇文章明确提出“编译戏剧辞典”的倡议。文中说，中文方面理化、哲学、教育等学科有专门的辞典，“戏剧就始终没有”，“我们所需要的戏剧辞典，当然不是一种Dictionary，而是一部Encyclopedia，应包括作品与作家，舞台技术，作剧用语，史源等之东西”。还充满期盼地说：“希望几年之后写中国文章

时，可以不用外国的注脚。”这显示出很实际的话剧艺术本土化自觉和努力。

近些年来，文化文艺史领域的研究者，已经以各自的研究证明了《清华周刊》的价值。比如，李道新的《“有害”甚或“有罪”：1920年前后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一文，依据《清华周刊》，细致介绍和分析了1920年代闻一多等清华学生围绕“电影问题”的一场论战，以及他们关于电影的本质、公共言论、社会责任、学生自治等的看法。李道新认为，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是1920年前后中国电影传播史上颇有特点的案例。这场关于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论战，既显现20年代清华学校对学生自治及言论自由的追寻，又可称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并颇有成效的学术争鸣，还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进一步阐发的公共文化事件。再如，任勇胜的《“清华园里好读书”》独辟蹊径，对《清华周刊》的“书评”作了系统梳理，发现《清华周刊》共刊登过书评650多篇，约120万字，涉及十多个学科，1160多种书籍、刊物和文章，“这在同类刊物中是少见的，除了《清华周刊》编辑人员自觉地承继延续外，与周刊比较强烈的学术化意识和传播知识、构建高水平的校园文化追求是分不开的”。又如肖伊绯的《怎么样做艺术家》，发掘出1926年徐志摩在清华所作《文学与美术》的演讲；王兴的《作为〈清华周刊〉编者和作者的夏鼐》详述了夏鼐与《清华周刊》的文字交往，这两篇文章不但提供了文化史新知，而且开辟了从文献考订补遗和学人成长的角度利用和研究《清华周刊》的新思路。

据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统计，近20年

□ 史料一页

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清华周刊》为参考文献的学术文章高达2500余篇，其中博硕士论文占比为28%，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这充分说明，《清华周刊》是一座富矿，具有充沛的学术生命力。我们不妨把《清华周刊》当作一部上

乘的“史书”，也不妨将其视为进入清华精神的导引。由此进入，顺着历史的逻辑，发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价值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

（转自“藏书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8月18日）

杏坛传奇——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

○黄加佳

1925年9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这一年，对清华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因为清华正经历着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渡期，清华出现了一个既不属于留美预备班，也不属于大学部的学术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原本是相对“西学”而言。五四前后，一方面人们对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继承、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进而重拾文化自信，重新定义自己的呼声也应运而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立了。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仅4年，培养的学生也不过七八十人，但云集了当时学问最好、声望最隆的四位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并不是传统上那类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掌握现代学术方法，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不但为后世学人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维度，也成就了一个流传近百年的学术传奇。

“一番大整顿计划”

1922年3月，《清华周刊》登了一则名为《校长派定》的简讯：“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王文显先生代理副校长，已见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闻此次来掌斯校，有一番大整顿计划……”

彼时，正是清华校长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自从1918年对学校贡献颇多的周诒春校长遭人构陷离职以后，短短几年，清华已经换了三任校长，其中一位甚至还没到任就被学生拒之校外。

因此，当曹云祥被任命为校长时，全



清华大学校园内矗立的四大导师塑像

校师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对清华有一番大整顿计划。所谓的“大整顿计划”便是将清华从一个“留学预备学校”改成一所正规大学。

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4所增长到20多所。相比之下，资金充裕、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一直止步于“中学”程度，这令全校师生深感不满。“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

对于校方而言，推进“改办大学”的理由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点之外，还有更为致命的经济因素。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校方测算这笔钱用到1940年基本上就花光了。届时清华如果仍然仅仅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而不是一所正规大学，那么将无法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立足，更无法吸引人才报考。因此，从学校的长远发展看，改办大学是唯一出路。

1923年9月10日，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发表讲演，提出本学年的6项计划，其中就包括学校18年计划（1923—1940）及预算、改办大学之次序等。

不久后，曹云祥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中，为清华发展列出了三大计划：改设大学、筹备大学基金、拟设研究院。

创建国学研究院

其实，曹云祥最初设想中的研究院并不限于研究国学，而是一所与本科教育相衔接的多学科研究所。但20世纪20年代，国内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按照理想状态创办一所多学科研究院，难度很大。对

于尚处在转型时期的清华而言，更无法一蹴而就。于是，校方决定，把建立多学科研究所的事往后放一放，先建一所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研究院。

一直以来，清华课程设置过于西化，广受校内外舆论诟病。学校对“国学”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学生们学习“国学”的热情。发表于1924年的《清华学生生活之面面观》一文描述：“学生过了午课，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

五四运动之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清华学子不再以“美国化”为荣，他们对学校忽视本国语言文化教育的教学安排十分不满。一篇刊于1920年1月《清华周刊》的文章，向校方发出质问：“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我等清华学生，非中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中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轻视忽略，与日俱进，无时而已也。”

基于多方面考虑，曹云祥决定率先创办国学研究院。筹建研究院的事务纷繁芜杂，请谁来负责具体操盘呢？就在他为人选发愁时，老同事顾泰来推荐了吴宓。

吴宓是清华学校最早送出国门的一批留美学生之一。1917年，在清华学习7年后，吴宓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从吴宓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可有意思的是吴宓十分倾心中国传统文化，视中国文化为主命。据听过吴宓讲课的学生回忆，他精通国学和西洋文学，非常擅长用旧体诗来表达现

□ 史料一页

代人的心理。

吴宓学成归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当曹云祥向他递上橄榄枝后，他立刻回到母校，承担起创办国学研究院的重任。他到任之后，立即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中。根据校方定位和个人见解，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章程》明确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此外，还对研究院的组织、科目、教师、学员及研究方法等，做了明确规定。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当属为清华国学学院聘请了四大导师。

四大导师聚齐

一家研究院能否取得成功，与办学者的理念、教育经费、组织架构、生源质量等都有关系，但最为关键的是要有名师。

据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时，曹云祥曾想聘请胡适出任导师。胡适谦虚地说：“我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13日，也就是接到聘书的第二天，吴宓就来到景山附近的织染局胡同10号，登门拜访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是中国近代一位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他不但国学根基深厚，而且擅于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此外，他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史学领域都有独树一帜的建树。可以说，王国维是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连鲁迅先生都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虽然学养深厚，却愚忠于清

廷，政治主张相当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全家随好友罗振玉东渡日本四年有余，大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架势。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脑袋后面仍留着小辫子。

1923年，王国维被推选到南书房给逊帝溥仪上课。这让他倍感光荣，可仅仅一年，逊清小朝廷就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王国维视之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幸亏家人阻拦，他才没有死成。

1925年，当吴宓登门拜访请他出山掌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正是王国维最心灰意冷、生计无着之时。

吴宓走进王家客厅，向王国维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大躬，然后将曹校长发的聘书呈上。后来，王国维曾对人谈起，他以为来者必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没想到吴宓执礼甚躬。他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可是见吴宓如此恭敬，大受感动，所以才接受聘书。

请到王国维后，吴宓又风尘仆仆赶到天津，聘请梁启超。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跟清华的渊源更深。梁启超与清华的第一次邂逅在1914年。当年11月5日，他应邀来到刚创办三年的清华学校做演讲。那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君子”，他借用《周易》中的乾、坤二卦的象辞勉励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这八个字便成了清华学校的校训。

那时，他就曾向清华校方提出：“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有为也。”此后的近十年中，梁启超多次到清华演

讲，他的学养和风采给清华学子留下深刻印象。梁启超也很关心清华的长远发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五点建议，其中就包括“办成一完备之大学”。因此，当吴宓专程到天津请他出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时，梁启超立刻欣然接受。

顺利聘请到胡适推荐的两位导师王国维、梁启超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邀请却被章太炎拒绝了。找谁来补上这个空缺呢？吴宓向曹校长推荐了同学陈寅恪。

陈寅恪是晚清重臣陈宝箴之孙，自幼饱读诗书，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他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早已失传的古语言。

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相识。吴宓立即被他惊人的博学所倾倒，并赞叹“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不过，陈寅恪留学欧美好多年，却没有拿到任何学位，每每有人问起，他总是淡然地说：“博士学位好拿，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这种求学问而非求文凭的学习态度，得到许多读书人的赞许，但是在找工作时却遇到了点麻烦。当吴宓和梁启超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云祥问：“他是哪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著作！”曹校长有点犯难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一听这话，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

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应该说，曹云祥是一位非常开明的校长，他见梁启超、吴宓二人都如此看重陈寅恪，便立即向他发出了聘函。

在与陈寅恪接洽期间，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又向清华国学研究院推荐了第四位导师赵元任。

赵元任是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庚款第二批留学生，与胡适是“同年”。在当年激烈的选拔考试中，赵元任名列第二，而胡适只排在第55名。虽然考试名次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但赵元任却是货真价实的学霸。1918年，赵元任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学。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语言学、音韵学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1925年，“四大导师”先后搬入清华园。如今，清华园西侧仍坐落着一片整齐的平房，那便是当年清华为教师们修建的宿舍——西院。

据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清华西院宿舍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有三间正房、一间储藏室、一间下房，厨房、厕所、浴室一应俱全。厕所配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厨房旁边还有一间抽水蹲便式厕所，专备佣仆之用。院子的面积比房间还大，院里种着许多花木。

不过，在王国维看来，房子还是太小，他在城里的旧居有20间房。为了摆放藏书，他不得不向学校又租了一套住宅。有意思的是他以为门牌号相连的房子必然挨着，到快搬家时才发现，17号住宅在西院最东边，而18号住宅则在最西边，中间隔着两排房子和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相距100多米。直到当年秋天，他才想办法

□ 史料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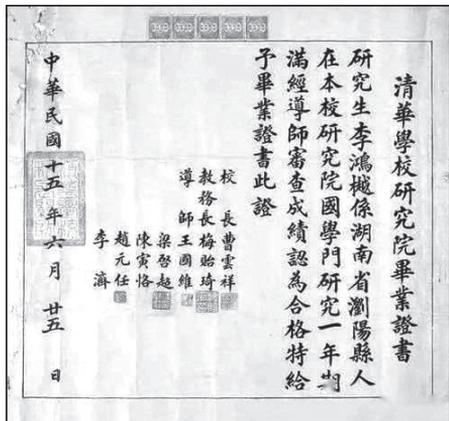
换成了18号、16号两座相邻的房子。

赵元任和陈寅恪则住在南院1号和2号。赵元任家人口多，书籍、器具也很多，他太太杨步伟又热情好客，经常有朋友来家里聚会，因此一处房子也不够用。幸亏，第二年陈寅恪搬到他隔壁。陈当时是单身，没有那么多家当，便把一半房子匀给赵家，才解决了赵家的住房困难。

教与学

1925年7月6日至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在位于城内李阁老胡同的法政大学举行招生考试。据《吴宓日记》记载，上午8点到10点考中国哲学、10点半到12点半考英语，午饭后，下午2点到5点考论文。下午5点半老师们带着考卷乘车返回西郊清华园。

第一届清华国学研究院计划招收30名学生，后来两名考生未能入学，又从备选名单中补招了一人，他就是后来成为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家的姜亮夫。



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李鸿樾的毕业证书上有清华四大导师的名字和签章，被誉为“史上最牛毕业证”

清华经费充足，条件非一般大学可比。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吃饭六人一桌、四菜一汤，不过最令姜亮夫满意的是清华有一间巨大的图书馆。图书馆“四壁都是书，桌子上的电灯很亮，里面可以坐三四百人。另外还有阅览室，一桌六人两盏灯，四周摆满了字典、词典和其他工具书”。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还有一个特殊优惠——借书无限量。“只要写下书目清单放在门口，两个小时后就有人把书送来，如果提出书单馆内没有，还会想法去买。研究院的学生还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内看书。”有一次，姜亮夫看书入了迷，被关在图书馆里。他索性猫在里面，看了一夜书。

开学后，四大导师的学识和他们的教学方式更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梁启超先生讲课不但运用校勘、考证、训诂等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去分析古籍的真伪、年代，还经常参考海外学人的观点，一下子打开了学生们的眼界。

周传儒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他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

上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风雨无阻。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是一个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君子。同学住的地方，不来。来就是上课，上完课就走。他家住在西院，同学住新大楼，相距二三里。同学们常去看他，质疑请益，他必竭诚相告。遇有不知道的事，他就说“弗晓得咯”，没有一次掩饰。他写字工整，小而秀，但不讲究碑帖，不成一家。

周传儒对恩师的回忆言简意赅、客观平实，一个实实在在做学问的君子形象跃

然纸上。

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姜亮夫说，自己“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陈寅恪强大的语言能力，更令姜亮夫瞠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去问他吧，几乎每个字都要问。”陈先生身体弱，冬天要穿两件皮袄。见他书读得这样多、这样好，而身体这样差，学生们都很心疼。然而，学问如此深厚的陈先生，每周还有两天要从清华奔波到城里，找人去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么一个大学者，还在这样勤奋读书，像我们这些人不成其为人了！真是无地自容！”

赵元任先生与其他三位先生比较起来，教学方法更加现代。他讲的描写语言学是把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

多年后，姜亮夫仍感慨：“清华园的先生们确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而且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特点指明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

除了学业上受益良多，与四位导师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也成为学生们终身回味的温馨画面。为了增进师生感情，清华国学研究院每个周六都会组织一个同乐会，师生全要参加。同乐会上有人讲故事、有人说笑话、有人背书、有人唱戏……

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先生上课时虽然很严肃，但同乐会上却一点也不摆架子。

有一次，梁启超说要背一段《桃花扇》，结果背着背着，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一向沉默、内敛的王国维，当即站起来背诵了《两京赋》。活泼的赵元任命人把每人的茶杯收在一起，敲打调音后，竟然用茶杯敲出一首乐曲。还有一次，他给大家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再回到上海，每一处的方言都学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陈寅恪为人比较严肃，在公开场合不太跟大家说说笑笑，但私下谈话也是非常幽默，平易近人。

总之，清华国学研究院无论从教学设置，还是师生关系，与现代的大学或研究院的感觉并不太一样，它有着传统书院的古风与温情。遗憾的是，学术神话一般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4年就落幕了。

传奇落幕

国学研究院运行半年，成果斐然，吴宓非常满意。他在校务会议上提出第二年的发展计划：增设古物史料陈列室，与外界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增聘教授2人；下届招生由30人增至50人；经费增加1.1万元；国学研究院兼办普通国学。然而，他的扩充计划甫一提出，就遭到校内许多教授的反反对。

事实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筹备之初，关于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清华内部就存在着争议。国学研究院到底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还是与清华本科教育相连接的研究生院，大家理解各不相同。包括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在内的许多教授认为，国学研究院原本就是一个“过渡产品”，因为各种客观条件所限，清华无法立即创办一个多学科研究院，所以才“先设国学

□ 史料一页

一科”。而早在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清华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就认为，大学应该优先发展文理基础学科，其次是应用学科，而不应把有限的经费都用于办国学研究院。

一番争执和劝说后，梁启超、王国维都先后同意了张彭春的主张。在后来召开的校务会议上，决定当多学科研究院（当时称“大学院”）成立时，将国学研究院并入其中。不难看出，这与吴宓期待国学研究院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想法相去甚远。

虽然清华校内其他院系的教授对国学研究院颇有微词，但国学研究院衰落的转折点，实为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先后谢世。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照例清早起床，由夫人为他梳理发辫后去国学研究院上班。按照他女儿王东明的话说，当天“无丝毫异样”。

上午，与同事商讨了下一期招生事宜后，王国维向办公室职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侯厚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纸币。由于王国维身上从来不带钱，所以侯厚培不以为怪。出了校门，王国维叫了一辆人力车，10点左右来到颐和园。临走时他还嘱咐人力车夫在园外等他，可谁知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出来。

王国维缓步走过长廊，在石舫前枯坐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走进鱼藻轩，从身上掏出一支纸烟。抽完后，他毫无征兆地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纵身一跃，跳入湖中。

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正好有位清道夫目睹了王国维投水的全程。他立刻跑来将王国维救上岸。奇怪的是，整个过程不足两分钟，由于湖水较浅，王国维后背的

衣服甚至都没有打湿，可他却已经撒手人寰。后来，人们发现，他入水时将头用力栽进湖里的淤泥中，致使口鼻堵满淤泥，窒息而亡，可见其死意之坚决。

闻讯赶到颐和园的吴宓，目睹了王国维遗体的惨状：“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在场的清华师生和王国维的家人，无不失声痛哭。

人们从王国维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开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句话广为人知，但王国维到底遭到什么奇耻大辱，使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死呢？

长久以来，关于“王国维之死”一直流传着几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为了“殉清”而死；有人说，他是因为长子刚刚过世，又逢亲家罗振玉逼债，羞愤而死；最深入人心的解读则是来自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其实，这些解读都有牵强之处，纵观他前后的个人生活和心理变化，不难看出，他的一意赴死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起效的结果。

1927年年末，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渐渐无法上课。紧接着，北伐成功，国民党控制了北京。曹云祥校长辞职离校，赵元任也赴南京史语所任职去了。四大导师离去三人，唯有陈寅恪一人坚持上课，大有孤木难支之感。

1929年7月，送走最后4名毕业生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虽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开创的研究国学的新风气、四大导师的风采，仍像一个经久不息的神话流传至今。

（摘编自《北京日报》，2022年3月8日）

赵元任：好玩儿的大师

○陈来(教)



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的先驱，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今年是赵元任先生诞辰130周年，为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学术精神，本刊选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为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好玩儿的大师》（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出版）所作的序，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清华先贤的怀念。题目为编者所加。

赵元任先生，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是中国学者全面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并取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和大师，他的音乐作品把中国传统和现代音乐作了创造性的融合，并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音乐院校的经典教材。赵元任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是近代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先驱者。

赵元任先生是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同批留美的有胡适、张彭春等。

他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取得博士学位后，1920年他在面临各种工作机会的情形下，选择回到母校清华教授物理学。1925年，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邀请赵元任先生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同年6月，赵元任从欧洲抵达北京，张彭春一见面就跟他提到“四大教授”的称呼。于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赵元任先生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的一家在清华住在南院（照澜院）1号，因为书籍器物甚多，次年又借用了陈寅恪住的南院2号的一半。

元任先生第一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学科范围是：现代语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他讲授的“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供研究院学生和旧制生选修，上课的地点即在清华学堂117室。1925年秋季开学之初，赵元任为研究院学生作了“中国语言研究主题示例”的谈话，指导学生如何选定研究题目。1926年国学研究院招生的专门学科考试，内容有所扩大，上年考试为八门中选三门，八门中只有一门“普通语言学”，1926年则加入了“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普通语言学”“东方语言学”“中国音乐考”。考生报名时需选定专门学科，考试需完成此学科的六门试题。元任先生1926年担任的课程有“音韵练习”等，指导的学科是：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1927年，元任先生担任的课程是“方言学（吴语）”，他

□ 怀念师友

还常常和助教杨时逢一同赴南方做方言调查。1928年，仍担任“方言学”课程的教学并到南方做方言调查。

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了“中国音韵学”课，据王力先生回忆：“赵先生所讲中国音韵学是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赵元任先生的讲课是站在当代语言学的最前沿，如用德、法、挪威语和中国语言比较，中西对译词汇等。他的讲课有三大特点，一提倡实地调查，二注重古今会通，三致力中西融合。元任先生曾在哲学系兼任逻辑课程，还为旧制学生做过物理学的讲演。

元任先生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年中，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清华研究院丛书》第四种，由清华研究院印行），他的著作充满了革新的精神。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确立了其一生以中国语言学为主的研究方向，也奠定了其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赵元任先生是近代以来罕见的天才学者，他天分过人，又善于学习。作为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他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和大师。他一生雅好音乐，自幼



赵元任先生和大女儿赵如兰

受民族音乐的熏陶，青年时学习钢琴，在美国留学时曾修习作曲等音乐课程，广泛涉猎古典音乐，1915年就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他的音乐作品把中国传统和现代音乐作了创造性的融合，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音乐院校的经典教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先生热情洋溢地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具有强烈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歌曲。在赵元任歌曲集《新诗歌集》中，歌词多是由现代知名作家或诗人如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胡适以及赵元任自己创作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曲里，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了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钟》《听雨》《海韵》，也表达了人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他的不少音乐创作如《教我如何不想他》是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完成的，《新诗歌集》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赵元任先生曾说，自己研究语言学和许多事物，是为了“好玩儿”。在我们看来，“好玩儿”，代表着对于对象事物的一种无功利的深厚的美学兴致。清华国学



一九二五年赵元任全家在清华南院一号

研究院另一位导师梁启超说过：“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中，生活才有价值。”赵元任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兴趣、好奇。巴金夫人萧珊（陈蕴珍）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曾问赵元任先生的朋友、清华教授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门学问太枯燥了。金先生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我觉得它很好玩。”金先生的态度与赵元任先生也是一致的。那么，赵先生说的“好玩儿”是指什么呢？赵先生没有直接说明，陈原先生曾加以解释说：“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了解赵先生说的“好玩儿”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好玩儿”是表达一种自由创造的心灵状态，是对世间万物抱有无穷热爱和兴趣的心灵状态。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体现。赵先生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科学精神，而他的人生态度充满了追求兴趣的人文精神。本书名为《好玩儿的大师》，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

这套书名为影记，影记之“影”，不是电影之影，而是作为影像的照片。影记之“记”，则是指对照片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关系的文字说明。影记对于学术史的研究意义在于，生动的图片影像是人们体察、把握历史的重要的经验条件，而影与记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影像有了“记”的文字支持，一方面也使文字之“记”有了“影”的实证和呈现。由于照片是现场影像的实录，故影记的作用便超过了一般出版物的所谓“图文并茂”，因为一般所说的图文并茂的“图”往往是指图画，多出于绘画者的想象，而非真人实景的真实呈

现。于是，影记不仅是一种研究史料，且对于研究者和阅读者而言，更使其对于历史上的学术人物及其活动增加了感性的、具体的了解。说影记具有历史史料的意义，并没有抹杀影记之作的完成同时是一项历史工作的意义，因为，要把上万张照片中的人物辨认清楚，把历史场景标示出来，根据年代加以编排，这本身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具有研究的意义。

赵元任先生在1910年到达美国后不久便买了一架照相机，一生拍照无数。他并不以摄影师见称，但以他的地位和经历，他所拍摄的照片必然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影像素材和历史见证，尤其是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极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拥有自己的相机，所以他摄下的那个时期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他一生中留下的大量照片、所记录的人和事，一方面可以与赵先生的日记、传记相互印证，使他的个人史成为有影像的、活生生的历史，此一历史不仅可以读，还可以看；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今天的人具体地感知那个时代及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人。特别是，他所接触、为之摄影的那些人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大家，影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的人和事，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学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提供了另一种生动的视角。

本书为学术篇，主要侧重于赵先生1920至1940年代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及其与中国学人的往来关系，对增加人们关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史的具体感知颇有益处。其中既涉及赵先生亲身参与的一些重要事件、活动、组织，如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数人会、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各种

□ 怀念师友

方言调查等；也涉及很多中外著名学者，如罗素、高本汉、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胡适、任鸿隽、丁文江、刘半农、蒋梦麟、傅斯年等。这些照片赵先生自己是非常珍视的，所以1937年抗战爆发中研院南迁时，赵先生把日记和照片寄给了在美国的朋友保管，这批珍贵的资料才得以免遭战火而保留下来。感谢本书的编者赵新那先生、黄家林先生，在他们多年不懈的努力之下，这些资料终于整理完成，与读者见面，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新那先生，她已年过九十六，没有她坚韧的意志和精神，这部影记是很难完成的。

本书即将付梓，编者希望我为本书作序，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因为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我作

为今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有责任为表彰清华国学院的前贤尽力。而且本书编者赵新那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别顾问，黄家林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他们所完成的这一工作，不仅是他们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亦为本院的重要研究成果。所以，我不揣简陋，对赵元任先生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对本书作为影记的意义，向广大读者作一介绍，以使大家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骄傲，是清华的骄傲，是中国学术的骄傲。

我们期待，中国学者将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学术精神，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而不懈努力。

2019年12月30日于清华学堂

许孔时——为“软件”起名字的人

○胡珉琦



许孔时学长

他是中国软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是最早把编译系统引进国内的计算机专家。将“software”一词译为“软件”，是他的杰作。

他是许孔时，在中国计算机软件领

域，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名字。可即便在网络时代，许孔时的个人资料也是寥寥无几。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而数学是软件的基础。许孔时194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三尺讲台上，站着的是赵访熊、王竹溪、段学复、闵嗣鹤、周培源、华罗庚、吴新谋、胡祖焯等大师。

70年过去，许孔时曾向中国计算机史研究学者徐祖哲忆起，他大一时，在清华学堂的101大教室听赵访熊讲微积分，那个教室最大，窗户很敞亮，走进学堂古朴素厚重的大门，轻轻踩过颤悠悠的地板，有一种腾飞的感觉。直到他白手起家，撑起初创期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那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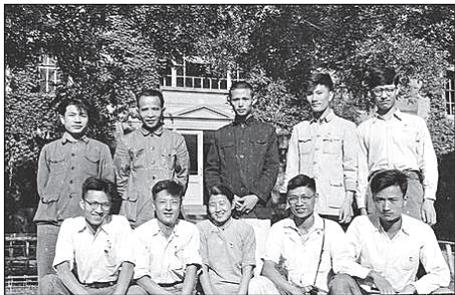
觉给了他足够的底气，那是来自大师们的学识滋养和人格浸润。

就在过去的2021年9月28日，软件所失去了这位91岁的创所所长，但他的为人已经根植在了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里。他的虚怀若谷、无为而治；他的慷慨以授、无我而行；他的宁静淡泊、纷华不染……

“什么条件都有了，研究就晚了”

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与外界隔绝，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为了打开对外往来的通道，1972年夏天，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许孔时和黄德金、张修一起访问加拿大。回国后，他们在递交的报告中，将“software”一词译为了“软件”。此后几年，国内不断有“发展软件技术和理论”的议论，但一直未有重大举措。直到1980年，德国数学和数据处理研究中心（GMD）主席克吕克贝格率团来访中国，他强烈建议中国下功夫发展软件并出口。因为软件研制，不但可以发展软件技术本身，还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没过多久，许孔时受中科院委派，随



1951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前排左2为许孔时

团一起访问了GMD的总部和下属的多个研究所，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调研，更坚定了软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此后两年多，原国家科委、原电子工业部、中科院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对发展计算机软件事业做出规划，成立软件研究机构的事宜也在讨论之列。

至此，我国计算机软件事业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规划、布局，而许孔时全程见证了这一过程。1983年，中科院向原国家科委申请组建软件所。两年后的3月1日，开始启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印章，标志着软件所正式成立。

作为软件所的创立者和奠基者，许孔时白手起家，历尽艰辛。

过去，中科院成立新的科研机构时，总是先搞基本建设——报计划、申请经费、征地、设计、施工、验收，往往需要数年。同时，调干部、设立机关各部门、购置办公设备和科研器材等，还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而软件所从计算所“独立”出来，筹备期间没有土地，基本建设问题无法解决。44万元经费和两台16位微型计算机，就是研究所第一年的全部资产。

“为什么要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从计算所分离出来？”多年后，许孔时屡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条件都有了，研究就晚了。”没有人比许孔时更清楚，中国的软件事业需要奋起直追，发展要更快一些，步伐要更大一些。为此，他喊出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口号，凭一己之力，协调各种资源。

在老同事的印象中，他总是能四两拨千斤地化解各种矛盾，让大家安心投入工作。“老所长关心我们的疾苦，很有人情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即使面临巨大的

□ 怀念师友

压力，他也从来不讲违心的话。”软件所高级工程师杨均说。如此，一帮研究人员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吃苦创业。

许孔时担任软件所所长一职近十年，其间在组建人才队伍、规划研究方向、制定政策措施、改革运行体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完成数十项国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为软件所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没资格参评院士”

在软件所，大家更喜欢称呼许孔时为“老许”。老许一向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有一次，时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秘书长的曹右琦刚推开办公室的门，就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声“批评”老许，心里一阵惊颤。

“我是恨铁不成钢。老许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华罗庚的弟子，应该是能做很多事情的。”但老许把时间都用来干科研管理了，不再专研业务，让一位心直口快的资深科学家非常不满。“你们不用来宽慰我，他说的话也有对的成分。”老许没有丝毫不快。

不止一个人对老许作为科学家的转型感到惋惜。可处在时代的湍流里，使命重于选择。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担当。对老许而言，承载他学术理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软件研究发展。

软件所创立初期，就拥有计算机界大名鼎鼎的胡世华、唐稚松、董搵美、周巢尘，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为了尽快扩大研究力量，老许还从美国、英国引进了多位海归人才。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又性格迥异，在当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软件所，能心无旁骛，扎下根来，多亏了

老许这根“定海神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研机构集体响应国家号召，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了创效益，研究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要顺应潮流，给国家创造效益，也要顶住一些过分的风气，保住基础研究。”老许提出，软件所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他不但不给基础研究室压力，还向全所宣布：“谁也不许给基础研究室气受。”当时看来也许不合时宜，但今天没有人会否认，基础研究是软件所的立所之本。

为了发展基础研究，老许一心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空间。“什么观点、什么流派，老许都充分尊重，从不打压。哪怕这个研究方向只有一个人感兴趣，他也支持他独立去做，不用归谁管。”曹右琦说。

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土壤，软件所很快着手筹备组建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事实证明，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软件所发展历程中极为关键的一项战略部署，至今都是国内计算机科学和软件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老许的带领下，一批软件科研人才



1981年许孔时（左3）访问德国数学和数据处理研究中心

登上中国计算机软件科学的舞台。作为一所之长，他对自己却只字不提。

软件所第二任所长冯玉琳和老许共事多年，从未红过脸，唯一一次冲突发生在1994年。所里决定推荐老许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还先斩后奏，把材料报到了中科院。后来消息“泄露”，老许气呼呼地找到冯玉琳，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告诉你了，这个事不就办不成了吗？”冯玉琳无奈地说。所里无人不知，老许是谦谦君子，是决不会同意申报的。

“我没资格参评院士。老冯，你今天不把材料撤回来，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冯玉琳从未见老许发过那么大的脾气，除了派人把材料撤回，毫无办法。老许不事张扬、不随波逐流，同事们耳濡目染，也塑造了研究所独特的气质。冯玉琳认为，软件所人不高调、不跟风，大家都是踏踏实实，一心只扑在科研上。

“老许的为人没法挑”

老许离开一线工作岗位25年，影响依然存在，新来的年轻人即使没见过他本人，也多少听过他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老许经常出访外国。当时，出国人员能领到一些津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老许的津贴几乎没有进过自己的口袋。他要么买一些需要的书籍杂志，要么留下来作为一笔工作基金，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有的时候就充作党费。而他自己，却连出国穿的一件大衣都要向朋友借。老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件灰色的风衣，一穿就是十几年。有一回，老许脱掉外套，露出一件毛衣，从袖口到胳膊磨出了好多破洞，却还舍不得扔。

有一段时间，老许为了帮助同事学习

英语，掏钱买了“灵格风”唱片和留声机，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前的时间，让大家边听边学，许多同事的英语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当时，一台留声机要花96块钱，是一笔“巨款”。

老许记得住当时研究所每一个员工的生日，很多人都在生日当天收到过老许的祝福电话，软件所研究员顾毓清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忘了，老许还记着”。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北京人，老许酷爱京剧，每当有外国专家来访，他总是自掏腰包请他们喝茶、看戏。

“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这样的活动多了，怎么受得了。”同事替他着急，可老许依旧“我行我素”。

1986年底，还是软件所一名年轻技术人员的孙四敏调任软件所开发公司总经理，因为经验不足，吃上了一起官司，让踉跄起步的公司雪上加霜。“但老许不仅没有埋怨我，还安慰我说，他家里有一点祖上留下的古董，如果公司败诉，就把它卖了，支持公司办下去，不让所里受损失。”多年以后，孙四敏为了帮助公司渡过难关，毫不犹豫拿自己家的房子作了抵押。因为有老许的榜样在先。

“老许的为人没法挑。”这是同事、朋友追忆他时提到最多的话。“做一时的好人容易，难的是任何境遇下，都能做到始终如一。”软件所研究员孙家昶说，“老许做人，有他自己的标准。”

老许不在了，然而他为人处世的风范深深刻在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上，成为软件所人永远的精神坐标。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2年2月24日）

思念父亲张澜庆

○张延宝



张澜庆学长

我的父亲张澜庆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可惜他英年早逝，年仅37岁。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三岁，因此我对他的记忆基本上是没有的。多年来，特别是我退休后有了闲暇，到父亲原单位即现国土资源部查档，寻找父亲的人生轨迹，搜集父亲同学朋友的回忆文章，整理父亲的笔记，才了解父亲的思想脉络，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也丰满起来。

父亲张澜庆，191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爷爷张毓英酷爱象棋，被尊称为“棋孟尝”，即中国象棋界的孟尝君。父亲是家中的老大，他有六个弟弟、三个妹妹，从小就是弟弟妹妹尊敬的大哥。中学时期，他带四个弟弟在同一房间就寝。这样的环境和经历，使他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会关心和照顾别人，遇事先人后己。

1928—1934年，父亲在扬州中学读书。扬州中学是江苏省名校，由于地域关系，大部分毕业生会报考南京和上海的大学。父亲中学时就通过报刊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对北京及清华大学很向往。为了动员同学和他一起报考清华大学，他事先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同学一一推介，动

员大家去考，发榜后，又动员他们一起北上。那一年，扬州中学有17人就读清华大学，是历年来最多的，其中有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亚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篔、扬州市政协文史委员李为扬等。

父亲进入向往已久的清华园，开始在化学系，后转入地质系。我三叔张纯青曾回忆说，大哥暑期回家总带回一些进步书籍，有鲁迅、邹韬奋、茅盾、巴金等名家的著作，可见父亲在清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父亲的朋友吴征镒在回忆录中记载，父亲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因学校放假，父亲正在扬州家中。他带着弟妹妹们到照相馆拍了两张“十兄妹”合影，此后，十兄妹再也没有团聚。

9月，清华、北大、南开迁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和两个同学从扬州乘车到镇江，搭乘客轮去汉口，再到长沙，在韭菜园附近租屋居住。11月的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父亲和两个同学正在天心阁一带散步，在日机轰炸声中，他们沿墙冒险跑回住处。路过车站附近，他们看见几具被炸老百姓尸体，特别是看到有人双手捧着被炸断了一条腿的幼儿在路上狂奔，其情景惨不忍睹。他们亲见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热血沸腾，决心投笔从戎。当年12月，父亲离开学校，进入位于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茂林对叶挺率领的新四军实行包围袭击，经七昼夜血战，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当时在江西上饶某军事部门从事绘图、看电文等工作，他得悉国民党反共的血腥事实后，愤然离开工作岗位，7月上饶到桂林，再转贵阳。同年9月，回到西南联大复学。

复学后，父亲对这个机会备加珍惜，学习更加刻苦努力。194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并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地质研究所研究生，主修岩石学（后因故休学两年）。他和同学王大纯、黄振威合著的论文《安宁盆地地质矿产》获中国地质学会1944年奖金。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唆使大批武装军人及便衣涌至联大、云大等校，并冲破联大校门，在校舍内开枪掷弹，极尽屠杀之能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惨遭杀害，伤者数十人。

12月6日，西南联大等数十所大中学校教师发表《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已经是联大教师的父亲也积极参与了罢教宣言的签名。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联举行“一二·一”运动的最后一次活动——四烈士的大出殡。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走过昆明街头。西南联大的讲、助、教阶层组织了一台路祭，特意安排在华山南路国民党省党部的门口。据吴征镒先生回忆，我父亲和很多平常不大露面但是思想倾向进步、有正义感的教师都

参加了。灵柩一露面，路祭就开始了，由陈光远司仪，吴征镒主祭宣读祭文。吴征镒说：“‘一二·一’运动前后，他（张澜庆）的思想转变了。”父亲在干部履历表里是这样写的：1945年12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吴征镒。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父亲始终头脑清醒且冷静。1945年底的一天，父亲的好友韩德馨（南菁中学教师，“一二·一”烈士于再的同事）从校外归来，传达室工友告诉他，近日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校门口想方设法找他，劝他务必小心。我父亲得知此事后搬来南菁中学，接替了韩德馨所开课程，安排他先搬往城里五华中学，并力劝他前往已考取的中航公司报到培训，放弃第二年复员回北平的想法，以防意外。在紧张应对间隙，父亲嘱咐他注意安全、冷静应对。父亲的情谊和真诚，给韩德馨带来温暖和力量。使危险之中的他，得以有条不紊地安全脱身。多年之后回忆此事，他仍难忘磨难中的同学友情。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回家途中即遭暗杀。据吴征镒回忆，8月初，他、郑尧和我父亲等最后撤退的联大师生，在离昆明之前，为闻一多师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吴征镒不得已用特务不懂、比较隐晦的文言律诗写了五章《哭浞水闻一多师》。父亲在干部履历表中是这样写的：“1946年李闻血案后在昆明担任联络小组长。”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告结束，父亲随学校返回北平。据吴征镒回忆，他和机械系的杨捷发起重新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不少助教讲师参加，我父亲是读书会

□ 怀念师友

的积极分子，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

1947年9月，父亲在清华大学地质研究所复学，攻读矿床学，导师是袁复礼教授。1948年7月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湖南临武县境内钨锡矿之地质研究》，成绩76分。

1948年初，父亲和母亲结婚，证婚人是袁复礼教授。婚后，他们住在吴征镒的清华北院半套教授宿舍里。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家里开会，母亲为他们望风。他们的桌上总是放一副牌，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几个人就开始打牌。

1948年5月，李建武、王志诚和父亲组织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主要成员为教职员，人数约20多人，是清华大学“南系”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之一。1948年12月，父亲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以及参加过国军，入党以后，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曾在笔记本上写道：“不能全部生活入党，我最大毛病。”

1949年6月的一天，父亲对母亲说：“明天在二校门公布党员名单。”母亲问：“你是党员吗？”父亲说：“你自己去看吧。”虽然心中有数，第二天母亲还是到二校门去看了党员名单。

1949年开国大典，父亲不但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而且担任了旗手（他身高1米88），回到家他很兴奋地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校旗，高呼“清华同志们万岁”。

1951年，父亲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工作，任计划处副处长兼李四光先生的秘书，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地质系教一门课

“工程地质学”。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祖国地下宝藏的新发现——两年来地质工作在探矿方面的成就》。在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地质工作是经济建设的先锋”“是制订经济建设计划时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祖国的建设，今后需要更大的努力”。

父亲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刚结婚时，母亲问他：“你不吃什么？”父亲告诉她：“带毛的不吃掸子，带腿的不吃板凳。”意思是说家里做饭不用考虑他，他什么都吃。父亲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不多，只要他在家，总对母亲说：“你身体不好，事情我来做。”吃饭时，有好吃的总是让家人先吃。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父亲的健康。入党以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生病前长期睡眠不足，健康又一次透支。母亲总说：“没想到那么高的一个人，说倒就倒了。”

1951年，我三叔张纯青（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来北京开会，考虑到朝鲜战场的浴血奋战，他和大哥（我父亲）、三妹（我的姑姑张美庆，正在北京读书）到照相馆拍照，母亲带着不满两岁的我也去了。没想到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52年5月，因脊椎结核宿疾转为结核性脑膜炎，父亲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住进人民医院。8月5日晚上8点，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他的工作单位——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很重视，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将他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碑文中对父亲做了如下评价：“对革命工作，一贯积极，不畏辛劳，对



张澜庆学长与家人珍贵留影。
左起，后排：张澜庆、张纯青，前排：张澜庆爱人刘若珠，张延宝，张美庆。

党忠诚，作风正派。”父亲的优秀品质，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母亲和父亲感情很深，她把对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终点。她一直记得1950年她生病住院时，父亲去医院看望，并告诉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事，母亲问：“你报名了吗？”父亲反问：“你说呢？”母亲说：“你那么积极的人，一定报名了。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出意外，我和两个孩子怎么办？”父亲说：“我想过了，现在是新社会，你一定能把孩子带大的。”父亲走后，母亲陪伴我们整整39年，她看到我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看到他们的第三代。

因为父亲去世时我们太小了，母亲把父亲看过的书、笔记、卡片，他穿过的衣服等，一直收藏着，无论房子大小，这些物品都保留着，夏天还要拿到太阳下晒。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对爸爸的认识，是从墙上的遗像和他的遗物开始，当然，还有到八宝山扫墓。父亲去世一周年时，母亲和姑姑带我和大妹妹延安去八宝山，我还不能明白扫墓的含义，只记得妈妈和姑姑撕心裂肺的痛哭。

每年换季时，母亲打开衣箱找衣服，

我们都要求“看宝石”，那是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三颗水晶，一颗淡紫色，一颗天蓝色，一颗浅绿色。他对妈妈说：“我有三个女儿，这三颗水晶是留给她们结婚时做戒指的。”长大以后，我才理解这深如海、重如山的父爱。虽然父亲陪伴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是三个女儿都是他的掌上明珠。父亲去世时，我的小小妹妹才8个月，现在回想，也许当年父亲预感到他不能看到我们长大，在短暂的几个月里，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1959年夏天，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的秘书找到我母亲，对她说：“李副院长让你带三个孩子到他家去，他想看看她们。”母亲不想打扰日理万机的李副院长，就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们三姊妹的照片，照片是请邻居拍的，虽然是暑假，妈妈特意让我戴上了红领巾。10月份，秘书带来了李副院长的回信，这封信给我母亲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何成钧伯伯是父亲的挚友，因为历史原因，他“回避”了我们十多年。1973年的一天，他辗转打听找到我们在科学院第二宿舍的家。妈妈很为他的深情厚谊所感动。2007年1月，何伯伯去世后，我给他的夫人张阿姨的信里这样写道：“虽然父



张澜庆学长的三个女儿。
左起：二女张延安、长女张延宝、三女张延宏。

□ 怀念师友

亲没有看到我们长大，但是五十多年来，何伯伯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们。”现在，我和何伯伯的女儿还有联系，这是七十多年的情谊。

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少与外界联系。1988年，我母亲意外地收到两本《清华十级纪念刊》，里面有父亲在大学时的照片，有同学对他的回忆，还有一段父亲的简历。这份简历十分准确，我母亲和我们三姐妹的名字、工作单位，一个字也没错。我们猜测这是何成钧伯伯提供的，只有他最清楚我家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家每年都能收到《十级校友通讯》。2006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时，我自愿去为十级同学聚会服务。主持人陈宝仁伯伯向大家介绍“这是张澜庆的

女儿”时，一位阿姨大声说：“张澜庆是我们班的。”她是化学系的，我父亲入学在化学系，后来转到地质系，72年过去了，阿姨还记得我父亲，我很感动。

1992年，我因工作关系去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亚杰先生家。讲话时，我觉得他的口音比较熟悉，就问他是哪里人？并告诉他我父亲是扬州人，1934年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他当即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当我说出“张澜庆”三个字时，他很激动，对在另一个房间的杨岫云阿姨大声喊：“杨岫云，我找到张澜庆的家人了！”

从1952年到2022年，父亲离开我们70年了。他没有走远，他的形象活在我们心里，他的不畏辛劳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不朽的张兴华

○鲁一夫

2022年7月2日，我的一个在合肥的战友沉痛地向我通报“张兴华教授走了”。仔细地看了一遍讣告，泪目中，蓦地，六年前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1946年出生的四川自贡人张兴华比我大11岁，绝对是老大哥，但当兵却比我晚了几年。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合肥，他可是个人物，名气大得很。1970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1979年3月入伍参加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筹建，1985年1月入党，大校军衔。2006年9月从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信息对抗系微波教研室教授岗位上退休。为中共合肥市军休一所第四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合肥市关



张兴华大校遗像

爱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报告团宣讲团成员之一。

退休后，张兴华教授一直潜心抗战文物收藏、抗战历史研究，义务为群众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2013年，在自己家中建成“抗日文物陈列室”，开展展



张兴华为参观的孩子们作现场讲解

示他收集的抗战文物。2020年，张兴华教授荣获“合肥市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2021年11月，又将陈列室提升转型为“抗美援朝文物陈列室”，进一步增加爱国主义教育成分，为军内及安徽百姓称道。

张教授很忙，身体又不太好，当得知我也曾是军人、革命后代、从天津来的作家后，热情地邀请我来家中一叙。我带上自己的两套文集，在战友陪同下驱车来到位于蜀山区的合肥市第一军队干部休养所。

张兴华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完美。作为教授，他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儒雅绅士，作为大校他更没有挺拔的威严，倒是像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没有一点“高干”架子，仿佛经年沉浸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之中。

他黝黑的脸上呈现着疲惫，眉宇下的目光炯炯有神、很有穿透力地在透视我的心底，一件普通的灰色运动衫松垮垮地穿在身上，显得不太协调、浓密的头发没有梳理乱糟糟的不见形状。

在院子里，张兴华老大哥热情地和我寒暄握手后，把我带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一个楼栋里20平方米的地下室，楼道里有些昏暗，邻居们大都作为储藏室

抑或干脆废弃不用，可他却“物有所用”，一个人把它鼓捣成了一座有图片有实物有文字有书籍的“抗战文物陈列室”。

打开铁门通了电，眼前豁然开朗，墙体的四周镶嵌着他收集的抗日战争各个战场及根据地的照片，国共两党将士们威武的英姿。展柜里日军使用过的军服、军用物资、武器、弹药箱、宣传品琳琅满目，完全是按照一座小型展览馆设计的。

在他的解说介绍下，我目不转睛地观看着他的每一件呕心沥血的收藏，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鬼子当年的惨烈厮杀。

作为军队院校的一名教授，张兴华除了对抗战各个阶段如数家珍，为还原历史，他还倾尽所有在世界范围内找寻战争遗物，有的藏品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都没有。那年，他将部分展品拾遗补缺，捐赠给了渡江战役纪念馆，一时传为佳话。

除了地下室“抗战文物陈列室”的展品，楼上他朴素的师职干部住宅里也是摆满了抗战文物。退休后，他常常“千里走单骑”到各地的纪念馆、古战场、文物市场、大小地摊，收集抗战时期各种物品。包括士兵钢盔、刀剑、水壶、军服、画册、宣传品、报纸、日记、书信、照片，他的退休金一多半用在“淘宝”上，有时囊中羞涩便写个字据欠条随后给人家把钱送去。

知识渊博的兴华教授是民族精神的殉道士守护者。他的每件藏品，无论大小，背后都有其或隐或显的故事，这也是他沉迷其中的缘由和乐趣。他的那份沉醉、那份幸福的神情，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年，那般执着，那般投入。

客厅里，他把日军、美军、德军各个

□ 怀念师友

战场收集来的钢盔、战刀摆在桌子上拿给我看，如数家珍地介绍文物的出处，娓娓道来当年文物引出的故事。一激动，我穿上他收藏的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大衣和德军头盔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在他的滔滔不绝中，耐心倾听他讲的历史，令你惊奇，令你震撼，令你思考，令你激情澎湃，令你痛苦不已。他的家岂止是一个小小的陈列室，而是一部恢弘的战争大片，这里演绎着中国人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这里铸就了一部历史的丰碑。这里有痛苦的呻吟，这里有刀光剑影，这里有血流成河。这里有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这里有国际友人的无私援助，这里更记录了炎黄子孙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有的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你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常人的路，艰难而持远，张兴华就是这样一条道走到底的人。

为何搭上自己几乎所有积蓄做这件事？这是张兴华回答了无数遍的问题。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的话无疑是他创建“抗战文物陈列室”最根本的目的。

我问他：“你这样倾囊所为图的是什么？是不是有点儿傻？”张兴华不苟言笑地说：“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记忆，作为中华民族之子，守护民族记忆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吗？”我伸出了拇指，一声“功德无量”，对他顿时肃然起敬。

千秋之后，百代更替，后人要了解这段屈辱惨烈的历史，他的“抗战文物陈列室”就是一座丰碑，此举不可不谓厥功甚伟。

递年间他付出的辛劳艰难姑且不论，

仅是那非常人所想的胆识和气魄，就叫人不能不俯首，你怎能不为他感动？

这些年，经历了那么多的跌宕起伏，研读了那么多的沉重历史，收藏了那么厚重的历史文物，张兴华愈来愈感到肩上扛着的责任重大。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张兴华把毕生收藏的革命历史文物拿出来，举办展览纪念活动，期间还邀请志愿军老兵、老兵亲属共同见证纪念活动。他多次到社会机关学校进行宣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给国家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

有一种气息是红色的，畅游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每个时代都零星点缀着殷红，那便是民族残留的印迹，纵贯古今。血管里流淌着炽热红色的张兴华教授走了，他肉体敌不过岁月的流逝，终将归于尘土，唯他的精神永生。真正意义上的不朽，只能是精神层面的不朽，因为多年之后，只有精神能够长存，被世人所铭记。

如今，我的手机里仍然保留着许多在张兴华教授家的照片，每次翻看那一张张张照片，都不禁勾起我对他的怀念，他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怕是永远刀劈斧凿在我的心底。

张大哥，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难别亦难。生命苦短，76岁的生命不算长寿，你短暂的生命却在绚烂的瞬间定格永恒。你强大的磁场，与你亲近便被辐射吸引。若仔细品味，便不由自主地被你征服，这，就是你的魅力，一股不朽的魅力……

不朽的张兴华，一路走好。

2022年7月3日



缅怀西南联大杰出校友胡邦定先生



胡邦定学长

2022年6月1日，西南联大杰出校友、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胡邦定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胡邦定，江苏镇江人，1923年生。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休学一年，任建民中学教员，194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同年到天津《大公报》工作，曾任记者、编辑、编委、党委书记等职。1973年调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副局长等职，1994年离休。1981年《价格理论与实践》创刊，任主编达25年。曾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一书，著有《市场杂记》《鸿爪集》和《联大杂忆》。他曾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长期负责《西南联大校友会简讯》主编工作，笔耕不辍，为西南联大精神传承弘扬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胡邦定积极投身于进步活动。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转入低潮，在校内低迷的政治空气中，胡邦定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僧音社”合唱小组，

到1944年下半年又发展为“高声唱歌咏队”。他们以“我们要为光明而歌唱”为口号，传唱了大量的爱国进步歌曲。“一二·一”运动中，“高声唱歌咏队”振臂高呼，在学生中传唱《告士兵》《告同胞》，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他们还在四烈士的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中唱响《安眠吧，勇士》和《烈士挽歌》等歌曲，深深地影响了广大师生和昆明的市民，让人们永远铭记四位烈士为争取民主、反抗黑暗所作出的牺牲。

1944年，胡邦定负责起了联大历史系主办的壁报《潮汐》，组织同学以文字为武器，对时局、对政治、对社会、对生活发表意见。《潮汐》同其他进步壁报一道，针砭时弊，在西南联大的“民主墙”上熠熠生辉，成为联大爱国学生运动的独特风景。

1945年，在同学李凌的推荐下，正在



西南联大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全体理事祭扫“一二·一”运动烈士墓后合影。前排左1为王松声、左2为傅冬菊、左3为缪祥烈、左4为胡邦定

□ 怀念师友

读大三的胡邦定决定休学一年，前往云南建水县的建民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由中共地下党支持办学的学校，校长刘宝煊知人善任、思想进步，还有着一大批热心革命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在建民中学任教期间，胡邦定和马识途、裴毓荪等联大学生恪尽职守、笃学力行，一起组织推动先进文体活动，通过朗诵、合唱、话剧等形式开展革命教育。在物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建民中学逐渐成为一个红色堡垒、革命摇篮。

1946年，胡邦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扬的爱国主义情怀、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联大教授们的精神风范，成为

了胡邦定心中难以忘怀的联大记忆。他曾谦逊而又满怀深情地写道：

“我是个很平庸的学生，在学术上毫无成就，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但我能勤勤恳恳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从不趋炎附势。应该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我想，这是联大教育我的结果。联大有许多学富五车的老师，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教学岗位；联大有许多同学，刻苦钻研，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终生辛勤奉献。这些都是我的榜样，也是联大教育的成果。总之，我感谢联大增我智识，教我做人！”

（西南联大博物馆）

装甲兵工程学院原院长黄庆华学长逝世

装甲兵工程学院原院长黄庆华学长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6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黄庆华学长1929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衡山。1946年10月至1951年7月在清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就读，后转工学院机械系学习。1947年6月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1月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系”地下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

1951年8月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1952年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参与筹建装甲兵工程学院，1963年晋升为副教授，任教研室副主任。1975年调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兼总工程师。1985年调装甲兵工程学院，历

任教授、专家组长、副院长、院长。1988年9月授予少将军衔（正军级）。1994年离休，荣获胜利功勋荣誉章。

黄庆华学长在清华学习期间，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参加学生运动，联系进步学生，发展党的组织。在保护学校和迎接解放的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黄庆华学长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1958年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积极分子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他的研究和设计成果获哈军工科技一等奖，立一等功。黄庆华学长于1978年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他作为总工程师领导的研究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他曾担任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和军事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黄庆华学长为军队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91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深切缅怀建筑史学家孙大章先生

我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顾问总建筑师、建筑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孙大章先生，因病于2022年6月18日在京逝世，享年89岁。

孙大章出生于1933年5月29日，籍贯天津。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是新中国培养的较早一批建筑学专业人才。1958年就职于由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创办的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至2016年荣休，为我国建筑学和建筑历史研究事业勤恳奉献六十余载。孙大章先生曾任中国紫禁城学会顾问、中国文物学会民居学术委员会顾问、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常务理事。

孙大章先生致力于中国民居、清代建筑、古建筑彩画、佛教建筑等方面建筑历史学研究，赓续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传统，数十年往复求索于田野和案头之间，深入开展全国范围古建筑实地调查、测绘和研究工作，足迹遍布新疆、青海、宁

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贵州、云南等中国绝大部分省市城乡地区，将全部学术热忱挥洒在祖国大地，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为全面系统地开展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建筑装饰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孙大章先生笔耕不辍地完成了《中国美术全集·宗教建筑卷》《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彩画》《承德普宁寺》《中国佛教建筑》等数十部学术专著，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卓越的系统思维，为我国建筑历史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大章先生是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实践者。1959年参与编制北京长安街详细规划方案，1960—1970年间完成湖北、河南等地多项工业和民用建筑设计，1985—1992年间主持山海关地区六组古建筑复原工程设计项目，此后还参与三亚南山佛教文化园、无锡灵山胜境等文化类建筑设计，积极探索了将传统建筑审美和文化底蕴融入当代建筑设计的途径。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七律·怀念敬爱的范钦珊老师

○王社民（1977级力学）

千山飞越从头迈，大师怡然启讲台。三心四责贯始末，鞠躬尽瘁育英才。
天堂盈情终长久，人间博爱永不衰。自强不息桃李满，厚德载物耀光彩。

“三心”为事业心、责任心和良心。“四责”为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学校负责和对国家负责。

邹光华学长逝世



邹光华学长，2022年6月6日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5岁。

邹学长1927年11月14日生于江西省萍乡市。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1997年11月离休。离休前任地质部物化探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邹光华学长从进入清华大学开始，就加入到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先后参加了1946年地下党领导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1947年5月20日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8年抗议国民党政府传讯与逮捕北大、北京师院同学的“四九大请愿”，以及1948年举行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九游行请愿”等。

大学期间，邹光华学长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大量进步书刊。通过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育和革命书刊的思想引导，她树立了终生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伟大理想，踏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1947年12月加入了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部工作，邹光华学长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中，当年10月就赴安徽铜矿外围承担物化探普查。1953年到甘肃永登白银长铜矿承担物探评查，1959年又在此进行方法试验与异常评价。其间，1954到1959年她在地质部物化探局专家组工作。1960年在河北北部进行区域物化探工作。1961到1966年在地质部物化探局综合处承担物化探技术管理工作。1976到1978年参加了四川西昌富铁矿普查勘探会战工作。长期的野外工作和技术管理工作使她具备了深厚的物化探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1971到1975年，邹光华学长随丈夫徐乃明到山西太原，调入山西矿业学院工作。在这四年中，她领导新建了地质系，建成了五个试验室，加强了师资力量，培养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和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1978到1997年，邹光华学长一直在地质部物化探局工作，历任副总工程师、局长兼党委书记、综合研究室顾问。

邹光华学长毕生从事物化探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在固体矿产物化探与区域物化探工作方面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领导编制了物化探、遥感工作“七五”计划，提高了地质找矿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在新领域的技术应用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推动我国物化探工作的全面开展及开拓早期遥感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邹光华学长的去世，是中国物化探和遥感领域的重大损失，更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一大损失。邹光华学长的精神、品质和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

送别丁文魁学长



2022年8月10日，丁文魁学长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8月20日上午，丁文魁学长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天津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玉林、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张翼与丁文魁学长的亲属和生前好友三十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清华大学校史馆馆长、档案馆馆长范宝龙，清华校友总会联络部部长田星燕也参加了追悼会。清华校友总会、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敬献了花圈。

丁文魁学长1939年3月18日出生在黑龙江省阿城县，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4年6月2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获清华大学毕业生优良奖状。1964年8月分配到核工业集团（原二机部）理化工程研究院（原605所）工作，先后在第六研究室担任政治指导员、检验仪表科副科长、器材处处长，高级工程师，多次荣获院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4年7月任理化院副院长至2000年退休。曾任《核工业教育》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核工业教育学会副会长。

丁文魁学长从2000年退休起，就义务为天津校友会服务。2006年6月开始担任第七届天津校友会副秘书长，2012年9月担任第八届校友会常务理事、校友会顾

问，2019年4月担任第九届校友会顾问、理事会监事直到逝世。2021年获天津校友会颁发的“校友会工作功勋奖”。

丁文魁学长从2000年起负责组织编辑校友通讯录，2001年4月编辑完成了第一版《清华大学天津校友通讯录》，将近1500名校友收录其中，之后不断编辑补充，使校友联系有了依据。2006年起负责主编天津校友会杂志《清华校友苑》，直到2022年第33期。在编辑杂志的同时，他将电子版资讯通过邮箱发至每位天津校友，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丁文魁学长从2011年起负责主编校友会小册子《在清华等你》，每年一册，直至2018年，这本小册子受到中学生、家长的追捧，成为天津校友会的“名片”。

丁文魁学长是天津校友会和母校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他每年都多次前往校友总会，为校友们办理各项事务，为《清华校友通讯》提供稿源，自己也撰写了大量的校友事迹报道和回忆文章，深受校友总会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鉴于丁文魁学长对校友工作的贡献，清华校友总会于2009年授予他“清华校友紫荆奖”，2017年授予他“清华校友工作杰出贡献奖”。

丁文魁学长22年为校友会义务“打工”，认真负责、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事迹感人、可歌可泣。

继承丁文魁学长的遗志，将校友会工作搞得更好，以实际行动告慰丁文魁学长在天之灵，是我们天津校友最好的追思！

（天津校友会）

徐叙瑢院士逝世 享年 100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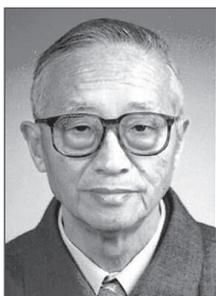


徐叙瑢学长，因病于2022年7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徐学长1922年4月23日出生于山东济南，1941年至1945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至195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被中国科学院派往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深造，在苏联科学院获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中国科学院激发态物理开放实验室、天津理工学院

材料物理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学长为我国发光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发光物理方面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中国固体发光学领域的空白，奠定了中国发光学的基石，使我国的发光学科研究技术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创造性提出了“分层优化”方案；发现了固态阴极射线发光，提供了崭新的场诱导发光方式，在国际上首创了第三代场致发光模型。曾获1991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之星、1999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荣誉和奖励。

於崇文院士逝世 享年 98 岁



於崇文学长，因病于2022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於学长1924年2月15日生于上海，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学习，1950年北大地质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并入刚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先后任教于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顾问，国土资源部地质调

查局顾问，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顾问，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委员、顾问，元素地球化学与区域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长期致力于将基础自然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理论与地球科学相结合，先后开辟和发展了5个创新的学术领域——地质-地球化学中的多元分析、区域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动力学、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成矿系统的复杂性，促进了地球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

建筑学院郭德菴教授逝世 享年92岁

我国著名水彩画家、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德菴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郭德菴先生1930年1月生于陕西省华县。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并受聘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任副教授，担任建筑学专业美术教学直至退休。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水彩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画》杂志编委。他一生创作的美术作品丰富，佳作纷呈，多次入选国内及国际大型展览并屡次获奖，许多作品被相关机构收藏，还多次在国内外的画廊举办了个展，被载



入《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他在教学期间勇于探索创新各种新材料、新技术，用新的形式表现新的构成和意境，把同学们带进了一个独特美妙的艺术世界，为我国当代建筑学科美术教育奠定了基础。

（建筑学院）

● 悼念简讯

吴麒学长（1952届电机），因病于2022年7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吴麒学长1952年清华电机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5年作为研究生公派赴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电机系学习自动控制，1959年获得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后，他加入清华新成立的自动控制系，先后担任自动控制系控制理论教研组副主任、主任。1979年，吴麒教授随控制理论教研组转入自动化系，曾任教研组主任、系副主任、系学位分委员会主席。吴麒教授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深耕于控制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控制理论特别是多变量频率域控制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茂新学长（教），因病于2022年6月18日在京逝世，享年66岁。孙茂新学长1955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1970年参军入伍，曾受嘉奖两次。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复员后分配至中科院感光化学研究所，曾任研究所团委书记。197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分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入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历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代理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教育处副处长、新闻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退休后返聘于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曾获清华大学优秀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者、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重读关广志先生

——《灿然天地》读后

○马国馨（1965届建筑）

今年6月23日在公司开会时遇到刘淼总，他带给我一本厚厚的画册，这是由著名的水彩画家关广志先生的哲嗣关乃平先生编的“北京画院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学术丛书”之一，书名《灿然天地》，副题是“关广志绘画艺术研究”。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1月出版，全书共355页，收入了关先生的水彩画作62幅，铜版画作16幅，另外还有学术和回忆文字、关先生年谱等内容。

除了得到好书高兴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是关广志先生水彩画的崇拜者，我这样讲是因为有画为证。收到画册以后，我就从早年收藏的各种画片中翻找出了19幅关先生的画作。除两幅是重复的以外，最早一幅是我在1955年买的关先生的《北京中山公园》的画片，由上海人美出版，至今已经67年了，仍保存十分完好。接着又在1956年买到了天津人美出版的三幅画片《颐和园秋景》《颐和园》和《中山公园紫藤古柏茶社》，1957年买到上海人美出版的《北海小西天》画片，这些画片都是定价5分钱一张。

最让我高兴的

是在1957年还买到了关先生的一套画片共12张，总题目为《江山如此多娇》，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7800套，售价6角，平均下来还是5分钱一张，所有这些画片至今都完好无损。在与画册中收藏的画作对比以后，还发觉我收藏的画片中还有五幅并未被收入这次获赠的画册之中，分别是《北京北海小西天》《北海小西天》《北京北海琉璃阁》《北京颐和园后山乾隆塔》和《华山西峰》。而且《江山如此多娇》画片集的出版一事，也未能列入先生年谱之中。这些画片中现在看上海出版的色彩还好，河北的就有失真了。我把这些一个甲子以前的画片拍照发给了刘淼总，他连说：“太棒了，太珍贵了！”并马上转发给了现在日本的关乃平先生，乃平先生十分兴奋，连说：“太有意义了，太好了，有历史意义，文物价值。”

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喜欢关广志先生



《北海小西天》



《北海琉璃阁》



《华山西峰》

画作的中学生，即使上了大学以后也对关先生的生平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已经在入大学的前一年，于1958年去世。直到这次看了先生的专集，才知道先生出生于1896年，满族人，在中学就打下了良好的中西美术基础，27岁起开始跟随英国女画家学习，接受严格的素描和水彩训练，29岁时从沈阳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发表作品、参加展览、各地考察。36岁（1931年）赴伦敦，入皇家美术学校学习，去欧洲各地考察写生。1934年39岁时回国，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北平艺专、华北工程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等校教授美术。1953—1954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

画册中收入了杨付恒先生发表于《中国美术报》的一篇文章《关广志与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的美术教育》，文中提到梁思成先生在创建清华大学营建系时说过：

“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宽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根本的是，他应是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综合艺术家。”所以梁先生在建系之初就特别重视学生的美学素养教育，注重建筑与绘画、雕塑的美学，在当时的工科大学里，开设有素描、美术、雕塑（选修）等课程。在大学六年的学习中，美术课的学时占到总学时的十分之一，另外还有两周的水彩实习。

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的美术教研组的教學力量配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最早的教师李宗津先生（1916—1977）是油画家，于1947年来清华，他的叔父就是名画家李毅士。1948年来系的李斛先生（1919—1975），擅长国画人物。美术

史家王逊先生（1915—1969），1949年来清华，在哲学系和建筑系主讲美术史，还有雕塑家高庄先生（1905—1986）等，都是术有专攻的名家。但后来他们分别在1950—1952年间先后调往中央美术学院。所以在1952到1953年间，先是通过院系调整到清华任教的有关广志和雕塑家宋泊先生（1911—2012），还有1950年回国的吴冠中先生（1919—2010）。与此同时又有一批中央美院的毕业生陆续来到清华，如较早毕业，在1952年同时来清华的华宜玉先生（1922—2005）和康寿山先生（1917—），后来还有1951年毕业的程国英先生（1922—1967）、1952年毕业的曾善庆先生（1932—2020）、1953年毕业的于学信先生（1929—1980）、王乃壮先生（1928—）、付尚媛先生（1933—）、郭德菴先生（1930—2022）等人，这样一来美术教研组的教學力量陆续充实。其中关广志和吴冠中二先生是留英、留法回国，而关先生的年资辈分最高，是中国第一代的建筑水彩画家，所以在1953年以前，清华建筑系中，美术专业只有王逊、高庄和关广志先生是教授职称，其他多是副教授



关广志先生和清华建筑系学生

□ 荷花池



《中山公园》

或讲师。再之后华宜玉先生是1985年、王乃壮先生是1988年评为教授。再后梁鸿文先生是1953年入学，1959年留校去美术教研组，估计是加强对教研组的领导力量。我们1959—1965年在校学习时，基本就是这一批中央美院毕业的老师在教我们，他们原来都是油画、国画、雕塑等专业，但是为了清华的建筑教育事业，重新在水彩教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敬重和热爱。

听说关广志先生来清华后，是王乃壮先生做他的助手，我特地打电话问了一下王先生，他已经95岁了，但记得很清楚：“我那年刚毕业，就让我当他的助教。关先生的水彩画得很好。那时都六十多岁了，还每天从城里骑车到清华来给同学上课。”我还问王先生：关先生怎么才在清华待了一年？他说可能是到了退休年纪了吧！王先生还记得关先生的儿子也曾到过他家里。

对关先生水彩画的印象最初是从《中山公园》和《天坛》两幅名作而认识的，无论构图、光影、色彩、技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在大学学了水彩课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展览馆曾举办过一次英国水彩画展，也感受到关先生对英国

传统水彩技法的继承，特别是威廉·特纳那种的渲染色彩搭配，透明中稍显厚重的风格。他在清华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仍为清华建筑系“水彩画的辉煌成就播下了种子”。例如华宜玉先生的画风就明显受到关先生的影响，她的《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是我们在校时她最精彩和成功的作品之一。另外关先生在颐和园中的许多著名画作，如《佛香阁》《玉带桥》《鱼藻轩》《后山》《湖山真意》《远眺玉泉山》等都是我们后来水彩实习时的标准地点和角度，以至我一直揣测关先生的这些作品是不是在清华时为同学们示范的范作。也正因为这一点，我马上就发现了画册中一幅画的题目标注错了，把“湖山真意”标成了“湖天真意”，因为在那里我就画过两三张画稿，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此后我也陆续收集了一些有关关先生学术评论的文章，对关先生的成就和在水彩画界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水彩是一个外来画种，从1715年传教士郎世宁来华教授画画开始，水彩传入中国已三百多年，在这期间，从外来的水彩到“中国水



《天坛》

彩”，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进程。2005年中国美术馆曾举办过“中国百年水彩画展”，后来在2015年初，又举办了“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梳理了百年以来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发展历史。在这次展览中，通过对几位艺术大家——关广志、李剑晨、潘思同、王肇民、阳太阳、古元、哈定等人作品的研讨，总结出他们对水彩艺术语言的拓展和创新，从而引发水彩风格的不断演进和变革。在美协水彩画艺委会主任诸迪的文章中写道：“在这些画家中，关广志与李剑晨是第一代专业水彩画家，素有‘北关南李’之称。关广志早年留学英国，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在绘画语言上，他将西方水彩艺术明丽优雅的特点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气韵笔法相糅合，以亚麻布、原色卡纸和背托宣纸的水彩画纸作底，用碳铅勾勒轮廓，施以水彩颜色进行创作。有时为了加强画面效果，他还在水彩颜料中调和中国画的矿物质颜料和意大利进口称为‘潘普拉（penpra）’的白色颜料，从而创作了一批富有感染力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不透明水彩艺术作品。”

杨仁恒先生认为：“关广志先生的建筑水彩画，一是强调表现建筑物结构的严谨、规矩；二是强调用色彩表现光影对照的鲜明、强烈；三是强调艺术整体语言的运用，点、线、面表现得坚实有力、生动准确；四是强调对建筑物神韵、意境的体现，使建筑主体置于协调的优美环境之中。他的作品格调清新，色彩明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体现了古建筑的庄重与沧桑，又不失水彩艺术的特色，深受建筑学师生的喜爱。”

另一位美术评论家方亮认为：“关先



《佛香阁》

生对英国传统水彩画法的继承表现为‘缝合法’，即组织各局部进行渲染块面，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画面的技术。作画时为了避免两种色彩的互相晕染、渗透而形成败笔，会先留出一条小缝隙，待颜色渐干后再处理这条缝隙，是西洋水彩画中的特殊技巧，其作品如《佛香阁》。又如‘纸上混色法’，即不在调色盘上调色，而直接在画纸上混色，这样色彩更加自然、不呆板而富有清晰的特质，作品如《九龙壁》。又如《天坛》，使用颜料是不透明的水粉，其画法近于油画，先用色纸形成基本色调，然后以稀薄、单纯的颜色画暗部，用厚重、明度高而又覆盖性强的颜色画亮部。有时还掺以中国画的朱砂、石青、石绿，使画面更加丰富、响亮。”所以评论家认为“欧洲风景画对关广志的影响，技法与理论层面多于文化层面”。他的水彩“还保留着中国画传统的用笔与特定的图式”从而“努力建构属于中国味道的‘东方色彩’的水彩画，这实为中国画家践行西方艺术（水彩）本土化、民族化的重要一步”。

关广志先生去世至今已经64年了，我作为一个从事建筑工作的美术爱好者，通过自己早年所收藏关先生的作品的回顾，通过自己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所受到的美术

□ 荷花池

教育，时隔一个甲子之后，在当前的语境下对关广志先生的水彩艺术创作进行再发现、再认识、再学习，虽十分肤浅，但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篇文字表达对于先生的尊崇和怀念。我想中国的水彩画界会永远铭

记关广志先生，清华的美术教育也不会忘记关广志先生。最后还要再次感谢关乃平先生赠我画册，这将与六十多年前的画片一起成为我对关先生永久的纪念。

2022年6月27日

拙笔铭记历史 告慰清华英灵

○田 芊（1970届精仪）

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多年来，始终与祖国同行，将学校使命与国家兴亡、民族荣辱紧密相连，为振兴中华奋斗；始终与时代俱进，以育人为学校根本任务，造就了成千上万个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人。在这些清华人中，最令人敬仰的、有代表性的，是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清华英烈们。我们应当时刻铭记历史，永远缅怀可敬的革命先烈。郁达夫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清华党委决定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英烈名单，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印了《清华英烈谱》，英烈扩充至65人。他们大多是清华的学生，其中有女性3人（陶守文、纪毓秀、潘琰）；也有教师（其中阎裕昌是实验室管理员）。在他们中间，年龄不到30岁的有48人（占74%），其中20岁以下的有3人（孙世实、缪弘、李鲁连），最小的李鲁连才18岁；30~40岁的有11人；40多岁的有6人（杨光注、阎裕昌、齐学启、杨潮、闻一多、黄竞武），其中闻一多最年长为47岁。

这些清华英烈们曾经在清华学习、工

作和生活过，然而为了理想与信念、为了民族和国家，却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在祖国大地这片热土上。清华英烈们短暂的一生，日月同光，人天共仰。我注视着他们的遗像，虽然一个一个面容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年轻，正值青春洋溢之时。冥冥之中，我想画清华英烈的群像图，留下我们永恒的记忆和怀念。

为什么想画像？因为我想用图像来记载历史。还原历史，某些方面图像胜于文字，因为用文字来描述，即使再准确生动的语言也只能描绘出一个轮廓和特征，远非图像那么一目了然。虽然图像照片，只是记载了历史的局部和瞬间，但图像是最直接、直观地反映出历史原貌，是最生动、形象的历史记载。

20世纪以来，历史更多地被记录在图片影像里。我认为，照片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但是让许多短小的历史空间变成无限；摄影是一种“瞬间的艺术”，可以让许多真实的历史瞬间变成永恒。历史老照片堪称珍贵，因为由这些现存零碎的图片，能再现已逝去历史的原貌；从这些业已模糊的图像，能还原已消失历史的清晰。所以，为了更好地记载清华校史，我们应

多多注意历史老照片与影像的收集和保存。

为了画像，首先需要收集原照片。我在收集清华英烈照片时，起初感到有不少遗憾，因为这些照片中有不少模糊不清，有的还遗缺。我十分感慨，这些人只留下模糊的身影（有的人还没有），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并强烈感到，如果给后人留下英烈们清晰的影像，也许是最好的纪念。在这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刘惠莉、王向田、袁帆、范宝龙、卢小兵、金富军、冯茵等）的热心帮助及鼓励，总算收集齐全了全部65位英烈的照片。可惜的是，在这些照片中，有一些不够清楚，有一张照片因阴影而只有半张脸（吴新之），还有一张照片只有脸的一部分且很不清晰（彭国珩），只能寄希望今后有新的照片发现以弥补。

为什么画钢笔画像？因为我画钢笔画是重拾儿时的兴趣。画画是我从小的业余爱好，钢笔画花钱不多，那时一支沾水笔和碳素墨水就可以了，而“小人书”连环画是我的“老师”。我很多年没有画了，虽然钢笔画像简单些，但我深知其难。因为钢笔画是用线条表述，只有黑白、粗细之分，要画好不易。可正是由于钢笔画无色彩只有黑白的局限，恰好符合老旧照片的还原，从中可以接近看到真实的面容身貌。所以，我先尝试着画了《不忘清华先贤——清华校领导》《两弹一星元勋中的清华校友》等，得到肯定，增加了我的信心。

我的绘画技艺及水平确实是不高，唯有尽心下笔才行，只希望画的形能像一点，更能神似一些，让褪色的照片重现原有的光彩。为更好地还原英烈的面貌，我画时适当做了一些处理，如：原照片不清晰之处，尽量补实细化一些；为画像统

一，有个别戴帽子的在画时全都摘除了（如韦杰三、石文元）；又如：画时我有意突出了眼睛，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清华英烈们一双双眼睛中所透出的神色，仿佛可以看到他们身上蕴藏着的清华魂——人生坚定的信念，流露出的清华情——生命长青的信息。

由于好久没画我感到手生疏了，但画着画着找回了些许感觉。还自我觉得技艺似乎有点长进，逐渐适应了新画笔“水笔”的用法，并学习中国画中的“皴”和“擦”技法，有了新的画法。然而，我的绘画水平有限、笔墨不精，这些人物钢笔画只能粗看，不能细瞧。现在计算机图像技术已越来越先进，可以将模糊图像变得明晰、将黑白图像变成彩色，这就弥补了钢笔画的不足。我寄希望，如果能够运用计算机制图技术，那将会更好地还原清华英烈们的老照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记录下更多的历史。

因新冠疫情，我闭门宅家正好无事，终于两个月内将清华英烈65位画像全部完成。因为画的都是清华人，画清华人物可以重温清华校史，所以一边画一边回顾清华的历史，感受清华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清华英烈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壮行点燃了革命烈火，谱写下一篇篇英雄华章；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点缀了中华大地，矗立起一座座不朽丰碑。他们是清华无比的骄傲，是清华人永远的楷模！

为了用拙笔铭记清华历史、告慰清华英灵，我画下了清华英烈的画像，并写下作画时的记事与感悟，谨此予以深切的缅怀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清华英烈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清华英烈画像



韦杰三
(1903 - 1926)



施滉
(1900 - 1934)



顾衡
(1909 - 1934)



沈崇海
(1911 - 1937)



张甲洲
(1907 - 1937)



邓维熙
(1914 - 1938)



何懋勋
(1917 - 1938)



孙世实
(1918 - 1938)



陶守文
(1915 - 1939)



岳岱
(1917 - 1939)



熊大缜
(1913 - 1939)



王鉴览
(1917 - 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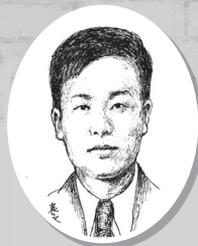
纪毓秀
(1917 - 1939)



祁延霖
(1910 - 1939)



袁时若
(1910 - 1939)



袁永懿
(1911 - 1940)



彭国珩
(1915 - 1940)



张凤阁
(1909 - 1940)



齐振铎
(1916 - 1940)



陈定达
(1902 - 1940)



钱昌淦
(1904 - 1940)



凌松如
(1913 - 1940)



郎维田
(1912 - 1940)



解树魁
(1913 - 1941)



吴新之
(1913 - 1942)



杨光注
(1900 - 1942)



黄诚
(1914 - 1942)



阎裕昌
(1896 - 1942)



李冠英
(1911 - 1942)



姚名达
(1905 - 1942)



黄维
(1918 - 1942)



朱谦
(1918 - 1942)

□ 荷花池



崔明川
(1918 - 1943)



李忍涛
(1904 - 1943)



杨学诚
(1915 - 1944)



戴荣钜
(1918 - 1944)



王文
(1922 - 1944)



朱悔吾
(1920 - 1944)



李嘉禾
(1919 - 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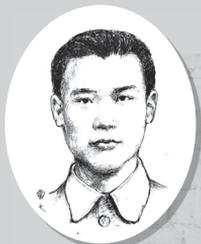
沈宗进
(1923 - 1945)



齐学启
(1900 - 1945)



吴坚
(1921 - 1945)



雷本端
(1920 - 1945)



缪弘
(1926 - 1945)



曾仪
(1916 - 194?)



吴若冲
(1913 - 194?)



潘琰
(1915 - 1945)



李鲁连
(1927 - 1945)



钟青援
(1920 — 1945)



杨潮
(1900 — 1946)



闻一多
(1899 — 1946)



石文元
(1909 — 1947)



王昊
(1920 — 1948)



钱泽球
(1920 — 1948)



曾庆铨
(1924 — 1948)



钟泉周
(1919 — 1949)



吴国珪
(1921 — 1949)



江文焕
(1919 — 1949)



黄竞武
(1903 — 1949)



齐亮
(1922 — 1949)



刘国鈺
(1921 — 1949)



荣世正
(1923 — 1949)



陈月开
(1923 — 1950)



万家义
(1928 — 1950)



陈虞陶
(1922 — 1950)

新清华的一代人

○侯宇燕

我想谈谈一位已不在人世的清华老师王震寰。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记得他呢？也许，以他的性情，也不需要为人所念。我惟有悄悄在心中回忆那些过去的图景，虽然这回忆也“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1987年的初春，因病休学的我，有幸于每周末下午，随母亲去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那有着圆形大穹顶的阶梯教室，听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组织的教工音乐欣赏课。惊鸿一瞥，从此这些旋律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审美情趣。

“中国民乐”的讲解者就是清华音乐教研室的王震寰老师。现在我仍保留着那时的讲义。顺便提一句，1993年，坊间轰轰烈烈评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我无意中于报纸刊出的作者名单中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

王老师刻印的讲义，从《诗经》始，到《楚辞》《梅花三弄》《阳关三叠》

《胡笳十八拍》，直至各地域各时代的民歌小调，甚至当时刚刚播映的《红楼梦》插曲都有。词、谱一应俱全，连相应的文学背景资料也配备详细，厚厚的一大摞，字迹整齐划一，清晰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王老师还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如有兴趣，还可去音乐教研室录这些音乐的磁带，一元钱一盘，共三盘。因为无论乐曲还是民歌，其演奏者、演唱者都是最出色的“大腕”。譬如有刘德海演奏的《十面埋伏》、闵惠芬演奏的《二泉映月》、施鸿鄂演唱的《满江红》、佟铁鑫演唱的《对面山上的姑娘》，当然也有延安时期那些旋律优美的新歌剧……在80年代后期，港台歌曲已大行其道，这些“老”而“土”的乐曲的命运似乎不大美妙。总之，若无王老师这个渠道，当时的我绝对无缘得入宝山，甚而有幸听到这些最权威的版本。

多少年来，我不知听过多少遍这三盘卡带，可谓浸淫甚深。那旋律早已深入我的心灵，与我融为一体。我在这些乐曲上寄予了无数道德与文化意义的审美想象。“祖国”的形象就这样出来了。

短短半学期的讲座结束后，人们各复其位。秋天，我从别人偶然的交谈中惊悉王老师已患喉癌病逝。他去得悄无声息，未泛起几丝涟漪。原来就在最后一堂课乃至更早的时候，王老师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快速走向生命与事业的尽头。最初的震惊缓缓消失后，我心中涌起的情感，是强烈的怜惜多于伤



20世纪80年代，王震寰老师和同仁们在音乐室门前留影。左2为陆以循、左4为张肖虎、左6为王震寰、左8为方堃



1978级民乐队队员与王震寰老师在音乐室前合影。左起，前排：郑欣、王震寰、姜茂雄，后排：陈晓明、胡杨、牛景辉、李志轩、陈汝强、钱可元、杨明森

悲。这听来有点可笑。一个刚过14岁的孩子怜惜一位已逝的中年知识分子。但这是无比真实的情感。王老师那瘦弱的身影，沾满粉笔灰的衣衫，厚厚镜片后欣喜的眼神和淡淡的悲哀，潜伏着致命病灶的嘶哑的嗓子，还有用大字工工整整写成的讲稿……就像我从小就常常涌起在心间的，对骑着破自行车穿梭于实验室、幼儿园、小学、家门之间，匆匆而过的父辈们的强烈的怜惜。他们有瘦削的脸庞，常常纷乱的头发，羸弱的肩膀，永远不能停息的生活之轮……

说到王老师，就不能回避新清华。王老师经历过老清华的尾声，有深厚的西洋音乐功底，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也真心热爱着鼓舞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解放区新歌剧……这些年来，人们对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新清华人的研究探讨远没有对老清华多，但实际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把“士”的特征发挥到极致的克己奉公的一代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乳汁灌溉了祖国、事业、子女，却唯独没有营养他们自己早衰的身体。也

许，只能将这些缺憾划归为时代的悲剧。新清华一度由综合性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程师摇篮，单一的训练难免形成匠气，这是公认的遗憾。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封闭剧变的社会环境……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这代人没有留下鲜明的历史性形象。但不能否认，这段岁月培养出来的清华人在坎坷中充满了奉献的血汗、信仰的激情。纵然是仆倒在地，一颗心依然高举对祖国的热恋。

在今天的清华园，依然时常可见“王老师”的身影。他们衣着普通，两鬓斑白。尽管子女已事业有成，他们依然骑着自行车，四处奉献余热。他们太过平凡，却又有引人注目的共性。无论男女，都刚毅、持守、执拗，甚至多少有点不合时宜。老式镜片后深邃眼神闪烁的是关心政治的热情，参与社会生活的赤子之心，以及孩子气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这标志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眼神，比校庆时别在他们衣襟上的红纸条更能证明那一代人的身份。

这一份沉甸甸的爱国爱事业之情，在清华是一代代传递的。国庆70周年时，宿舍阳台上都招展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是“我和我的祖国”的红色字样。老清华和新清华融合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这里永远传承下去。

（转自《新民晚报》，2021年12月15日）

（侯宇燕，女，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兼职研究员。）

成为未来的思想者和创造者

○ 殷雅俊（1980级水利）

本文是2022年8月18日，我校航天航空学院教授殷雅俊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举办的2022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新同学：

早上好！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发言。

我想与新同学们分享自己在清华园学习和生活的几个片段，谈几点感悟，期望对大家有所启发，期望能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第一点，与考试分数相比，理解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重要。我来自河南的一个小县城。1980年高考，我的成绩排全县第一名。带着第一名的荣耀来到了清华园，志得意满，意气风发。但很快就被当头一棒：周围的同学实在太聪明、太优秀，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竞争不过，成绩排名只能位列中游。从此，自我怀疑，心中郁闷，精神压抑，难以舒缓。为摆脱挫折感，我到图书馆阅读名人名家传记。读完《爱因斯坦传》，我茅塞顿开，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继承与知识的创造，完全是两回事；掌握知识的速度和精度，与理解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以知识的继承以及掌握知识的速度和精度”为衡量标准，爱因斯坦远谈不上优秀；如果以“知识的创造以及理解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为衡量标准，爱因斯坦无与伦比。一旦悟透了上述奥秘，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从此，我不再追求考试成绩的高分数，而是最大限度地深化对课程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四十多年过去了，



殷雅俊老师讲话

实践证明，当年的选择完全正确，对我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正面影响。

第二点，努力追求一个目标：即“一句话说清楚事物的本质”。入学第一年，我在数学课上学完了微分和积分。当时，清华设有小班讨论课，一般由助教老师主讲。课堂上，年轻的助教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请用一句话说清楚微分与积分之间的关系。”全班同学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宏篇大论。但大家的回答，怎么也不能令助教老师满意。她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突然，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我喊道：“坐在角落的那位同学，就你没说话了。请你来回答一下。”被老师点将，我心中十分紧张，很不自信地站起来说：“逆运算。”助教老师喜笑颜开，挑起大拇指夸奖道：“高！这答案实在是高明！”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因为大家不知道这答案到底高明在何处。助教老师解释道：“一句话说清楚已经很难了，这位同学三个字就说清楚了，真厉害！”她继续挑战道：“我们提高问题的难度，谁能用一个

字说清楚？”这一次全班同学没有再让助教老师失望，齐声回答：“逆！”这个片段，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从此，“一句话说清楚”，就成为我的信条：听完一节课，读完一个章节，学完一门课程，阅读完一篇文章，都要“用一句话概括其核心或本质”。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如果你能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并践行上述信条，你学习和研究的效率会不断提升，洞察力和眼光会变得敏锐，科学的鉴赏力会不断进化，科学的价值判断力会显著增强。

第三点，竭尽全力，获得与伟大先驱们对话的资格。当年上物理课，学习电磁场论。学到麦克斯韦方程组，我深受震撼。很好奇：如此优美、深刻的理论，到底是怎么被麦克斯韦创造出来的？在创造的过程中，他的脑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遗憾的是，教科书中没有答案，老师也给出答案。只好去阅读物理学史，终于看清楚了：麦克斯韦史诗般的创造过程，精彩纷呈，动人心弦，与教科书中描写的过程，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代入感：“如果我处于麦克斯韦的时代，能否做出如此惊人的发现？”于是，尝试追寻麦克斯韦的脚印，重走麦克斯韦的创造之路，反复碰壁之后，最终吃惊地发现，根本走不通！因为有一个坎儿死活迈不上去——怎么也抽象不出“位移电流”概念。我时常感慨，一个人得具备多高的天分、多深的功力，才能迸发出如此强劲创造力，才能创造出如此天才的概念？从此，我养成了习惯：从知识的萌芽到知识的最终形态，细致入微地追踪其形成过程，从伟大先驱们抽象出的概念中学习概念的抽象，从伟大先驱们生成的思想中学习思想的生成，从伟大先驱们思维的

飞跃中学习思维的飞跃。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绝对是一个让你终生受益的好习惯。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至少可以让你具备和伟大先驱们对话的资格。请记住，具备对话资格是实现超越的必要条件。

第四点，新同学们长远的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学习者和继承者，而且还应该是思想者和创造者。上中学时，我忙于知识的学习和再现，从未关注过知识背后的思想。进入清华不久，偶然看到拿破仑的名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剑，而比剑更有力量的是思想。”从此，我意识到思想的重要。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现象：我们的教科书中，几乎所有的科学概念、思想和理论，都是西方学者们创造的，都打上了西方学者的名字。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自己创造的概念和思想，也能够被写进教科书。四十年过去了，我很努力，我自己满意的几项工作，也许有写进教科书的机会，但希望到底有多大，我心中没数。我也意识到，作为“60后”已经不年轻了。因此，我强烈地寄望各位新同学，期望你们能够成为未来的思想者和创造者，期望未来的教科书中能够出现你们的名字。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如此寄望于你们？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们迈入了清华园，你们是清华人。在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下，我们国家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学校肩负着巨大责任。百折不挠地把我们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推向新高度，是我们这所大学使命之所在，也是这所大学的新成员们使命之所在！

最后，作为一名教师，我给大家一句忠告：“清华园的大学生活很短暂、很珍贵，值得你们倾注全部的爱和真情。”

谢谢大家！

● 诗词书画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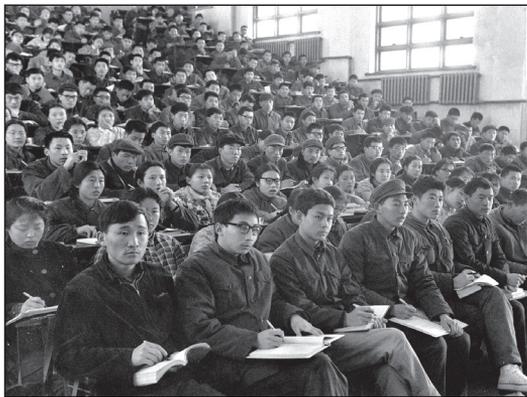
清华师生缘 天涯共明月

○孙远慧（1977级力学）



谭泽光老师接受视频采访

近日，清华1977级校友交流群里上传的一个小视频，把大家又带回到了那记忆犹新的1978年春，清华西区阶梯教室的那堂“高等数学”大课场景，那张四十多年来广为流传的珍贵照片（下图）。这个小视频采访的正是当年“高等数学”授课老师谭泽光教授。从视频中见到阔别已久的先生，校友们心中翻腾着想念和祝福之情。



谭泽光老师是1956年从湖南省湘潭市一中考进清华大学的。自此他一直在清华大学从事数学教学，桃李满天下。他的“高等数学”课讲授严谨生动，并时常给以画龙点睛的哲理。记得当年他的黑板板书也是严谨、清晰、有功底。

王社民同学（力师7）自英国即兴赋词一首。

清华西阶课堂

王社民

闻亭旁，荷塘边，西阶七八年。
春风拂柳笛声欢，晨阳泽光潭。
微之分，积之合，几何伴思索。
人生难得是坦途，唯有蜀路多。
闻亭旁，荷塘边，西阶梯连天。
苹果飘香求导贤，积分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
微信传情联谊暖，今宵圆梦甜。

注：该词按李叔同《送别》一词填写。词中“苹果飘香求导贤，积分山外山”意指课堂上的一些同学毕业后曾在微积分创始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剑桥苹果树下求学的经历。求导、积分均为双关语，一指微积分，二指求学。另外，词中“潭”取尊师姓的谐音。

谭泽光老师在知悉同学们来自远方的问候后，特别回信并赋诗向大家致意。

物师七、力师七、固七、流七、工物七等班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还惦记我！

今年，2022年是你们从清华毕业四十周年。四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快要迈进耄耋老人的行列，你们也都不再年轻，但往事却历历在目。我虽然记不得你们每个人的姓名和笑貌，但在阶梯教室近五百人的课堂上，你们那一双双瞪得大大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的神情，却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时刻鼓励和鞭策我，努力再努力做好教学工作，为每个同学的成长尽一份力量。

值此你们毕业四十周年之际，兴起作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庆贺，并祝同学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再创辉煌！

1977—1978年你们的数学老师，谭泽光
2022年7月26日

七律·念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

谭泽光

邓公复出挽狂澜，乱后神州换新颜。
百废待举兴教育，志高知青进校园。
经历曾经难和苦，成就当代栋梁才。
问我今生何为傲，处处皆有师生缘。

罗晓林同学（流7）自澳大利亚也即兴作诗一首。

五律·深谢谭老师

罗晓林

求导良师下，积分成长年。
高阶风物亮，连续后波蓝。
不惑单值解，但求别样天。
圆圆画一笔，好梦圆一千。

谭泽光老师也随即以诗答复罗晓林同学。

七绝·答罗晓林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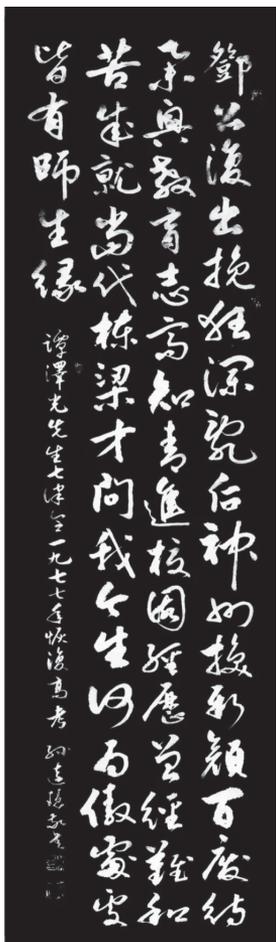
谭泽光

求导积分成诗章，情真意切暖心房。
趣题园中再同学，你辈更比我辈强。

注：趣题园为流七温彪同学发起的共研数学等题目的微信群。

孙远慧书谭泽光老师

《七律·念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



贺香港回归廿五年

○吴硕贤（1970届建筑）

香港回归廿五年，紫荆花放更鲜妍。
东方珠灿迷人眼，两制煌煌写续篇。

毕业三十年有记

○汪长安（1987级材料）

青葱五载似云烟，影像长留三十年。
水木清华多变幻，荷塘月色尽依然。
当时朝夕相同砚，从此东西两片天。
我欲复兴钢铁梦，满腔热血浦江边。

作者为宝武集团正高级工程师，现任轧钢工艺首席工程师。多年从事热轧轧辊维护、使用管理及技术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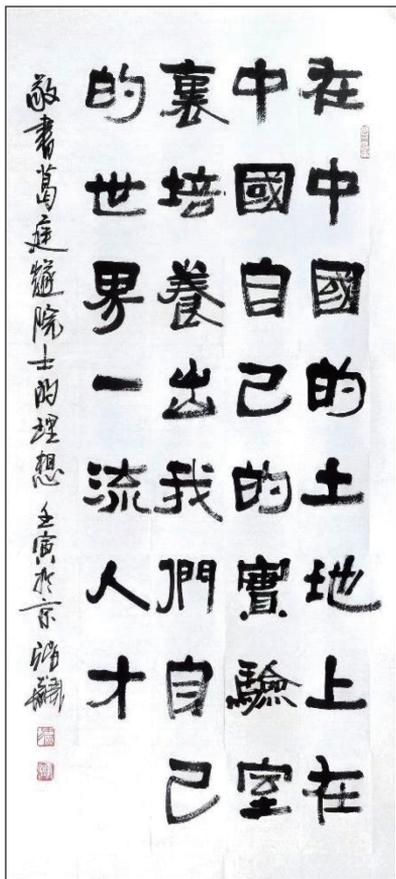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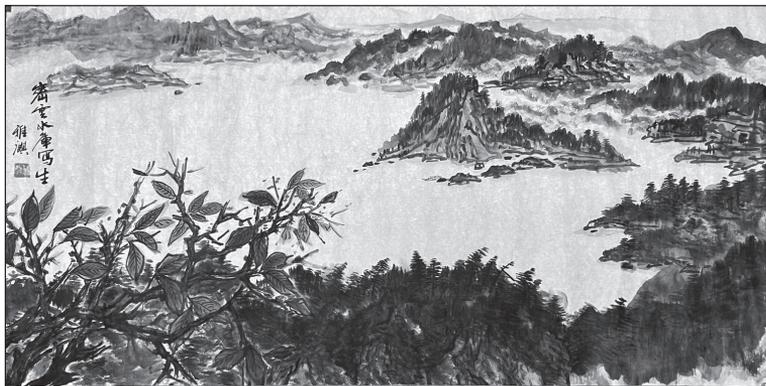
七绝·题密云水库写生

○蔡建中（1974级工物）

毛笔流芳生绿洲，周公释梦密云稠。
源源水润京都美，光斗青山笑点头。

密云水库写生

○文雅麒（一九七四级水利）



书法

葛庭燧院士的理想

○张飙

● 回馈母校

九坤捐赠扬善举 兴学育人铭惠泽

6月29日，清华大学九坤人才支持项目捐赠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此次捐赠，将用于设立九坤物理系及计算机系冠名教授、九坤奖学金等项目，支持学校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和学生发展工作。九坤（北京）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校友王琛（2000级物理；2004级博，计算机），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副校长杨斌等出席仪式，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主持仪式。

王琛表示，校友与母校血脉相连，通过捐赠回馈母校，令他在激动中也备感温暖和幸福。王琛分享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也分享了九坤的创业经历。他说：“感恩清华，就一定要无愧于清华；感恩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要无愧于祖国与未来。”九坤始终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捐赠主要用于支持清华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希望为加强清华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

人才贡献力量。

王希勤对王琛校友一直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建设与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一代又一代清华校友不忘初心使命，勇担家国责任，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社会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学校已完成“三个九年，分三步走”战略，实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正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迈进。为此，学校积极谋划，不避风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学的优势，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九坤的捐赠将为学校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科研创新再添动力。他希望各相关受赠单位充分用好这笔捐赠，加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的培养，为解决产业“卡脖子”问题和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作出清华应有的贡献。

杨斌表示，从2018年起，九坤不断支持学校交叉信息研究院发展，设立学生奖学金，支持学术实践、文艺、体育类活动的开展，为学校的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他衷心期待在王琛和九坤的支持下，学校相关人才支持项目取得更扎实的进展，不负校友和社会的期望与信任。

物理系党委书记肖志刚、计算机系主任尹霞、致理书院院长李艳梅相继发言。王琛与袁桅签署捐赠协议，王希勤向王琛赠送捐赠纪念牌。（基金会）



捐赠仪式

小米捐赠冠名教授，助力大学延揽英才

7月8日，清华大学小米冠名教授捐赠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此次捐赠，将支持清华大学小米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席位，助力学校青年创新人才的引进与队伍建设工作。

小米集团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小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德，小米集团合伙人、高级副总裁、化学系1994级校友卢伟冰，小米集团高级副总裁、物理系1991级校友曾学忠，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副校长郑力等出席仪式，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主持仪式。

刘德结合小米的发展历程，回顾了小米与清华关于人才建设、科研创新等方面的合作经历。卢伟冰介绍了小米集团的发展近况、业务分布以及当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他说，当前小米正面临战略业务线的转型挑战，对于科研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同时，小米的业务分类众多，需要大量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未来，

希望可以与清华加深在人才建设方面的联系，小米也将继续坚守初心与使命，通过产品平台为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科技力量和多元价值。

曾学忠表示，在清华的求学经历给了自己受益一生的精神力量，通过捐赠为母校的人才建设做贡献，令他备感温暖和幸福。他说，小米会竭尽全力支持学校的科研建设与人才发展，希望捐赠受益的青年人才可以在各个领域为小米“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这一梦想助力。

王希勤代表学校对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捐赠表示感谢。他指出，在知识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学科分化和专业分化呈现加速态势，迫切需要将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和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协调好与学术界、教育界和行业界的关系，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未来，希望与小米公司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探索产教研融合新模式，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郑力表示，当前，学校持续推进人才强校核心战略，积极探索人才激励机制，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已形成初具规模的人才基金体系。未来，希望可以与小米一起探索高校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模式，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基金会）



出席人员合影

今日清华



◀ 2022届毕业生党员大会暨启航出征仪式举行，校党委书记邱勇向毕业生代表授旗



▲ 王补宣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暨清华大学能动系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举行，校党委书记邱勇等为王补宣先生纪念浮雕揭幕



▲ 校长王希勤与2022级本科新生代表座谈

▶ 45位联合培养飞行学员完成在清华的三年学习，即将赴空军航空大学和海军航空大学进行下一阶段学习、训练，学员们向老师赠送签名纪念衫



◀ “炭火教授”赵家和雕像揭幕仪式在经管学院举行

心怀炽热

奔赴山海

——二〇二二年本科生毕业典礼



▲ 党委书记邱勇宣读表彰决定



▲ 校长王希勤颁发学位证书



◀ 怀揣梦想，英姿勃发



▲ 清华永远是你温暖的家



▲ 难忘毕业瞬间



◀ 毕业典礼现场



▲ 校长王希勤讲话



▲ 党委书记邱勇颁发学位证书

▼ 心有所向，
未来可期



▲ 校友代表郑方发言



◀ 首批创新领军工程博士毕业

▼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毕业生在校园留影



——二〇二三年研究生毕业典礼

向光而行
向新出发

校友联络



▲ 党委书记邱勇、副校长王光谦与青岛校友座谈



▲ 校长王希勤出席清华大学在黔选调生及青年校友代表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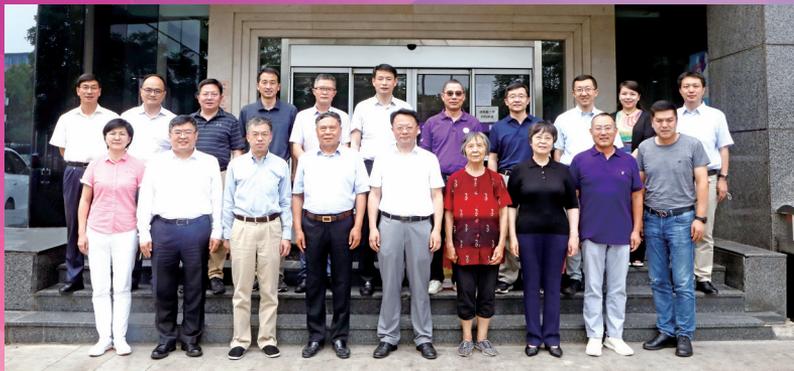
▲ 党委副书记过勇看望福建校友



▲ 过勇看望慰问山东校友并座谈交流



▲ 校友总会副会长韩景阳看望慰问苏州校友



◀ 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王希勤当选清华校友总会会长



▲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艺术研究与实践学习班” 开班仪式举行



▲ 2000届校友捐资修缮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世纪报告厅”揭牌



▲ 法学院校友捐赠支持清华法学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 清华校友—公管学院于永达奖学金捐赠仪式举行

校友
联络

第七届三创大赛各赛道决赛陆续展开



▲集成电路与物联网全球总决赛在苏州举行



▲AI大数据全球总决赛在鄂尔多斯举行



▲先进制造全球总决赛在桐乡举行



▲新能源与新材料全球总决赛在厦门举行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甘肃校友会年会暨清华校友陇原发展论坛召开



▲ 2022级清华天津新生与校友座谈会举行



▲ 湖南省清华大学校友会正式成立



▲ 沈阳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111周年



▲ 南京校友会组织第二届环湖行活动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镇江校友会庆祝母校成立111周年



▲ 美国威斯康星清华校友欢聚庆中秋



▲ 韩国清华校友会在首尔成功举办清华论坛



▲ 2022波士顿清华校友会迎新活动成功举办



▲ 加拿大南安省清华校友会举办夏日野餐会